



社區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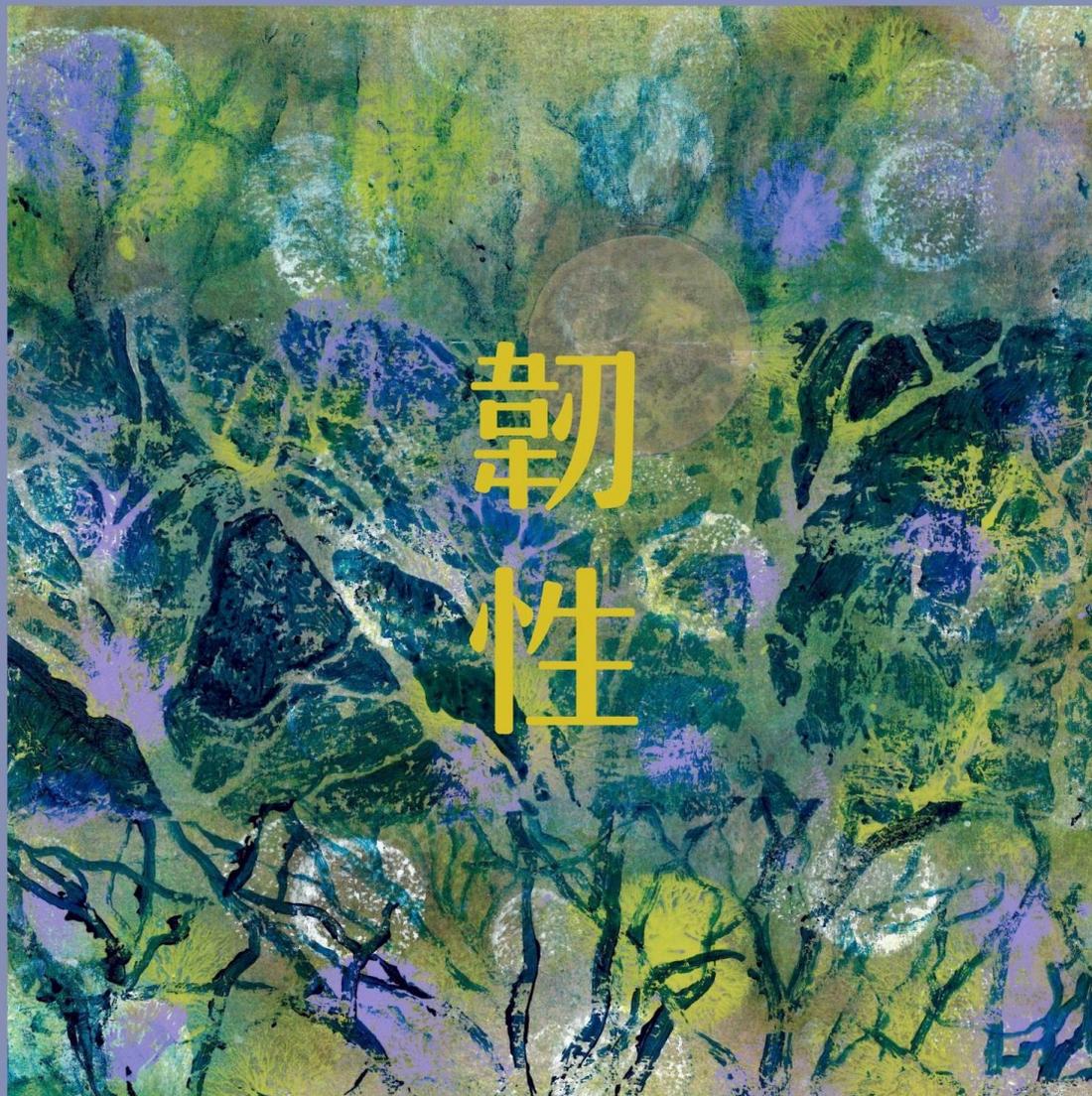
比鄰
泥土香

2022
社區伙伴 編



韌性——比鄰泥土香 2022

社區伙伴 編



韌性

韌性

比鄰泥土香 | 2022

社區伙伴 編





韌性——比鄰泥土香 2022

製 作：社區伙伴

地 址：香港九龍佐敦西貢街 20 號志和商業大廈 13 字樓

電 話：(852) 2458 0011

編 委：陳宇輝、賈麗杰、顧曉峰、梁笑媚、鄧文嫦

校 閱：結香 繆睫 芷寧

封 面 圖：吳美玲

插 畫：晏川

版式設計：陸迦莘

印 刷：廣州百思得彩印有限公司

聲 明：刊內文章僅代表作者的觀點

網 址：www.pcd.org.hk

往期下載地址：<http://pcd.org.hk/zh-hans/content/> 比鄰泥土香

(本刊使用大豆油墨及再生紙印刷)

在脆弱與堅強之間思考

(代序)

如果把時間撥回兩年以前，我們能想像到，今天的世界會改變如斯麼？

所謂的力量是什麼，鋼筋水泥是嗎？屹立不倒的建築是嗎？讓人聞風喪膽的武力是嗎？在大自然的偉力跟前，人類的痕跡究竟算什麼？也不必提那熔岩、地殼板塊移動、風雨雷電、外太空隕石等極端例子了，想想荒漠上日復一日的風化，晝夜不停地被海浪輕拍的海岸線，鐘乳洞裏億萬年的滴水穿石，答案好像顯而易見了。直徑不到 200 納米的冠狀病毒，便能把掌握至高科技的人類弄得手忙腳亂、人仰馬翻。而我們能否從這大自然的信號中吸取教訓，看來還是未知之數。

在《消失的城鄉邊界線》中，作者高橋博之先生分享道，在 3·11 地震後，漁民跟他說他們並不恨海嘯。那是一種因生命與大海深深連結在一起才可獲得的感悟。當時有人倡議要在災區籌建巨型防潮堤，高橋先生卻認為這種「建設」雖然可能會為人類帶來那麼一點安全感（即便在大自然面前是那麼多此一舉），卻會斷開陸地與大海的交流，讓大海變得貧瘠，進而無法供養人類。當氣候變化變得更為猛烈且日常時，高橋先生、日本漁民們的這些思考對我們來說便不再是他方的故事，而是每個人都很可能要面對的生命選擇。

在面對逆境、挑戰及困難時，我們總希望自己可以更堅強，更能頂住困難，總期待能迎難而上，能儘快在跌倒中爬起身來。究竟這是所謂的復原力呢，還是一種我們拒絕接受變化、狂妄自大的執念？或者換一個角度去問，韌性、復原力與執著、不甘改變之間，到底有什麼差別？老子教我們上善若水，民間智慧都知道要從善如流，如果我們俯首向大自然、向民間向社區學習，又能獲得什麼啟發？

這一期《比鄰泥土香》選擇以「韌性」為專題，確實是因為世情的驟變，讓我們很想透過伙伴們的文章，了解他們如何思考與應對改變，從他們的人生與生活智慧中學習一二。在「見·遠」欄目中，我們以「空間設計與生活」為題，希望與讀者們共同反思空間如何模塑我們的生活，進而探索空間打造又可以為生活帶來怎樣的可能。我們也感謝其他欄目的作者透過文章分享他們這些年的所思所感。本期《比鄰泥土香》由陳宇輝、賈麗杰、顧曉峰、結香、梁笑媚、繆睫、鄧文嫦編輯，同時感謝所有作者和對本書編輯出版提供幫助的伙伴，讓本期書刊得以面世。

當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雲散的時候，讓我們真切地面對生活，以及我們與萬物的關係吧。

目錄

第一部分 專題 —— 韌性

韌性：在不確定的時代尋找確定性	賈麗杰	2
守住回家的路：有感於貴州流芳村和黃崗村的可持續生活探索	陳韋帆	4
生態農業帶我們回歸自然	彭月麗	10
木蘭花開：一個社工機構的自我探尋	木蘭	18
我眼中的「韌性」	吉田俊郎	24
危機中的慈悲螺旋之舞	Kijtiwachakul Dhammanond	30

第二部分 見·遠 —— 空間設計與生活

前言		36
空間設計與公眾參與	高健、林杰倫	38
誰築鄉村夢？從仙娘溪村的經驗談起	甘傳、郭子怡、田蕾	44
樹合苑的空間設計與生活	陳孟凱	52
回家	楊向若、王慈航	58
容讓其他生物光臨的建築	阿樂	66

畫與詩

生成	吳美玲	74
森之寐	瑪麗·奧利弗	75

第三部分 行動者

讓孩子在愛中成長的共養村	共學起動媽媽社群	78
半農興村：深溝村的故事	楊文全	84

第四部分 解讀

我的城和鄉 —— 讀《消失的城鄉邊界線》	楊金	90
勞動合作社：做自己的主人	陳怡樺、陳郁玲	96
一些眼中有光的人 —— 紀錄片《信仰之島》觀後感	汪斌	102

第一部分

韌性：在不確定的時代尋找確定性

文一 賈麗杰

不確定性是生活的常態，尤其持續了近兩年的疫情更加劇了這種「不確定」。危機牽引著人們的生活，同時也帶來諸多深刻的反思。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更需要找尋支撐內在的「確定性」，找尋重新建立人與自然、人與社區、人與人相互聯結的道路。

現代人面對未知和災難，往往不是把自己放回到生態系統中，而是把我們的安全感置於人定勝天的自信中。而當我們通過有機的適應去重新聯結到一個相互作用的關係 / 系統中，我們更能夠在逆境中復原、成長、自我更新。這就是這期專題想要分享的話題：韌性，或者復原力。

專題不強求弄明白「韌性」的學術涵義，而是從自然、文化、人與人的關係、內在力量等不同維度去探索「韌性」。這期專題，我們邀約到五位伙伴與我們分享關於「韌性」的體悟與思考。

首先，我們想分享傳統社區如何在現代化的衝擊下做出選擇，傳統文化、老品種保育和傳統的生活方式等在社區生活中扮演著怎樣的角色，又將何去何從。本文作者是社區伙伴農村團隊的韋帆，她多次走訪貴州流芳村和黃崗村兩個侗族村寨，在與村民的交流中嘗試理解他 / 她們的視角。面對文化衝擊帶來的社區問題，我們相信當地人自己有足夠的智慧去應對，而傳統文化正是他 / 她們的根基和資源。

第二篇是從生態農業內生邏輯和農人內在力量的角度來談「韌性」，因為生態農業技術的原點是對農業生態系統的觀察與學習，當農人用整全的生命視角去認識農業的自然規律，就可以讓很多事自然地發生。編輯在跟月麗約稿時聊起大自然的「韌性」本質這個維度，月麗多年來從事生態農業的體會不斷地豐富這個話題的內容，於是一拍即合策劃了一期「篤農家共學舍」線上對談活動，邀請田間學校網路中經驗資深的農友郭銳和李立君參與對談。兩位農友在對談中分享了很多生動的田間觀察和生活體驗，再加上月麗穿針引線的提問和解讀，讓整晚的交流充滿能量感。在這基礎上，月麗精心準備了這篇稿子，希望與更多農人和朋友分享生態農業的內在邏輯與魅力。

「木蘭花開」是在北京城邊村的一家基層社工機構，它是很多打工女性在北京的一個「家」，是她們在艱辛生活中可以抱團取暖、互相安慰的心靈港灣。這篇文章的作者麗霞是機構發起人之一，她的生命經歷與「木蘭花開」交織在一起。文中諸多艱辛，是她和團隊這十二年裏經歷的風風雨雨，也讓我們看到打工女性群體真實生活的縮影。麗霞身上有股「不服輸」的勁兒，她在一次次困境突圍中不斷認識自我，也看到每個個體的力量與價值。她把「木蘭」比作小草，小草雖弱小，但有倔強的生命力，它的力量來自大地。

最後兩篇文章分別來自日本轉型城鎮運動的推動者吉田俊郎先生，以及與社區伙伴有多年深厚情誼的泰國 P'Nit 老師，他們分享了海外網路中的一些「韌性」經驗。所謂轉型城鎮（Transition Town），就是面對石油峰值、氣候變化等危機，當地人通過創意和努力，最大化活用當地資源，向永續型社會轉型的草根運動。在 2011 年日本發生 3·11 特大地震災害後，吉田先生遷居到轉型小鎮藤野¹，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開始以與自己小小的身量相符的尺度生活」。在藤野，人的創造力被視為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當人發揮出美好的特質，相互信賴、相互幫助，就在創造一種具有韌性的社區生活。P'Nit 老師的這篇文章，讀來有種內心被慢慢打開的感覺。疫情期間，大部分人通過自我隔離和防禦以求自保，人們在一波接一波的疫情中感到無力、沮喪、焦慮、恐慌或者麻木。P'Nit 老師是少數有勇氣對「苦難」保持敏銳感知和清醒覺察的人。她分享了疫情下的兩年自己經驗到的深刻內在轉化，以及支持社區和他人的療癒行動。當我們以慈悲的方式對痛苦保持開放時，我們會體驗到與所有生命的同在，這份清明的覺察正是療癒世界的力量。

對編輯團隊而言，每一次專題製作都是一次探索之旅的邀約，我們由衷地感謝伙伴與朋友們的真誠分享與信任。借由「韌性」這話題，讓我們相互聯結在一起，用內在的愛與智慧去迎接我們繼續充滿不確定的生活。

■ 賈麗杰 社區伙伴城市團隊項目官員。

1. 藤野位於神奈川縣，離繁華喧囂的首都東京 55 公里，是日本第一座轉型城鎮。《比鄰泥土香》第 10 期的文章〈在轉型的小鎮呼喚愛〉曾介紹藤野的轉型故事。

守住回家的路：有感於貴州流芳村和黃崗村的可持續生活探索

文
一
陳
韋
帆



早年前，我就通過閱讀《當文化反思遇上農業：協作者札記》，初步認識了貴州黔東南的流芳村。加入社區伙伴之後，因為一些專案工作而進一步認識了流芳。流芳村地處貴州黔東南黎平縣茅貢鄉，是一個在國道旁依山傍水的侗族村寨。村寨中的骨幹從 2005 年與社區伙伴合作前，就已經在探索生態種植稻米。在不同伙伴和流芳村生態種植團隊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借著地方政策的推動，流芳村成為了茅貢鎮的有機大米種植基地。不過在流芳村的探索中，最讓我感動的還是村民們在其日常生活中對可持續生活和社區韌性的理解，並找到了自己的核心堅持。

到訪流芳村時，我通常會住在吳會長家，這期間我和女主人石阿姨有很多有趣的對話。我和石阿姨一起做過紙，做過傳統的三月粑粑，更多的時候是一起做飯。一起勞動的時候，阿姨經常提到的一個詞是「安全感」。

每當我問：「為什麼要種有機稻米啊？」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自己種的米吃起來放心又好吃。」

我問：「為什麼你們那麼喜歡種老品種啊？」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自己留的種子不怕種不出來，不怕沒有吃的。」

我問：「為什麼要做醃魚啊？」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哪怕沒有現金買煙，也可以送禮還禮給人家。」

我問：「為什麼要用竹編的筐子而不用塑膠袋啊？」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勞動辛苦，需要好用的工具，而我們堅持，才有會做工具的人，也才有方便的勞動工具。」

我問：「為什麼還要從紡線開始織布染布做衣服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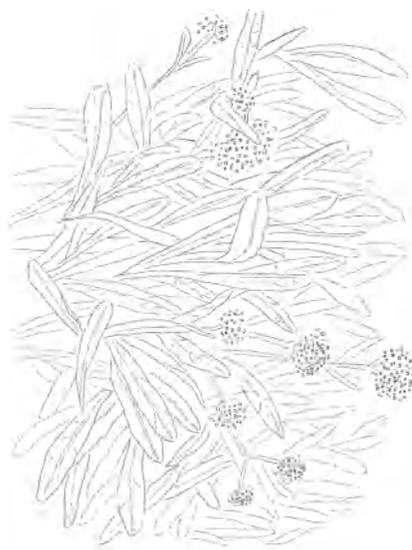
阿姨答：「因為有安全感啊，自己做的衣服穿起來舒服又方便，也很好看。不穿侗族的衣服，就不是侗族人啦。」

婦女團隊的另一位核心成員英時姐也跟上節奏，在參加姐妹工作坊講起「婦女眼中的美好生活」時，反復強調：「要有土地啊，因為有安全感啊，沒有土地的話，總覺得生活是飄的。有土地的話，就像種子落到土裏，無論如何都可以活下去。」

說得多了，我們半調侃流芳村可以主打品牌「有安全感的生活」，因為有地有田，有能發芽能抗災的老品種，有乾淨的水源和土壤，也有能生產工具的工匠手藝。但拋開外人的眼光，在流芳的婦女團隊看來，「安全感」就是一個囊括了衣食住行生活百事的指標體系，是讓大家能夠「進可出外賺現金，退可回村過生活」的關鍵。大家當下各方面對「安全感」的堅持，也是為了守護可以這樣自主選擇的空間吧。

除了滿足生計生活需求之外，「安全感」也有關係層面的含義。2021年2月的時候，石阿姨和婦女團隊的其他幾位成員招待我們一起製作「清明粑粑」。在流芳的傳說中，清明粑粑是紀念和感恩燕子的一種傳統糯食，也是女兒獻給母親的感恩禮物。每逢三月三之前，全家的女性都會聚在一起製作，之後帶給自己的母親。雖然我們去時並不是節日期間，但婦女們商量後覺得正好清明菜（鼠麴草）冒出了新芽，適合讓我們一起來體驗製作過程。於是大家提前去山裏找到了甜藤（村寨附近一種野生植物，是傳統的甜味劑之一），摘來了清明菜，準備好了流芳自種的有機糯米粉，帶上外來的我們開始製作。從手工捶打甜藤和清明菜，泡水過濾和糯米粉，一直到捏成粑粑進鍋油炸，整個過程完成之後，作為協助者的我已經腰酸背痛，巴不得躺平。想到這一整天的勞動還不包括外出尋找原材料的時間精力，我完全拋卻了自己身為「可持續生活」專案工作人員的自覺，有氣無力地問仍然在幹活的姐姐們：「要花這麼多力氣來做這種零食，這究竟是為了什麼啊？」

答案當然還是：「因為有安全感啊！因為外面的零食吃起來不安全也不好吃。還有，一家人來做三月粑，大家邊聊天邊做，也是傳承我們侗族的文化啊。」



聽到這個熟悉的詞，我開始回想自己參與製作時揮汗如雨的過程。如果將儀式般的情感投入其中，確實會讓人通過親身勞動的過程去體驗和感恩，無論是感謝燕子為侗族人帶來杉樹種，還是母親為女兒付出的心血汗水。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一個深度生態學¹中的「感恩」環節。而通過家庭中所有婦女的集體工作過程，以及不同小家庭之間的禮物交換流動，也讓村寨整體擁有了更強的聯結感。對於流芳的婦女們來說，這種人與人之間的聯結感也是「有安全感的村寨」的重要指標之一。

不過流芳村並非是世外桃源，現代與外來的挑戰日漸滲入。人們的每個取捨之間，堅持與代價並存。社區伙伴和村寨團隊深耕多年，也還在經受現代化對村寨的挑戰。先不說吳會長和石阿姨的兒子作為新生代文化傳承者，為了生計還是必須往返城鄉。村寨內部的禮物流動體系，也逐漸從醃魚、稻穀為主，變成了買煙買酒的現金流動。石阿姨感嘆現在越來越多的人出外打工，包括婦女團隊也在想辦法去縣城賣菜，可能也是因為現金花費越來越多，大家逐漸無法維持自給自足的生活。儘管如此，婦女團隊和會長一群人仍然在堅持有機種植，希望在有限的空間中多開拓一些選擇的空間。比如會長仍然堅持讓孩子們農忙時回家一起勞動，比如婦女團隊雖然人員時有外出打工，但堅持下來的人也會幫外出的人種幾塊菜地，讓大家出得去也回得來。而寨老們察見村中現金送禮攀比之風漸盛，也與村民一同明確了村寨的人情禮物往來的標準，以平衡當下消費主義對村寨關係的破壞。

在我看來，也許流芳村從來不是一個封閉的小系統，流芳村民們不是不明白有些堅持背後的代價，也不是淳樸地不去計算得失，只是因為大家衡量成本的時間維度不止於當下一代，而是願意看向更遠處的後代子孫。也因為傳統文化提醒人們，只有能夠回頭的路，才會是一條長遠的路。

曾有一段時間，我也疑惑：社區韌性的另一項重要指標就是自給自足的生計生活，然而在當下這個時代，在外界挑戰頻仍的情況下，還能讓生活的大部分物質都通過社區內部系統來提供嗎？如果不能的話，到底如何去理解社區韌性中「自給自足」的現實意義呢？

另一個侗族村寨——黃崗，則讓我看到了一個看似異想天開的應對：村寨至今還保留著物物交換的風俗，以作為現金交換體系之外的另類選擇。黃崗也是貴州黔東南黎平地區的一個古老侗寨，和流芳情況不同的是，黃崗的地理位置相對隔絕一些，因此也被外界稱為遺世獨立的侗寨。其實我們在村裏走訪時，並不覺得村民是「隔絕的」，畢竟外部鄉村振興的很多資源幾年來紛紛進入黃崗村，黃崗也是遊客鍾愛之地。但日常生活中，除了節日期間，外來人確實想買碗粉都需要提前預約。如果想在黃崗吃飯，沒有村民願意接待的話，有現金也沒啥用。有了數次餓肚子的經歷後，我們才搞清楚，房前屋後都是雞鴨鵝，田地裏都是瓜果蔬菜的黃崗並不是物質匱乏，而是村民不習慣用食物換現金的行為。聽老人說，侗寨的習慣是要留夠三年的稻穀，餘下的才會想到往外賣，而黃崗在這個習俗上似乎特別執著。村寨團隊以成龍大哥為首，認為保留住自己祖先傳下來的糯稻品種不僅能夠讓村民「回得去」，也能夠讓大家在當下保持獨立性。而保持對現金的較低依賴度，不僅是對傳統習慣的延續，某種程度上也讓村民多了現金以外的選擇空間。也因為還有以物易物的習俗，比較而言，黃崗外出打工的人較少，且選擇的都是季節性的短期工作。雖然看起來在黃崗的生活不那麼「方便」，旅遊業發展起來也沒有那麼「順暢」，但似乎村民的生活幸福感也並未降低。

也正是在這樣的另類堅持下，黃崗團隊才能在面對紛至沓來的研究者、鄉村振興者、非政府組織和旅遊者時，始終保持反思能力。有一次我問：「外面這麼多研究者來調查黃崗，每次都是你來帶領，你們自己還有興趣和村民一起來做調查嗎？」成龍大哥一改平時笑嘻嘻的表情，非常嚴肅地回答：「我帶很多外來的人一起調查村寨，但後來發現好多人都不會給我們回饋調查的成果，甚至我需要的時候，還有人讓我自己去花錢下載。只有我們自己調查的東西，才是

屬於我們自己的。」我摸著良心想了下自己會怎麼做，勇敢再追問：「那為什麼你們會想自己調查啊？感覺黃崗的文化已經傳承得很好了。」成龍大哥回答：「其實我們自己知道有好東西已經危險了，需要趕緊找回來，不然就要丟了。我們這一代如果丟了，下一代如果誰還想找回來就難了。我們學侗歌也好，種老品種也好，都是希望孩子們想回來的時候，還有可以回來的選擇。」

這些振聾發聵的話不禁引發我深深思考，如果說社區韌性有一些顯性的呈現，例如可持續的食物、種子與技術、社區互助網路和行動，那也有一些隱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隱性呈現，例如村民的「安全感」、傳承文化的內部動力，以及在主流之外的另類價值觀。這些隱性的呈現，猶如長在土地下的根系，正是支撐外顯的知識和行動的重要基礎，也是讓社區能夠在外界挑戰的風雨中，始終有反思有選擇有回頭路的主體意識。

另外，黃崗的中青年村民團隊也讓我看到了社區韌性的另一個維度：以行動者主體反思為前提的，向外學習的好奇心。在我的印象中，黃崗村團隊的傳奇在於實際承擔了很多外部資源進入村寨的「管道」，同時也有很多機會外出學習和參訪，但仍然保持自己的判斷和選擇標準。在外人看來，眼花繚亂的專案、參訪和培訓主題各異，我好奇團隊是如何認知和選擇的。而每次和團隊不同成員聊到外出學習，我又似乎總是能夠看到不同個體的新想法和新成長。最難得的是，這些新的學習總會回到團隊在村裏的思考和行動中，而不是泛泛地走了一圈而已。「去外面看回來的東西，在我們村能做點什麼？」似乎是這個團隊每次學習之後的關切點。我曾問過團隊中的妹妹漢美，她為什麼想參加一個婦女為主要行動者的專案，記得漢美告訴我：「出來和不同村寨的姐妹交流，就可以看看別人是怎麼做的，也可以交流經驗，回來想想我們可以怎麼做。」「看到大家做的很多都不同，也會反過來想想我們可以做哪些更多的。」這樣的學習和轉化動力，確實讓我欽佩。也由此提醒我，擁抱祖先的智慧並不是墨守成規，而是可以結合外出學習相互促進的反思與取捨。

行文至此，我才驚覺自己從流芳和黃崗村民團隊的身上學到的，比我想像中的更多。讓我深省的是，所有那些或宏大或抽象的概念如「社區韌性」、「可持續生活」，也許不過是為了讓我們覺察到自己在時間和空間層面的慣性視框，試著重新回到生活的整全中，去尋找行動和意義的支點。放下頭腦裏的概念，當我用身體的感知去描述流芳、黃崗等村寨時，我會想起腳底踩在山林土地的舒展，

深夜裏不知疲倦的蛙聲，灶上朦朧的柴火香，黃白的米飯上臥著的豔紅醃魚，不知不覺伴著笑聲歌聲下肚的米酒，在手指摩挲中越來越隨和的棉布，充滿溫柔安慰的大樹，總是瀰漫清香的杉木樓房，鼓樓裏暖到深夜的火堆，晨霧裏響起的織布機和槌布聲伴隨著的歡聲笑語……能留在我們身體裏的，吸引我們去為之堅守的東西，也許從來都如此簡單。而對於生活在村寨中的人們來說，守護自己心中的美好，並不只是經營祖先留下的家園，同時也是在創造未來子孫的希望。在每個認清代價的堅守背後，每個對即時便利與長久關係的平衡背後，行動著學習著思考著的村民們不僅僅是在守護當下個體的選擇空間，更在努力守護那一條，讓自己和世世代代都有機會可以選擇的，返回家園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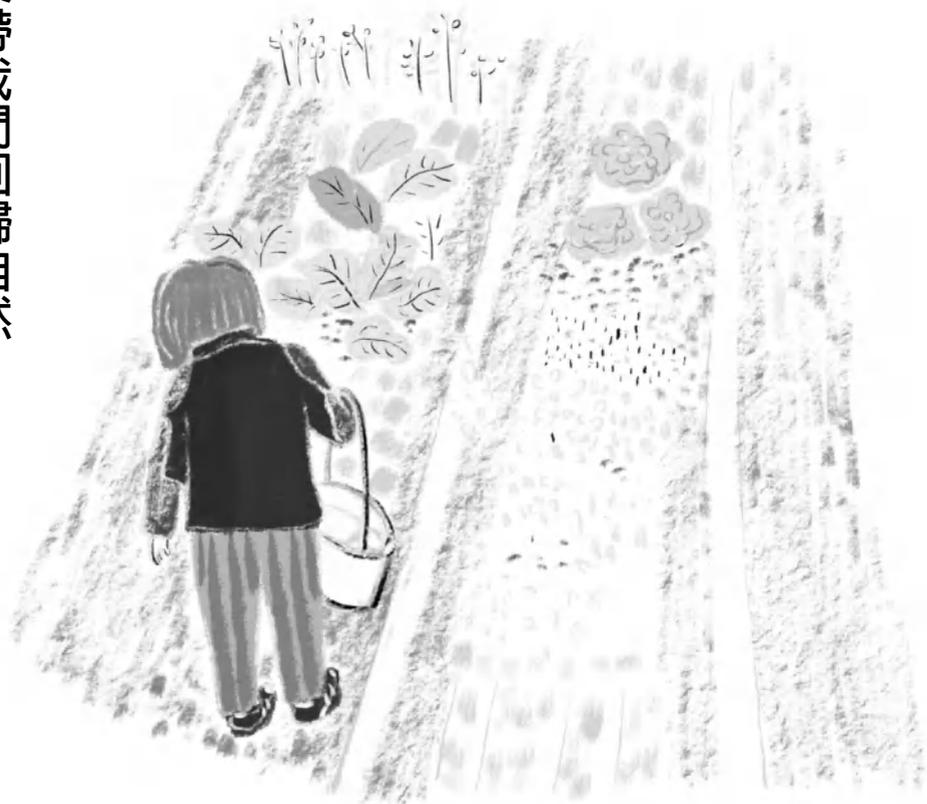
■ 陳章帆 社區伙伴農村團隊項目官員。

本文根據沃土可持續農業發展中心組織的「篤農家共學舍」線上對談活動——「生態農業內生邏輯」整理而成，參與對談者有彭月麗、李立君¹、郭銳²。社區伙伴的賈麗杰亦參加了本次對話的策劃。

從事生態農業十年，認識了很多返鄉務農的新農人，發現返鄉務農的新農人往往都要經過一個過程：首先就是接受農業和土地的洗禮，會從熱情飽滿的「田園夢」狀態被澆一頭冷水，然後有的人清醒了，踏下心來在土地上耕作，慢慢地臉上再度浮現笑容，活得輕鬆自在，農場也起死回生，風生水起，面對困難挫折，更具韌性；更多的人是被澆趴下了，掉頭走了；或者有的人不願意接受現狀，活在自己的夢裏，用虛幻裝扮自己，面對外界變化以及不一樣的聲音表現非常脆弱，自怨自艾，倒是也有部分人「買賬」。這篇文章比較關注第一類人是如何活出笑容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往往會發現土地和人的狀態驚人地保持一致，人的狀態越來越好的時候，土地的狀態也越來越好，不知道是人帶著土地在修復，還是土地帶著人在療癒。

生態農業帶我們回歸自然

文一 彭月麗



異化的農業、異化的農人

我從小在鄉村長大，小時候跟著父母幹農活是最自然不過的事情了，除草、鋤地、割麥、播種等等都幹過，後來上大學也是學習農業專業，感覺一直沒有和土地斷了聯繫，也隱約感覺到土地、土地上的人以及土地和人之間的關係一直在變化。

二三十年前，我印象中我爸媽對地裏發生了什麼是非常了解的。我媽去到地裏看到一棵作物有什麼變化，她就知道什麼原因，因為她每天都來，跟作物很熟悉，自己做過哪些操作也很清楚，或者是這棵作物小時候經歷過什麼，她都知道。

後來，農民看見有蟲子或者作物長得不好，第一個想到的是找農資商買肥料或者農藥。大家也不知道該用什麼，農資商推薦什麼就用什麼，很多時候會一下推薦好幾種，最後也不知道哪一種有效果，怎麼起的效果，他們開始失去自己的判斷力。因為農民不知道這些是什麼，用了之後產生了問題，也還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只能再去找農資商。就是這樣農人逐漸失去主動權，農民不再能掌握農地裏的情況，陷入惡性循環，人與土地的聯繫越來越弱，甚至除了播種、打藥、收穫，人們都不再去田裏，對食物的認知也越來越少。

化學農業無疑是對人的一種異化，讓人只能用農藥、化肥等農資去做農業，農人變成了化學農業當中的一個環節、一個工具。

生態農業是重現多樣化生命的生態系統

我們知道，太陽光是一切生命能量的來源。地球上只有植物或少數微生物能夠直接吸收光能，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是植物葉片把太陽能轉化成了有機物中的化學能量使之進入大自然的生態系統。動物吃植物或者食物鏈中的高級動物吃低級動物，微生物吃植物、吃枯枝落葉、吃動物糞便遺體等，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本質是物質、能量的流動。能量是核心，物質是能量的載體，能量需要固定在物質中才能被儲存在這個系統中。農業生態系統的本質也是自然生態系統，只是通過人為管理影響系統能量的抓取和分配問題。怎麼把

1. 李立君，立君生態果園負責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碩士，2010年開始學習有機農業，在有機蘋果課題中取得突破，實現了有機蘋果畝產9000斤以上。多年致力於將農場與自然環境融合，實現生活、農場與自然的深度結合，為可持續農業發展提供一個可借鑒的案例。

2. 郭銳，銀林生態農場負責人，華南農業大學生物科技專業學士，2008年返鄉創業，和伙伴一起創辦銀林生態農場，2013年轉為生態種植，從關注產品產出到回歸土壤的保護和培育，致力於可持續農業發展。2016年和一群新農人成立銀林生態社區，關注可持續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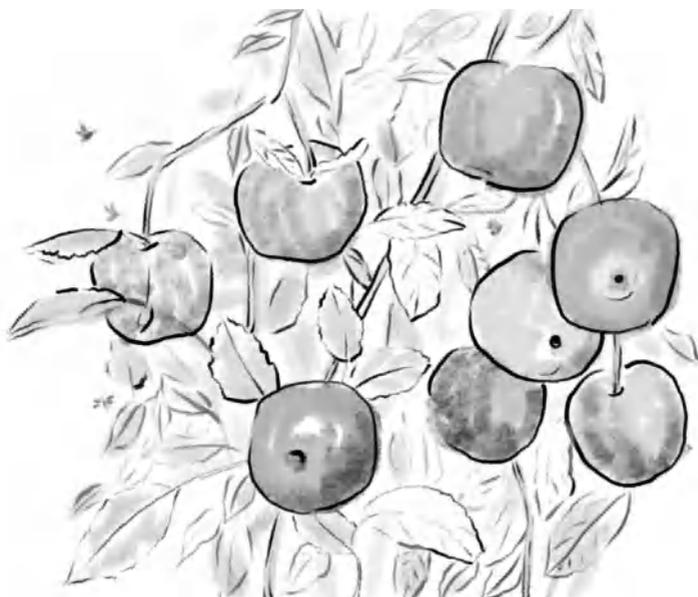
能量「抓取」到農業系統中，在保持農田生態系統的基礎上，多一點分配給人類，是生態農業的目標。

我們生態農友群最近幾個月在線上的「篤農家共學舍」（沃土可持續農業發展中心組織的圍繞可持續農業的讀書會）共讀《植物生理學》，其中有很多對植物微觀生理活動的認識，大家深刻地感受到植物是活的，她完全有自己的生存策略以及應對逆境的生理機制，她不是獨立存在的，她和周邊其他生物有重要的相互依存的生命關係，和周邊的環境要素中的太陽、大氣、水、溫度與土壤等都有著密切的互動關係。而現代農業往往忽視這些，強勢粗暴的生產管理操作切斷了植物與這些生物、非生物要素之間的自然迴圈機制，讓植物失掉自己的主動權和依靠，只能按照人類的需求和想法去生長，結果，植物不再是植物本身，結出的果實也不再是自然的味道。

植物和其他生物之間是合作共贏的關係，但在常規農業當中，一般是眼睛只盯著作物，把田間的其他一切生物視作「敵人」，或者認為它們之間沒有關係。因此，很多農田裏只有作物，沒有任何雜草、昆蟲，然後慢慢地土壤板結，土壤微生物也難以生存，農作物成了「孤家寡人」，只能仰賴人工施入「化肥、農藥」維持著生命。這是讓系統的生命變少的方式，而生態農業是讓系統的生命增加的。生命增加就好像讓一個大家庭有更多的成員，創造更多的價值；而生命減少的系統創造的價值當然越來越單一，最後就變成依賴人去投入農藥、化肥，植物才能生長。

我們可以以自然狀態下的土壤為例，理解土壤是一個由豐富的生命組成的系統。在農業生態系統中，植物製造了有機物變成葉子、果實等我們人類可以收穫的產出，它們的枯枝敗葉可以被昆蟲或動物吃掉，微生物可以繼續把動植物殘體等有機質轉化為腐殖質到土壤中，相當於把有機物的能量帶入地下，滋養土壤裏各種生物，加快能量的轉化、儲存；與此同時也在改善土壤環境，讓昆蟲、微生物和植物根系有更多的生存空間。植物根系有很強的穿透力（不同植物力量大小不一樣，一些常見的深根系綠肥常被用來改良土壤結構），能夠打破板結的土壤，配合微生物的活動，從而創造更深、更廣的土壤空間。伴隨著土壤結構的改良，土壤能夠儲存更多的水、肥（有機物和礦物肥）、氣、熱，從而能夠養活更多的生命，使得土壤生態系統逐漸升級，擁有更多抗逆境（旱澇等）風險的能力。這就是老農們常說的「地力」的內涵。

從上述自然土壤中的生態系統發展案例我們可以看出，每個生



命生存都需要一些環境資源要素，而這種生命需要的滿足不是通過「掠奪」實現，而是通過和更多的生命和非生命的環境要素合作協力來實現，相互成全，培育共同的家園，這樣形成的生命共同體反而抗風險能力更大、更具韌性。這是一場系統的、整體的進化——依靠農業生態系統內多樣化的生命迴圈的協力，這是生態農業不同於化學農業的根本內生邏輯。

生態農業與在地生態系統

生態農業需要遵循「適時、適地、適種」的原則，首先要了解當地的生態系統，比如這塊土地的土質、當地的氣候特點、當地的物產以及耕作習慣等，然後選擇適合當地環境的作物適時、適地去種，這就是遵循自然規律，這是基礎。觀察當地的自然環境也是了解當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管道，這些是當地土壤、氣候逐漸發展呈現出來的，可以告訴我們很多資訊。

兩位農友在分享中提到很多有趣的觀察。李立君注意到，有的果園周邊是常規的果樹，有的果園四周是林地，還有的果園周圍有棄耕的農田和自然植被，結果周邊自然植被好的生態環境給他的果

園「提供」了很多瓢蟲、食蚜蠅和螳螂等昆蟲。說到雜草，一般農友會想盡辦法把草除掉，讓菜能夠長得更好。郭銳在種青瓜時發現，雨季把草除掉，青瓜往往很快就會死——原來把草除掉後，土壤被雨水衝擊，導致表面板結、不透氣，而青瓜根系很弱，不透氣就很容易爛根，所以除草之後會長得更差。雜草茂密的根系可以保護土壤結構，讓土壤環境更穩定，透氣性、排水性更好，還能防止太陽暴曬。原來我們一直把草當敵人，其實它可以成為很好的幫手，讓我們的菜長得更好。

當地的自然生態系統是一個生物庫，做生態農耕可以從當地的自然系統中獲取生物的支持，包括害蟲、天敵（瓢蟲、食蚜蠅、寄生蜂等）等。立君的果園最初棉蚜很難解決，從春天繁殖到秋天，但是種了野豌豆兩年以後，因為野豌豆有很多的花蜜，可以提供給蚜蟲的天敵瓢蟲、食蚜蠅、寄生蜂，這樣棉蚜的問題幾乎就解決了。病蟲害的發生有時候不是壞事。有一年，立君的果園有一片果樹長勢很旺，出現了棉蚜，結果讓棉蚜啃噬了的果樹，樹勢轉為中庸，更容易開花坐果了。所以，病蟲害的發生都是有原因的，它們是大自然的一種平衡，有過剩的營養需要轉化它們就出現了；病蟲害也是帶給人資訊的重要「信使」，提醒我們哪裏做錯了，要做出怎樣的調整，這是需要農人認真「閱讀」的，讀懂了，我們的農業管理水準就提升了。

在生態農業中，可以經常觀察到許多自然的資訊，當我們認真地與自然互動，就會收穫信心與驚喜。

有韌性的農耕——應對氣候環境變化

很多農友提到，這幾年氣候異常是挺大的挑戰，比如高溫、乾旱、暴雨、寒潮等等，頻頻看到農業受損的報導。而另一方面，農作物品種對於逆境的抵抗力也是達到了歷史最低，這源於我們的作物經過長期的育種——特別是近幾十年育種的進度非常快——再加上人的呵護、化學農藥的「保護」等，作物品種本身的抗性就很低。立君提到，從事生態農業很大的挑戰是農作物被「慣」壞了，經過長時間的育種和農藥呵護（當代作物育種往往以高產、質優為育種方向），在自然界中難以立足，好多缺點並沒有通過自然的選擇篩除掉。

關於育種，我們看到很多生態農友已經在行動，選擇更適合本地環境的老品種，或者通過自留種選擇更有抗逆性的品種，都是增加農業韌性的方式。

另一方面，重視生態環境和土壤復育的生態農耕方式本身也在增強農作物應對逆境的能力。郭銳認為農業的韌性主要體現在土壤上，氣候我們沒辦法掌控，但是我們可以增加土壤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比如改良土壤，讓它的結構更好、耕作層更深厚，作物能夠長得更好、更健康、抗逆性更強。郭銳的農場地勢較低，雨季經常有水淹的情況，以前淹過之後菜都會生病或死掉，但經過幾年的生態種植，2019年水淹後，過一段時間菜又恢復正常生長，這給了他們很大信心。這是因為之前土壤比較板結，雨後空氣很難進去，根會腐爛；改良土壤之後，土壤的排水性、透氣性有了改善，水一退，空氣就能進去，所以對作物的影響就會小很多。這個就是土壤的韌性。

西安的沃野青青生態農場，因為幾年的土壤改良與生草栽培，在常規種植的果園蚜蟲發生很嚴重的月份，他們的桃園幾乎沒有看到蚜蟲，反而看到很多瓢蟲、食蚜蠅等蚜蟲的天敵。再如前文提到的立君果園種野豌豆和多種花草抵抗棉蚜的例子。這些讓我們看到，農田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可以抵抗和緩沖許多外在壓力和不利因素，生物多樣性越高，系統越穩定，這就是系統的韌性。

生態農人：自然地生活，回歸本真

訪談圍繞「人和土地的自主性」的話題，兩位農友分享各自的生活體悟和思考。郭銳說，他做生態農業前幾年是比較焦慮的，感覺做了很多年還看不到盈利，壓力比較大，總想著怎麼讓農場能夠收支平衡。人的狀態也比較緊，會想得很多、很忙碌。後來有一年到泰國遊學，發現當地的人做生態農業的出發點是為了自己的生活能夠更生態一點，能夠吃得更好，能夠少去接觸農藥、化肥，讓身體更加健康，他們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圍繞個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那時候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回來做農場的初心也是為了過更生態的生活，只是後來因為經營壓力而忽視了自己的初心。自那之後，他慢慢在調整，更多地去關注生活方面的事情，這兩年整個人的狀態會比較放鬆一點，經營的狀態也更好，工作的時候也更享受、更投入。「我

很喜歡耕地，感受到犁和土壤之間的互動，了解土壤的狀態，感覺很幸福，很滿足。」郭銳說。

回看這幾年的經歷和感悟，他說：「真正了解認識自然規律對生態農人來說很重要，但我覺得除了對技術的學習跟掌握以外，對自身的認識和對生活的認識也可以提升我們的內在力量。我之前更多在關注生產，那時候是缺乏力量的，當我們關注自身生活的時候，感覺是很不一樣的，也可以讓自己更有動力地去做生態農業。處理好跟家人、朋友、同事、客戶的關係，也能夠從他們身上獲得力量，讓我們更好地堅持走這條路。」

立君在分享中說到，做生態農業就是回歸一種自然的生活方式，首先要照顧好自己，關注自己的成長才更容易去滋養到別人，「就像生態系統某個環節的功能正常的話，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滋養到其他環節的功能，系統就會轉得比較好」。對於現在的生活，立君說自己現在越來越「自私」，主要精力花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讓自己對農業的理解更深入，在調控農業的過程中能夠更遊刃有餘，有足夠的內生力，能在社會中有自己的立足點，對社會的價值也會更大。

結語

我們認為農人的自主性是指農人面對自然現象有自己的獨立觀察、認識跟判斷，能夠根據當下的情況，做出合適的決定。這種自主性建立在清晰的認知基礎上，能夠在不斷的觀察自然、學習與實踐中建立自己對農業的認知，並且具有開放性，能夠不斷在遇到新的狀況或者理論、技術的時候，融會貫通，不斷拓展自己的認識、提升自己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這樣的農人不會迷信某一種「農法」，能夠客觀地看待、分析，回歸到技術的原點——「自然規律的原理」層面看待某一項技術，然後靠自己的實踐去驗證，知行合一，形成自己獨立的觀察和判斷。池田老師³認為篤農家具備四種基礎能力：觀察力、判斷力、洞察力與應用力。「我覺得這也是形成農人自主性的基礎和路徑。而與同行者的互助、陪伴、交流，無疑是一種很大的支持力量，我們做『篤農家互助共學網路』的初心也在於此。大家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同



行者網路，互助共學，照亮彼此前行的路。」

而有自主性的農人要做的事即是再現土地的自主性。土地自主性不只包含土地，也包含土地上生物的運作規律，前文提到生態農業原則中的「適時、適地、適種」，其實就是尊重土地的自主性。而人如果不考慮土地是不是適合，只是看到哪個賺錢就去種哪個，這就剝奪了土地的自主性。我們希望再現土地的自主性，即是允許土地和植物按照自身的規律去成長，農人們只是順應自然規律幫助土地和植物自主、健康地成長，不把人的想法凌駕於自然之上。

《中庸》有這麼一段話：「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我覺得這段話用來描述「自主性的農人」很合適。我們生態農人首先是要對自己真誠，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做自己認為有價值的事情，即是活出自己的幸福與喜悅，這樣才能真正地影響到身邊的人，影響身邊的人活出幸福與喜悅。當我們能夠活出這份喜悅的時候，也更能觀察和感受土地與植物的需要，了解自然規律，然後才能幫助土地與植物活出它們的完整性，這不就是「參贊天地、化育萬物」嘛！

當人和土地的自主性都找回來的時候，就是和諧共生的天地了。

■ 彭月麗 畢業於山東農業大學，曾任職於沃土可持續農業發展中心，多年來致力於土壤改良與生態農業推廣，發起田間學校，組織生態農業共學，主持編輯《可持續農業》。希望連接城鄉伙伴，為大地復育助力，共創自然而豐盛的可持續生活。

3. 池田秀夫，日本福岡縣人，生態農業專家，致力於土壤改良與堆肥製作技術推廣。20年來，行走在中國鄉村的田間地壟之間，傳播與推廣土壤改良與可持續農業的理念與技術。

我是河南開封人，一個普普通通的農村女子。很多人會脫口叫我「木蘭」，是因為一時想不起我的名字，我不介意，很喜歡「木蘭」這個稱呼，因我和木蘭幾乎分隔不開。木蘭 2010 年剛成立時，我就吃、住、睡在木蘭的任何一個活動中心之中，生活和工作完全不分。我和木蘭幾乎融為一體，無論是從外界傳播，還是從我自己的時間、精力的投入而言，都是如此。

我只是木蘭的創始人之一，當時我們 4 位女性一起創辦了木蘭花開，張睿、張春芬、趙憶帆和我，幾乎是一拍即合，都身為流動女性，更能感同身受基層女性的弱勢地位和面臨的困境。

我們諮詢了很多朋友，自己也想了很多名字，最後機構定名為「木蘭花開」，是因為我們把「花木蘭」和流動女性做了一個比較，發現很多相似之處：第一，都是女性身份；第二，都是遠離家鄉；第三，都是為了支持家庭，花木蘭是替父頂弟從軍，一個一個的流動姐妹是為了減輕家裏經濟壓力，甚至是為了支持哥哥、弟弟們讀書，成了家庭的經濟支柱；第四，都為國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這些姐妹們的勞動匯聚在一起，為了國家的 GDP 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只是常常不被看見。當然也不能完全類比，我們也找出了不同的地方，比如，我們很多姐妹多是被迫做了這樣的選擇，不像花木蘭那樣積極主動；花木蘭很自信，有很強大的自我，我們的姐妹很多人沒有「自我」，那個小小的「自我」常常被忽略，連自己都看不見；花木蘭的貢獻被看見，被傳頌，流動姐妹的勞動卻常常不被看見。

木蘭花開：一個社工機構的自我探尋

文一木蘭



我自己的個人經歷和眾多的流動姐妹是非常相似的，可以說我既是其中的一員，又是典型的代表。我生長在重男輕女的家庭中，所幸父母重男輕女思想不是特別嚴重，就有幸多讀了幾年書，沒有像同齡的女娃那樣早早地嫁人生子。有機會離開農村，走到更廣闊更精彩的世界中去，讓我的人生變得厚重：當過老師，做過小生意，南下尋夢的幾年，青春在工廠的流水線上疾飛。

在工廠流水線做普通工人的時候，我感覺到生命是那麼的黑暗，找不到生存的意義，用青春、汗水、健康、骨肉分離換來薄薄的幾張鈔票，僅夠維持生計，連生病都生不起。長長的流水線上，充滿著流動女工的血淚和絕望，困住了一個一個青春少女。我自己是一名曾經留守而現在處於流動狀態的婦女。同樣我的女兒也有過留守和流動的經歷。我們都將各自的傷痛埋在心底，幾乎從來不正面談起。在她留守的日子裏，每次看到一家人走在一起，我的眼光會跟著人家走很遠；當年，每次聽到看到有像女兒大小的孩子哭泣，我會忍不住紅了眼眶。

因為有這樣的親身經歷和個人的生命歷程，其他的姐妹也有相差不太大的背景，所以「木蘭花開」從誕生之初，它的定位，它的價值觀，就有其內生的基因，諸如以人為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爭取外部平等、推動性別平等、踐行內部平等民主、看見每個人、以優勢視角發揮每個人的力量等。

就像一棵小草一樣，我們在很貧瘠的土壤中發芽。我們最初選定的社區在北京五環外，臨近五號線終點站的東三旗，對面不到一公里就是號稱「亞洲最大社區」的天通苑。東三旗是一個外來人口聚集很密的城邊村，據說當時人口約3萬人。在村東南有一大片區域，是廢品收購站，很集中的一片地上以「家庭」為主的一個個收購站，搭著簡易的棚屋，人們就生活在廢品和垃圾之中。這片土地的上空，經常瀰漫著不同的味道和煙霧。人們就在這裏生活工作，孩子們就在廢品堆中淘寶、玩耍、長大。我們的活動室就設立在這片收購廢品區域的邊緣，在一個小二層樓的樓上，二房東是做飯店的。這二樓由一個30平方米左右的大廳和兩個10平方米左右的包間組成。我們就選了其中一個包間做辦公室，另外一個包間做集體宿舍，經常四五個人擠在那個小房間裏，連轉身都不方便。廁所在500米外的廢品收購站區域內，上廁所之困難竟成了那一階段考驗我們和前來做志願者的學生的一大挑戰——能順利上廁所，才有可能留下來。

我們最初的想法，就是要為基層流動女性做些事情，我們找到了大家居住的地方，也做了調研，了解了大家的基本狀況。那我們就要和她們在一起，來看看我們做些什麼事情能滿足大家的需求。成立之初的那段日子異常艱辛。剛剛半年，機構就面臨著生存挑戰，沒有任何資助了。我們是各奔前程，還是繼續堅持？經過一個會議討論，最後幾位伙伴不約而同做出了決定：留下來，一起面對挑戰。用春芬的話就是「只要有饅頭吃，我們就要做下去」！之後我們就開始了長達一年左右的吃「饅頭大餐」，睡「貴賓桌」（把桌子拼起來當床）、「貴賓地」（打地鋪）的日子。當時大家願意堅持下來，是因為我們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認為我們所選擇的是非常有價值和意義的事情，和跟我們情況差不多的姐妹在一起，我們不僅僅滿足了她們的某些需求，我們也得到了滋養，這個過程是相互的。跟我們在一起的姐妹和孩子，已經和我們建立了很深的信任關係，有什麼困難會和我們一起討論，甚至把特別難堪的困境講述出來，我們一起抱頭痛哭。



我們在幾乎沒有任何支持的情況下，繼續做我們認定的事情。這些事情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對社區姐妹精神文化的支持和陪伴，我們成立文藝隊，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這些歌舞的內容都和眾人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很多姐妹們聽了我們的歌，好像找到了另外一個自己，加入了我們就有了歸屬感，好像在北京有一個「娘家」。另外一類事情就是社區姐妹最關心的孩子教育問題，我們組織志願者，做四點半課堂、一對一成長陪伴等，讓孩子們得到支持和陪伴，間接地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社區姐妹的壓力。另外就是維持機構運作的二手物品義賣，大家捐贈過來的物資，以衣物為主，我們在社區裏進行義賣，宣導綠色消費，減少物資的浪費，也減輕了大家的經濟負擔，同時支持我們繼續向前。我們真的就像一棵野生土長的小草，有點水就能活，給點陽光就燦爛。憑著對我們所做事務的認同，我們堅持度過了最困難的時候，甚至慢慢地越來越有起色。

2015 年的時候，機構陷入了一個瓶頸期。有內部問題，大家前期投入太多，沒有上下班概念，經常沒有時間休息，做的事情越來越多，好像永遠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又看不到工作成效。我們慢慢地感覺到了迷茫，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外部也充斥著各種對公益的論述。最刺激我們的就是所謂「老小樹」，意思是機構成立了好幾年還發展不起來。對號入座，我感覺「木蘭」就像是一棵長不大的樹，甚至還不能說長成了樹，我們還是一棵在艱難生長的小草。隨時一個危機，就可能讓這棵小草活不下去。

那段時間我特別焦慮，經常失眠上火，見人的時候，常常滿嘴火泡兒，一個正在長起，另外一個剛剛結痂，被凜冽的北風一吹，一張嘴就裂開，血就滲出。自己又強撐著，不肯也不知向誰說，偶遇朋友關心問候，就會突然紅了眼眶，不敢和人對視，不敢把脆弱的一面給人看見。當時的我在個人生活中也像陷在泥沼裏的女人，困在婚姻中找不到自我；有過喪偶式育兒的苦悶，苦苦掙扎著尋找愛和出路。我努力思考我的人生到底哪裏出了問題，嘗試用各種方式去改變自己，改善夫妻關係……在苦悶中掙扎，深深地陷入了自我否定，一點也找不到自己的成就感和長處，甚至覺得活著的自己像是行屍走肉，沒有任何價值。那段時間，是我人生至暗的階段，像是永遠都走在漫長的無光隧道裏，時間像是永遠都處於黎明前的黑暗。

個人層面，好在有眾多朋友以各種方式陪伴著我，有長長的電話，有相擁而泣的共情，有持續不斷的支持，有……最終，經歷了一番艱難的歷程，我結束了近 20 年的婚姻。自由需要爭取，也是需要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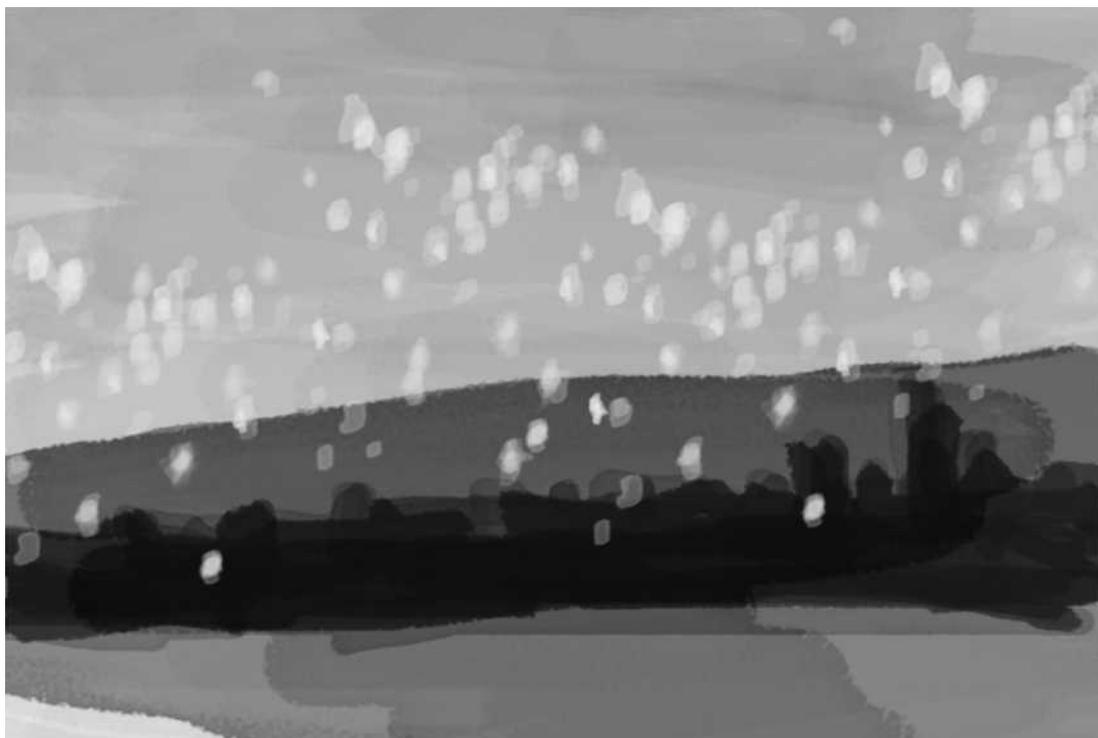
應的，只能慢慢地從泥濘中拔出腿來，一步一步向前邁。最終我發現，一個人的日子也可以充滿快樂、自主、自由！

機構層面，與社區伙伴及其他合作方建立起新的合作，像是給我們打了一支強心劑。我們看到每個個體的力量，也看到每個組織的不同。我們就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陪伴著我們社區姐妹。當把心態放慢下來，人就不再那麼浮躁，反而有可能給到社區的姐妹們更多的支持和看到更多可能性。接著，我們在機構的工作上也做了調整，放棄大而全機構的預期，根據現實的條件和人手做了一定程度的精簡。比如，我們停止了社區二手店的運營，也減少了一部分兒童活動。我們找回自己的初心，把深度陪伴、促進姐妹成長和發聲作為我們工作的核心。我們同事慢慢認可木蘭的「小而美」，我雖然不能認同，但也不再自我對號入座「老小樹」的評判，甚至覺得我們本身就是一棵倔強野草，自有草生存的價值。我們不是參天大樹，那就好好地做一棵「春風吹又生」的野草吧！

我們就這樣彼此扶持著，慢慢前行。我們團隊陪伴社區姐妹，也在陪伴彼此中互相汲取力量，一起面對生活和工作的挑戰，改變自己也改變他人。這些年，我們的姐妹因為家庭原因或外部壓力，有的離開了北京回到家鄉，有的去了別的城市，還有一些留在社區，繼續跟我們在一起。我們也慢慢接納了這種「流動」狀態，因為「在一起」，並不以物理空間為限定。

姐妹們的成長最初以關注孩子為主，在我們的引導和陪伴下，也開始關注自我的發展。我們以發生在自己身上真實的事情，在外部的支持下排演了一部《生育紀事》來講述基層女性的生育困境，讓姐妹們經歷過的苦難與艱辛可以表達和被看到，甚至讓這個話題被公共關注和討論。通過講述，也讓我們姐妹們有機會得到療癒。此外，我們也成立了自己的手作坊，媽媽們發揮自己的特長，一起做手工牛軋糖、雪花酥等，用我們的雙手去創造不一樣的生活，相信勞動對於生活的價值。手作坊雖然只是一個小的團體，但我們每個人都是這裏的勞動者和管理者，這是屬於我們的空間。記得剛開始時，姐妹們不習慣開會討論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意見，當我們慢慢推動，尊重每個人的意見和想法之後，大家也慢慢地願意坦誠地說出自己的想法。這個過程其實既是賦權賦能的過程，也是每個人成長的過程。在這裏，每個姐妹都有了成長的機會，不再是工具異化的人，而是身心與精神都獨立且完整的個體。

木蘭從不知道能存活多久，到不知不覺中走過了 10 年，我們以



自己的步調，走我們自己的路。回望來時路，有感慨有淚滴，是經歷也是沉澱。我們熬過了疫情，進入到了後疫情時期，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和質疑。但是我們團隊的整體心態從容了很多，彷彿人和機構都到了一個成年期，不再那麼懼怕變化和未知。即使面對壓力，也心知肚明無可逃避，只能面對，所以倒也坦然了許多。我們不再怕機構「死亡」，選擇向死而生，就能從容地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做公益的十幾年裏，有挫折，有困頓，至今依然躊躇前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木蘭的本命年，木蘭 12 歲了，我 48 歲了。回望這有晴有雨的 48 載，感謝生命，也感謝相遇的每一個人。路漫漫其修遠，前路仍有濃霧有坎坷……看清生活的真相，還依然熱愛生活是一種勇氣。我選擇活在當下，無愧當下，盡心盡力做好每件事，努力工作，認真生活。木蘭選擇向死而生，努力活成一種綻放的姿態，是小草也好，是野花也罷。我們不追求高大上，就認真平凡地做我們能做的事情，和我們社區姐妹一路同行，一起面對未來的坎坷路途與更多的不確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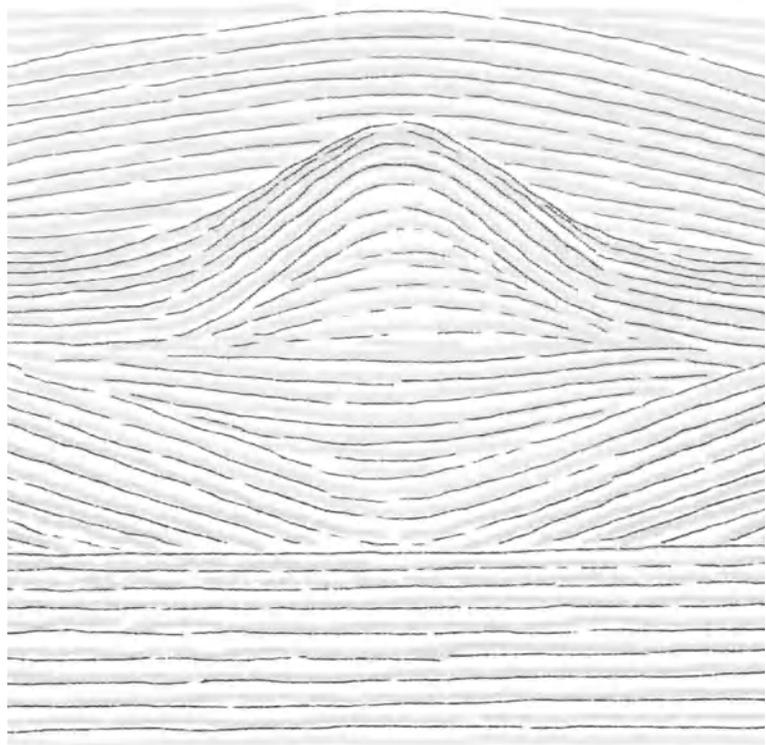
■ 木蘭 北京木蘭花開社工服務中心創始人之一、總幹事。

很顯然，2011年3月11日侵襲日本的東北大地震與福島核電站爆炸事故，是促使日本人從各個角度對自己的生活方式進行審視的重要契機。在那之前，我們以為自己已經發現，如果社會不做出改變，那麼地球絕對不可能持續發展，與此相應人類也無法持續，因而想要發動社會變革，並且採取了行動。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上述事件使我清楚地認識到，之前我們並沒有認真努力，或者說我們的行動還不夠充分。

我們隨意揮霍電力，不去弄清楚電是用什麼方式生產出來的；優先選擇便利的生活（而不考慮其對環境的影響），網路上訂購的商品很快就送到家中；而我們使用的化石燃料也是有限的資源……我們對這樣的系統不抱任何疑問地生活著。

災難之後，我遷居到東京以外自然環境豐富的地方，改變生活方式，開始一天一天用雙手創造自己的生活。具體來說，就是自己吃的食材自己種植；自己用的能源自己生產；自己居住的房子也和木匠師傅一起建造。



我眼中的「韌性」

文一 吉田俊郎

翻譯 殷毅

我開始以與自己小小的身量相符的尺度生活。

可是，「僅憑這樣遠遠不夠，根本不可能成為可持續的社會」——這個想法充斥著我的腦海。我認為為了地球和人類社會能夠生存下去，為了自己未來的孩子們今後能足以幸福地生活，我們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這些事情可以大略分為兩個方面。

一方面，踐行儘量不給自然增添負擔的生活方式，同時讓大家看到，這種生活並不需要勉強忍耐，而是能夠快快樂樂過下去的，是可能實現的。

另一方面，不單單是靠自己一個人努力，要與在同一地區的人們或抱有相同想法的人們共同努力、相互支持、相互幫助、一起成長。

我還認為，在迎接大轉變時代到來之際，我們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韌性」這個詞，從意象上來說，有彈簧墊的感覺。當某種巨大的力量從外部施加而來，它像彈簧墊一樣，作為緩衝材料來緩和壓力，能起到減少衝擊的作用。它是社區這樣的地區團體在發生大問題時，大家聚集起來相互幫助、互相出謀劃策，度過危機的一種印象。

「韌性」為什麼會產生呢？在寫這篇文章的過程中，這個問題在我的腦海裏閃現出來。在自然界中，生態系統為了存續下去，一定是萬物各司其職，相互補充，其整體就是恢復的力量吧。與此相仿，在人類世界，當發生嚴重問題時，人們也會將彼此的技能、智慧、愛凝聚在一起，成為從頭再來的力量。

我們要將大家各自擁有的技能、智慧、愛放在一起進行作業，不過這些技能、智慧和愛如果不在日常就進行磨練，那在發生問題的時候也有可能發揮不出來。所以，我們平時就有提高個人生存技能、智慧的必要。

可現代社會丟棄了這件事，而把時間和注意力集中在了賺錢上。

在轉型運動中，社區正在培育這些技能、智慧以及深刻的洞察

力和愛，從而提高「韌性」。也許正因為如此，我有了將一生傾注在這個運動中的想法。

可能這就是轉型的魅力。

先來簡單說明一下日本的轉型運動。

轉型城鎮在日本始於 2008 年，事情開始的契機緣於原來和我一起學習過樸門永續的伙伴之一——曾經住在英國蘇格蘭生態家園芬德霍恩（Findhorn）的榎本英剛先生，他邀請我和另兩個同期同學一起去聽在芬德霍恩宣導該運動的羅布·霍普金斯（Rob Hopkins）先生的演講。

具體行動是從榎本先生歸國後居住的藤野和我的居住地——同屬神奈川縣的葉山，以及東京郊外的小金井這三個地方開始的。

與此同時，我們創立了以在日本普及轉型運動為目的的「NPO 法人轉型城鎮·日本」。眨眼之間，轉型運動在日本廣泛傳播，目前約有 70 個地方在進行活動。

其中尤為活躍的，在世界多個國家都為人所知的藤野，是華德福學園和日本樸門永續中心的所在地，那是一個具備華德福和樸門永續理念且將之付諸實踐的人們居住的地區。

我將把這個地區的情況作為「韌性」得到提高的案例來進行介紹。

包括榎本先生在內的核心成員們著手轉型城鎮藤野的建設沒過多久，以能源自給自足為目的的「藤野電力」與社區貨幣——「萬屋」就開始運營了。「萬屋」是有 350 個家庭、大約 500 人參加的帳本式社區貨幣。

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難時相互幫助，以這個服務來進行交換，並按商定的金額，以與法定貨幣「円」完全沒有關係的「萬」為單位，在帳本上進行登記。提供服務方是正數，接受服務方是負數。

這是一個即便是負數也能繼續使用的系統。大家並不覺得負數的人不好，而是認為負數的人激發出了本地區擅長的事情，對地區做出了貢獻——「萬屋」以這樣的思維方式進行運營。

加入這個社區貨幣的條件只有一個——必須聽取這個系統以何為重，以及該社區貨幣是以相互幫助為志願和目標的說明，否則不能入會。

入會後，人們首先要把看起來能夠為地區做出貢獻的事（自己能做的、拿手的事情），和希望別人為自己做的事寫下來進行提交。大家可以在網路上看到會員各自能做的事、需要別人做的事的清單。

根據運營規則，交換通常利用郵件組來進行，通過向郵件組報告投入服務的人最終是什麼樣，可以讓社區成員了解到相關情況。

社區成員中會發生各種各樣的交換，我來舉幾個例子。

一種是，「沒有去車站的公共汽車，是否有人在這個時間去車站？請送我到車站」之類；

其次，「我有個不用了的不銹鋼鍋，有沒有人要用？」像這樣的交換也頻繁進行著；

第三，「我家門口有個很大的蜂巢，有沒有人能幫忙清除掉？」這種情況的結果是附近會趕蜂的人去幫忙把蜂巢清理掉了。

能夠切切實實地感受到，由社區貨幣而產生聯結、進行相互交換的社區，已經具有了相當的「韌性」。有的地區擁有十年，還有的地區擁有著 20 年以上使用這個系統的實際成果。

再舉一個轉型運動對提高「韌性」有幫助的例子。

轉型運動的特徵是三個 H（Head, Heart, Hands），重視頭腦與心靈、身體的平衡。腦處理資訊、進行思考；心是指內心；身是指實際具體地使用身體創造事物。

心的轉型對於提高「韌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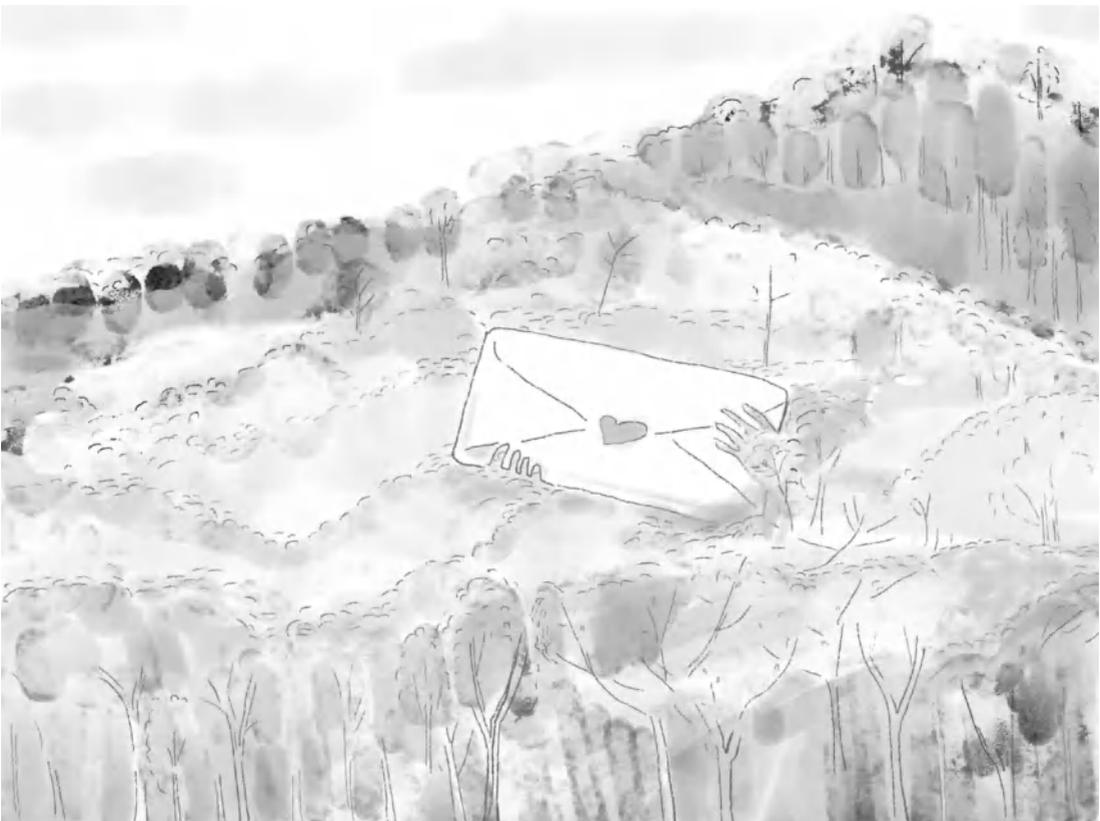
具體來說，在開會的時候，我們會先請所有人用簡短的話說說現在自己（內心、環境等）處於什麼樣的狀態，通過了解同伴現在的狀態和心情，從而能夠相互支持，這是我們的目的。

除此之外，會議不僅僅是為了做什麼事而舉行的行動會議

（「Doing meeting」），還會召開存在會議（「Being meeting」自己真實的樣子、存在），這是我們以通過關懷彼此的內心來預防燃盡症候群為目的，一直做到現在的事情。我覺得它是轉型運動能夠至今為止長期持續的重要原因。

有人說在社會中為了生存要竭盡全力，但我覺得他們也許是被為了生存而竭盡全力賺錢的幻想囚禁了。為了生存而賺錢是他們的第一目的，賺錢這件事不知不覺成了目標。拼命活著，卻忽略了享受生活，是非常悲哀的。生活在帶給人們這樣認知的現代社會，多數人都非常痛苦，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尋找從這個輪回（為了生存賺錢，不賺錢就活不下去）中解脫出來的道路。

我感覺，「韌性」的要素之一是多樣性。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如果沒有多樣的個性和個體，就應對不了巨大的危機和風險。如果大家都是相同的，即便有想法、技術、經驗，也擴展不出更多的可能性，無法與出現的問題相抗衡。多樣性不就是生命所擁有的，



活下去的本能嗎？因為有多樣性，所以能夠處理各種問題。如果是單一狀態的話，那就一損俱損了。所以我認為，如果一個社會不重視多樣性，那它就是不堪一擊的，絕對談不上有「韌性」。

在日本，由於 2011 年東北大震災的經歷以及近幾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想要大幅度改變生活方式的人明顯增加了。辭掉都市的工作，移居到鄉村的人越來越多。

舉一個與「韌性」相關的例子。從 2011 年的東北大震災逃離出來移居到九州阿蘇地區的人們，在五年後的 2016 年被烈度 6 級的熊本地震襲擊，本地居民有的房子倒了，有的屋頂塌了，之後的大雨又把泥沙沖進屋內。那時，移居過來的伙伴們沒有去避難，而是幫本地居民搬運泥沙、收拾房屋、收集食材等，一直進行著志願者活動。他們自己也受災了，但是曾經戰勝了巨大困難的他們在為幫助其他受困的人而行動。

人類真的是太堅強了，太美好了，我深深感到欽佩。

在日本，由於氣候變化和人類的過度開發，因集中性暴雨引起的泥石流災害和大型颱風等造成的受災情況近年來越來越嚴重。

在這樣的狀況下，地區的人與人之間相互聯繫，互相信賴，共同致力於地區的課題，相互幫助，生活下去。我覺得這才是真正必要的，提高地區「韌性」的關鍵所在。

文 | Kijtiwachakul Dhammanond

翻譯 | 繆睫

校閱 | 陳宇輝

顧曉峰

賈麗杰

危機中的慈悲螺旋之舞



自新冠肺炎爆發，我的生活，包括應對諸多變化，為我帶來了許多深刻的思考和影響。我一直渴望和PCD網路的好友分享我的想法，但整理成章還是花了好一陣子。

在這一年半的時間裏，我一直對自己、對其他人以及事情的發展保持充分的覺察。有些宗教人士說我們可與外界切斷聯繫，但我正在學習既進入集體中去共苦，又可抽身稍事休憩。就如同一個頑皮的孩子，享受在雨中的泥淖裏嬉鬧上幾小時，然後回家擦洗乾淨，重新暖和起來。這本是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一幅圖景，如今在世界上的大多數地方卻不復再。這也跟人類靈魂深處的恐懼有關。我們自身的錯覺和無知也造就了世界如此。對平民百姓而言，撥開重重霧霾去理解這多重關係下的狀況，實為艱難。

這現象讓我想起了米切爾·恩德的著作《毛毛》。故事中，有一群人鼓動大家把時間存進銀行，以換成金錢。從此，大家再沒有時間去關心和傾聽他人了，除了一個叫毛毛的女孩。現實中也類似，某種力量好像正利用我們內心深處的恐懼、貪婪和錯覺控制著我們。在我看來，我們似乎被推入一個毫無選擇的境地。例如，人們

覺得諸多藥物、疫苗和昂貴設施的發明，才足以帶來免於感染新冠肺炎的安全感。我卻在思忖別的，比如可以如何提高自身免疫力？如何從整全健康的維度來面對疫情，並且能持久見效？

許多人把自己的安全拱手交付政府、公共健康部門和科學家來守護，而非依靠自己的力量。你是否想過，諸如新冠肺炎等疫情為什麼會爆發？你是否想過，你對資源的利用會如何影響環境和其他生命？你日常生活中產生的大量垃圾何去何從？這種不當的管理會帶來什麼影響？如果我們意識到現在面臨的一切是所有人共同行為的結果，我相信我們對當下的情況會有更多的覺察、接納，以及意識到自身所負的責任。我們集體對地球和環境的所作所為，現正反身影響著我們。

雖然我意識到集體的命運，但也相信作為個體，我也有選擇並創造自己命運的自由。我相信自己不止可以淨化身體，還可以淨化我的能量 / 生命體，同時在我周圍創造出乾淨的空間。我和朋友一起做冥想和心靈練習，以拓展安全、乾淨的環境空間。因此，我相信即使形勢嚴峻，卻不等於所有人都難逃一劫。那些有著強大意志和精神的人將能找到出路，並引領他人脫離苦難。

我開始回歸簡單的生活。我的房子周圍有一個小園圃，在離家兩小時車程的地方還有一片稻田。我感到很富足，不只是因為過去幾年裏能自給自足，還因為我有能力為一些社區提供稻米和食物。在第三波新冠疫情期間，我召集朋友們發起了「危機中的慈悲行動」(Compassionate Actions in Crisis, 簡稱 CAC)。作為一名「生命傳記」諮詢師 (Biography Consultant)，過去我面向個體和團體開展工作，陪伴他們回顧自己的人生旅程，支持他們尋找自己的使命。我在社交媒體上召喚志同道合、想要加入 CAC 的伙伴，當時吸引了約二十個人，其中有一半成了活躍成員。CAC 為窮困社區提供緊急援助，比如食物、草藥和醫療用品。

此外，我們發展出了清晰的使命，即幫助社區發展自我覺察意識、加強心靈層面的免疫力，推廣有時被稱為「輔助護理」(Complementary Care) 的整全健康護理。CAC 發現，很多感染者無法去醫院就醫，只能接受在家隔離治療，由公共健康部門讓醫生基於病人的症狀進行遠程電話指導。CAC 認識到，上述的治療系統有所欠缺。首先，患者的恐懼和焦慮是弱化他們的免疫系統、讓他們難以痊癒的原因之一。於是，CAC 通過錄製視頻與視頻通話，線上教導社區志願者及患者運用呼吸練習和外用草藥（如背敷

薑片）、泡腳等方式來應對恐懼和焦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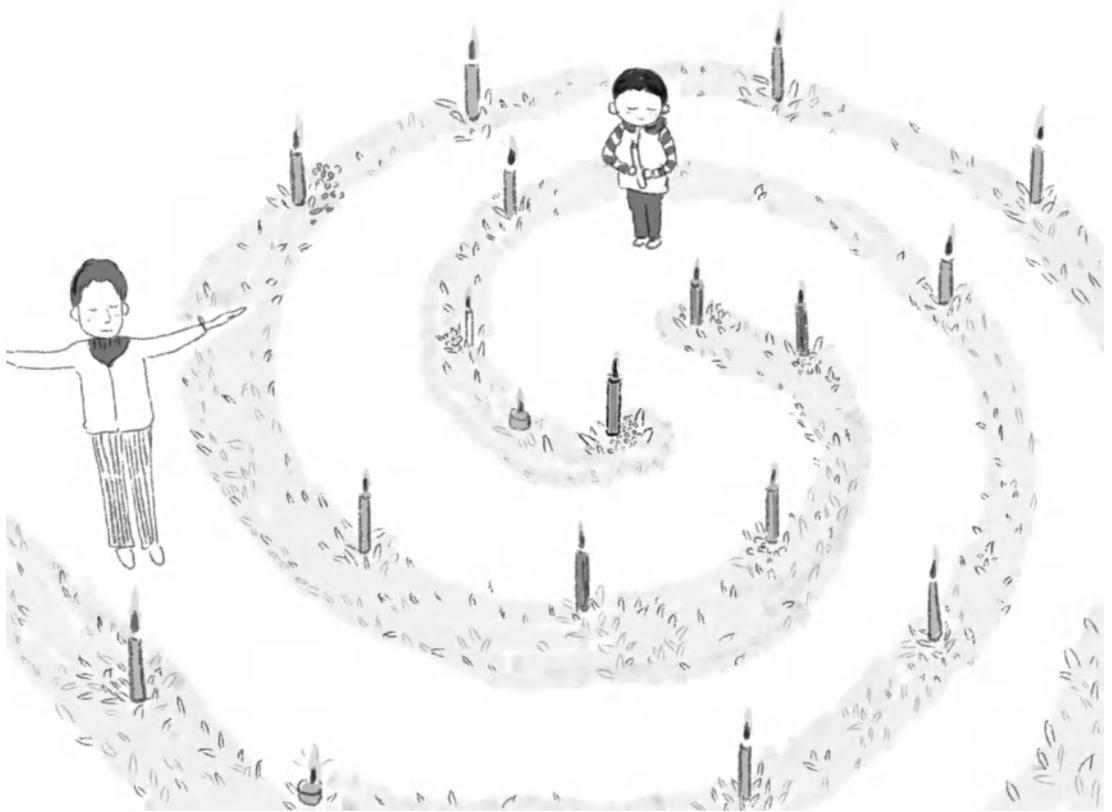
我們將曾深入交談過也對輔助護理感興趣的社區與有資質的草藥供應商對接起來。在有共用廚房的區域，我們設法提供新鮮的草藥，同時把幹制草藥提供給在家隔離及分散居住的人群。現在情況有所改善，社區領袖也請纓要傳播這樣的經驗。雖然我們對社區的直接支持很快就結束了，但輔助護理的理念和經驗仍會發展，一方面在某些社區繼續探索，另一方面也會在更大的公眾層面傳播。

總而言之，我們在這次危機中抓住了為社區服務、培育社區的機會。兩個月不到的時間，我們籌措了近一百萬泰幣（折合約二十一萬人民幣）的資金，惠及約三十個泰國社區。我無意誇耀，只是想說很多東西似乎從無形的富足之源流向我，再通過我流向真正有需要的地方。通過感知那引領我的聲音，我順著其節奏去工作，又在與人互動過程中經驗了彼此的內在成長。同時，我決意在行動前先澄明自己的思緒和動機，掂量內在的感應和外部環境，以及確保我的行為不會產生負面影響。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間，我尤其清楚地看見，自己的狀態有如華德福學校的冬季儀式之一：在「深冬花園」裏走螺旋——走進螺旋中心並點上一根蠟燭，然後走出去，把點燃的蠟燭放在螺旋小徑上。我向內走進自己，向外與世界相遇。在日常生活中，通過安在當下我獲得內在的力量；不管是來自可見的還是不可見的存在的呼喚，我都欣然接納與擁抱它們。而我的內心似乎也被點燃了，當我向外走的時候，我可以呈現偏見更少和靈魂更美的自己。

上述的體會，可以用在家隔離政策宣佈之前的一個例子來闡述。那時我剛結束在印度一個月的能量治療學習回到曼谷。幸運的是，我回來後能以遠程治療維持生計，而學會了烹飪也使我對生活和所有生命更加敏銳。接著我挑戰自己，通過藝術和按摩療法為七個人（五名兒童和兩名成人）進行療癒。過程中我以愛和關懷與他們接觸，讓我與更高的精神相連。在一呼一吸中，我體會自己是傳送療癒和保護能量的通道。

在與人們（主要是案主）相遇時，我將自己錨定在以下的信念中——人類內心的能力在淨化之途上的作用。我靜觀新聞中的負面能量和社會中的恐懼在自己內心和思想中引起的反應。我的心並沒有因病毒而動搖，卻為受苦難的人而顫抖，尤其是那些因失去至親而悲痛的人。



在第三波新冠肺炎流行期間，我在電視新聞上看到泰國喜劇演員阿爾科姆（Arkorn Preedakul，更為人熟知的名字是 Khom ChuanChuen）在 2021 年 4 月中旬感染新冠病毒。新聞片段中他被抬進一輛麵包車，但他的親人卻無法觸碰到他。親眼目睹永別的場面讓我非常痛苦。他的家人竟然沒有機會擁抱他、表達他們的愛。這次分離，殘酷而孤獨。

我深感悲痛，想為阿爾科姆、他的家人和其他處於悲痛中的人做點什麼。我前往我正念導師的靜修處，希望對包括新冠病毒在內的所有生命表示悲憫。雖然在某種程度上，我能理解疫情是生命演化和能量擾動的一部分，如前文提到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但我仍為疫情帶來的失去與分離而悲傷。在靜修中，我為世間承受的苦難痛哭流涕。有時候，我覺得好像從空中俯視大地，看到飽受苦難的人們卻無能為力。二十天後，我感到我的內心、我的思想、我的覺受都清醒過來了，我充滿著信念：我有足夠的光亮和溫暖來療癒人們

的靈魂。我離開靜修處，再次向外面的世界敞開心扉。阿爾科姆在六十三歲時死於病毒感染，我向他表達了誠摯的愛和感激，告知他其離開給我、也許還給很多人，帶來了新生。

我於此階段的內在轉變也將一些新的面孔帶入我的生活。在「生命傳記」的工作坊和一對一諮詢中，我可以就內在成長分享更深刻的體會。我也更委身於為邊緣學校、志願工作、療癒支持等方面的人們提供幫助。現在我能做的事情比想像中多得多。舉些例子：一些社區領袖有意對外傳播他們和 CAC 的合作，分享以輔助護理作為應對危機、加強整全社區關顧的經驗；一些社區志願健康小組也在利用 CAC 的海報進行社區教育工作。這讓我意識到，只要時間和地點適宜，又能滿足人們的需求，那事情就能流動、擴散開來。

當時機到來，只要我們認真傾聽，就能讓事情發生並推動改變。我反思到，我的經驗會成為我的人生假設。在生活 and 工作中與世界相遇，是對這些假設的試煉。我已經用自己的人生經驗確切印證了好些假設。比如，我們的內心越強大，越多的挑戰就會隨之而來，以促進我們的內在成長。另一個假設是，只要還有一個人是在受苦，就沒有人可以幸福。當我們都有意願為全人類的福祉而努力時，那就意味著我們身處的時空正備受祝福。

見・遠——空間設計與生活

第二部分

我們對於自己生活所在的地方與空間，有時候會太過於習以為常，甚至會忽略了其存在，就像我們忽略了每時每刻都在呼吸的空氣那樣。

對於不少現代人來說，我們生活的空間好像已是命定了的模樣。小至居室的間隔設計、社區的佈局，大至城市的設計、道路的規劃，全都被設計規劃好，不容置喙。但想深一層，也許現實有更多的可能性：動手做個小傢俱，重新佈局室內空間，參與社區花園的設計與營造等，都是我們可以參與到空間設計的入口。如果這過程能更好地向大自然學習，並和社區社群的朋友共同參與，那我們的生活或許會有很不一樣的改變與提升。

這一期的見遠以「空間設計與生活」為題，邀請多位朋友與我們分享他們在空間設計裏的探索與思考。在北京蓋婭設計創始人高健的訪談中，我們了解到參與式設計、生態設計等理念如何發展與演變，泰山與他的伙伴如何把相關理念應用在他們的社會企業當中。在另一篇訪談裏，田蕾、甘傳與郭子怡老師從「在地計劃」的探索中，

聊到鄉村營造的種種經驗，也深刻討論到村民、設計師與社區工作者在當中的角色與學習。

陳孟凱老師是合樸農學市集的創始人，他的文章為我們分享了一個由老舊釣蝦場改造而成的社群活動中心「樹合苑」的經驗，並展示了樸門永續與社群發展的理念如何透過空間來呈現。楊向若與王慈航走訪了珠三角的一個民居，從主人家身上體會到文化與生態視角如何在一般的民房中像神奇的花朵般長起來。最後，原來在建築事務所工作的阿樂與我們分享，近年他積極參與香港南涌的生態社區建設，並與伙伴們摸索自然物料在建築上的應用，以及過程中的身心體會。

不管是在草原、山嶺還是海邊，人類的祖先大部分時間都能從大自然裏汲取養分與智慧，營造自己的生活空間。希望未來我們可以有更多有趣的探索，構建出各式各樣讓我們可以樂在其中的可持續生活空間。

高健（自然名：泰山）是自然之友·蓋婭設計工作室的創始人、首席設計師。他在「參與式設計」和環境教育及生態景觀方面，均有多年實踐經驗，尤其熱衷於運用參與式設計普及公眾生態景觀教育。圍繞「空間設計與生活」的主題，我們邀請高健分享他與「參與式生態設計」結緣的故事，不同設計思潮的演變，以及如何把生態設計和公眾的日常生活結合在一起，從而讓更多人參與到關照環境的行動中來。

冥冥之中找到方向

你畢業後便在設計院當景觀設計師，後來是怎樣走上生態營造之路的？

當生態營造師之前我在一間有藝術背景的設計院工作，它比較在意一些圖形化的設計，講究藝術構圖，形態好不好看，曲線美不美，但忽略了科學和生態的面向。做了一段時間後，因為社會、環境問題頻頻發生，加上我在北大學習，接觸了一些生態設計的理念，認為不應該再這樣做設計了。

2011年我辭掉了設計院的工作，去尋找自己的路和使命。當時我參與了不少自然體驗教育活動，像自然體驗師培訓、無痕山林（Leave No Trace）、地球守護者（Earth Keeper）、綠希望行動等，參與過程中童年的記憶就回來了。用我創作的兩首詩來總結就是「微微春風放風箏，夏日炎炎捕知了，秋收麥忙鬥蝓蝻，寒冬臘月打雪仗」，「鄰里互助蓋瓦房，兒童上學結成幫，村莊自籌鬧元宵，老人鑼鼓都在行」。這就是我們小時候的生活，在「自然的遊樂場」裏長大，鄰里社區互幫互助。這些體驗式的自然教育活動讓我重新體驗到大自然的美好，找回了心中對自然的熱愛，還有以前村莊裏簡單純樸的鄰里關係。

在那三年裏（2011年-2013年），我也把時間投入到志願服務裏。當時我已加入了自然之友當志願者，知道有伙伴申請了替打工子弟建設綠色校園的專案（後稱綠校園計劃），那裏全是廠房、平房，環境不太好，我就想用自己的專業能力為他們做點事。大家都知道在環保組織做事，基本上都是用參與式的方式，有了這些體會後我挺有興趣帶著公眾一起營造綠色校園，但我不知道什麼是參與式設計，參考了臺灣一些案例便試著組織活動。我運用僅有的一點對「參



與式設計」的懵懂理解，參與主持設計了 3 所打工子弟學校¹的校園環境改造。我們每月舉辦一次活動，讓小朋友畫出他們對校園的美好願望，然後把它整理成一份數據，找資助方申請資金，申請完以後再把它細化成為一個可實施的營造方案，然後帶著志願者和學校的師生一起共建，最後建成一個生機勃勃的結合了菜園和花園的校園面貌。那時候沒有這種生態營造付費的行動，更多的是向社會招募志願者，每次來的人還不同，所以接觸到參與式的設計，是一個機緣吧。這段經歷成為我後來「參與式設計」職業生涯的啟蒙和活課堂。

直到 2014 年我參與改建北京蓋婭生態花園才發現更明確的方向。當時用了兩年時間在 40 平方米的庭院開設了 24 場設計營造工作坊，招募了 600 人次志願者參與，把水泥造的普通院子改成具有環保教育生態理念的低碳花園。這場實驗還獲得 2016 年度「福特環保——社區實踐獎」，評委說我創造了一種新的社區營造模式，值得推廣到更多領域去影響更多的人。我一下子被點醒了，因為我還是對在自然之友做的參與式生態設計比較有興趣，因此跟自然之友溝通後，成立了現在的蓋婭設計工作室，成為自然之友共同體的一部分。

有了這些體驗，你對生態設計產生了什麼新的理解？

我在北京大學學的景觀設計專業，它講究一種生態規劃，以及協調人地關係。生態設計其實是用一種自然生態觀的角度來做設計。大自然裏有各種能量（地、水、火、風）的迴圈和流動，把這些能量和我們場地的功能，還有空間存在的問題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

1. 分別是大興行知新公民學校（2011 年）、朝陽天通苑智泉學校（2012 年），以及昌平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2012 年-2013 年）。

符合自然生態原理的設計，如太陽能的使用、雨水的收集、濕地的保留等等都是生態設計的體現。而我接觸環保機構後產生了另一個思路，就是除了自然生態的可持續，還要照顧到人的部分，亦即人文生態，包括人和社群的連結、人的賦能、人的行動能力的構建，以及人如何參與到可持續環境的行動中，然後成為綠色公民行動生態網路的一部分。因此我所理解的生態設計是一種參與式的可持續設計。

設計思潮的碰撞

你提到的參與式設計，以及我們現時較常聽到的社區設計，它們有何分別，又是怎樣演變過來的？

參與式設計是一種設計方法，它可以應用到不同場景當中，社區設計是其中的一種，另外還有公園設計、居住區設計。參與式設計跟傳統的設計方式不同，傳統設計是以景觀設計或建築設計的專業視角看一個場地有什麼問題，然後進行方案設計。參與式設計則強調使用者的視角，設計師的責任在於用專業的知識去組織和協調在地用戶的需求和期待，我們共同商榷去解決場地的設計問題。這是很重要一部分，參與進來才有認同感，以及產生他們自己解決問題的方式。

參與式設計的思潮在二戰結束後興起，20世紀60年代末全球政治經濟發生動盪，發達國家城市化進程放緩。美國是首先出現「公眾參與」和「社區設計」概念的國家，一是源於業界內部的反省，二是源於人們對社會機制失調所形成的社會問題比如對種族歧視作出的應對。設計師開始反思，做設計不是只為長官、政府去做。這些先驅引起了更多人去關注個體和社會底層的需求。隨後德國和加拿大也關注到公眾參與設計。英國在1969年首次有建築師與居民共同設計社區建築，稱為「庇護鄰里行動計劃」(Shelter Neighbourhood Action Project, SNAP)。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末興起造町運動，就是振興鄉村，建造古街的運動，讓整條街上的人一起出來表達，共同參與設計整個過程。

我看到參與式設計思潮的興起和社會經濟發展有關。二戰以後美國經濟迅猛發展，開始思考人民的問題、人的參與感、人的獲得感；之後是英國、日本。日本受美國援助經濟發展得特別快，然後也開始

思考人的問題。後來臺灣經濟發展也很快，被稱為亞洲四小龍之一，上世紀 90 年代起開始面臨居民參與的問題，進而關注到參與式社區營造。

另外一種也跟生態設計有關的思潮——樸門永續設計，可以介紹一下它的特點和演變過程？

樸門永續設計是源自樸門思想，簡單來說是如何照顧地球上的生態系統，如何照顧這場地裏的人，以及分享資源，形成一種社會、生態、經濟三者相融合的生活方式和倫理；樸門設計關注的更多是公眾如何在生活層面進行實踐。

它是源自 1970 年由澳洲的比爾·莫裏森（Bill Mollison）及其學生所創立的樸門理念。莫裏森長期宣導環保主義，但如何實際行動呢？抗議不一定有效。他是生態學家，有一天他到森林裏，注意到腳下踏著厚厚的落葉有機層，扒開一看，裏邊深深紮著土壤的根系，土壤肥沃，水份充足，然後他看著飄下的樹葉，就頓悟了。他開始用自然生態的原理去設計我們的生活和生產。他後來和學生通過研究，巧妙地把跟自然生態有關的學科，比如土壤、植物、動物、能源、水、經濟等等整合在一起，使一個社區變得有生產力，這樣才是可持續的。樸門一開始是從農業的角度，講如何讓貧瘠的土壤變肥沃。因為它是開放給公眾的課程，每次培訓有不同背景的人參與，他們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視角，後來慢慢地就擴展到一些生態的設計，生態的建築，還有城市的修復、防災等等。樸門把各行各業覺得可持續的，比較自然、永續、生態、環保的理念和思想都融合在一起，然後把它翻譯成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讓公眾能夠從身邊的空間如陽台、邊角綠地、房前屋後的空地集結社群去行動。

這些設計思潮對於我們應對國內的環境問題，有什麼啟示？

我們國家的參與式設計是有一定土壤的，從政策制度上來說我國出台的《城鄉規劃法》，其中確切地強調了公眾有參與城鄉規劃的權利，但是實施細則和相關制度不詳。國家的建設更多是政府、房地產開發在營造人居環境，營造社區，這種建設方式會導致許多與使用者之間的問題。第一，我們都知道過去幾十年裏中國的經濟發展非常迅猛。現在發展到一定程度，問題突出且明顯，已經形成一種問題共識，即霧霾、水污染、環境、內澇和城市鋼筋水泥化等問題受到普遍關注。環境問題單靠政府和企業是不能徹底解決的，需要公眾的參與才能達到平衡。第二，我們現在居住的社區，人和

人之間關係疏離，演變成一種原子化的社會，這存在著眾多問題，比如彼此淡漠，社會的社群聯動就會產生問題。人和人之間應該是有交流的，應該符合國家政策宣導的共建共治共用，所以國家的政策如何和人民群眾的行動持續連接起來，就需要大量社會力量的協力共商，比如環保組織、研究機構等共同參與進來。同時需要一些進步的人士，先做出一些案例或行動，例如用參與式設計讓更多人看到這種可能性，然後有更多人從事這樣的職業。

這些思潮對你的實踐又有何啟發？

給我的啟發是一個好的設計既能改善環境，又能滿足在地使用者的需求，還能在人和人之間形成一種有力的行動社群，可以持續把營造的環境使用和維護起來，或者形成一股力量去營造更多的地方。樸門設計就好像一個增加人的行動意願的助燃器。最初的啟發是源於在 2013 年我參加樸門永續設計的認證課程，當時老師在講樸門的原則時，我一下意識到，噢！我原來已經做了類似樸門的事了。

樸門設計講究的是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把專業的東西變成公眾易懂的，讓他們能夠在生活裏實踐。而我當時跟自然之友的伙伴在北京參與的打工子弟校園改造專案，例如把雨水花園翻譯成大家看得懂的內容，也是在講如何把生態的設計和公眾日常的生活結合在一起，讓更多的人去參與，去行動。我堅定地把專業的生態景觀設計、環保組織自下而上的摸索（參與式設計）、樸門永續設計三者融為一體，所以成立了蓋婭設計工作室，它實際上也是我對專業界的一種探索。



生態設計的實踐

蓋婭設計工作室怎樣讓公眾參與生態設計？

蓋婭設計推動「參與式」、「可持續」的設計理念，以設計啟蒙公眾的環境意識，以增強公眾參與改善環境的能力為目標。我們的工作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做可持續環境設計，另一個面向公眾做設計培訓，並聯合社區、校園、自然教育基地的網路形成社群平台，推動可持續的環境設計。經過探索，我們在社區營造綠色環境，以社區花園為抓手，運用共建共治共用的理念，讓居民參與建構社區環境及社群關係。因為公共領域有政策和資金支持，可先從公共領域發揮影響力，從而影響到個人和家庭。

另一個實踐場景是在生態校園，很多學校有閒置的綠地可以被利用起來，把每一座校園建成可持續低碳的生態校園，讓它成為一個活生生的自然教育課堂，一個戶外教室。我們現在做了將近 20 所生態幼稚園設計實踐，讓每一個學校的孩子學習堆肥、雨水收集、種植食物、垃圾分類等，在校園中設計自然遊樂和教學設施，有助於孩子的身心發展。

工作室開辦了 5 個年頭，有沒有看到一些社區的變化？

有不少。比如在北京某個社區，我們去做生態花園營造，一開始去的時候，居民對物業管理有些意見，自然不相信我們外來人；我們到現場聽到的基本上都是抱怨。常規的參與式設計分組討論無法進行，我們就讓每個人發表意見，然後我在黑板上記錄、總結，讓大家看看這是不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問題；問題形成共識後，我們再做設計並將方案彙報給居民。在實際營造的過程當中，對我們懷疑或反對的聲音就慢慢消失了，他們看到了我們的真實行動。令我們特別高興的是，最初的目標達成了。我們的專案結束後，社區居民還不斷在花園中做營造行動，包括今天(2021年11月末)刮著大風，社區居民還在打理花園，他們在群裏發了好多志願者參與場景的圖片。這是從一開始不太積極的局面轉變而來的，從剛開始令人有點沮喪，到後來持續的參與，我體會到我所做的是令人覺得幸福的工作。

2015年，畢業於AA建築學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的Peter Hasdell和郭子怡兩位建築師啟動了「在地計劃」，開始與鄉村社區合作，通過參與式設計探索可持續發展。在地計劃與廣東綠耕社會工作發展中心合作，先後在四川廟壩村、湖南洞雷村、廣東仙娘溪村等社區開展空間建造工作。2017年，在廣州從化良口的仙娘溪村，從小舞台到小廣場，村民們搜集本地材料、投工投勞，以極低的成本將廢棄材料堆積場變為村民開展活動的公共空間。2021年12月，在地計劃團隊的郭子怡、綠耕的甘傳與社區伙伴的田蕾，就仙娘溪的工作經驗展開對話。本文主要内容來自此場對話，由田蕾整理和編輯。

誰築鄉村夢？從仙娘溪村的經驗談起

對話——甘傳 郭子怡 田蕾 文——田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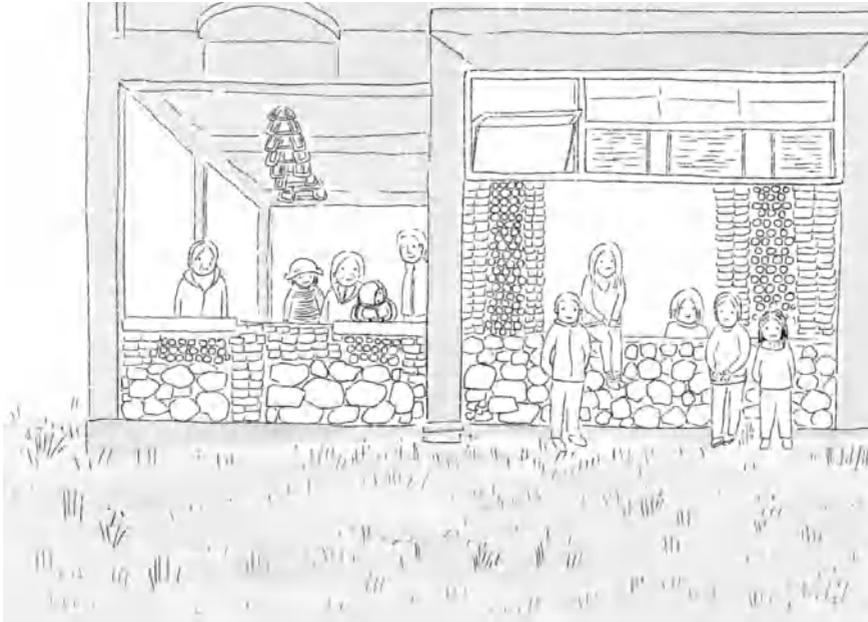
建築可以怎麼做？做什麼？

田蕾（下文簡稱「田」）：之前去仙娘溪，對村子裏的小廣場印象很深，它不像常見的統一的水泥地面或者地磚鋪就的廣場，而是由不同樣式的小方塊組成，很豐富也很漂亮。當時還碰到村民給我指哪塊哪塊是他鋪的，說起來非常有擁有感和自豪感。起初為什麼會想做舞台和廣場的建設？一般情況下建築要投入的資金比較多，但好像當時的資金並不充裕。

甘傳（下文簡稱「甘」）：綠耕以前說我們的工作有三板斧，其中三板斧就是建房子，打造公共空間。在仙娘溪，從一開始就有空間改造的工作，比如最初做民宿，改造當地的老房子。但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只是看到老房子可能有一些歷史文化的價值，希望通過老房子改造，讓村民能重新認識傳統的建築。後來還重修了一個祠堂，祠堂代表村裏某一些姓氏人的共同信仰，恢復後，大家好像重新找回了一種認同感。

當時的理解主要是關注村民生活的空間或者說生活的環境，希望把生活空間變得更好。虛的層面，是希望讓大家重新認識家鄉，以及讓大家能夠看到過程中的這種合作關係。最後這個建築具體長成什麼樣子，我們最初沒有太多的想像。

郭子怡（下文簡稱「郭」）：如果我來解讀社工工作，我認為它是用空間去回應社區的需求，營造社區的公共性，組織或培育一些村民去運營，重點不是那個空間，而是他們怎麼運行、怎麼操作、



怎麼合作。到了建社區廣場，因為我們更注重過程，所以我們把整個建造過程拆得很長，然後在每個環節嘗試融合社區營造的工作。

甘：是的，最初與村民討論建廣場，大家覺得很簡單，比如村民拿出塊地，社工拿點錢，買一些水泥，我們大家一起來幹，直接用水泥硬化就好了。這是村民最直接的想法，但後來我們想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想像。

郭老師團隊在村裏做了材料的調研，發現村裏有些爛鋼，有很多石頭、很多本地的樹木，也有很多廢棄的瓦缸、石條，他們就會在圖紙、模型上把這些材料放進去，讓村民看到這些「廢品」也是可以用的，有了一些更清晰更具體的想像。村民就開始分工，拉著他們的小斗車，看到哪裏有不用的爛磚爛瓦或者爛鋼，就去跟主人聊，把這些收回來。後來，村民想像小廣場邊上是需要有些樹的，我們又說不需要去外面買，看本地有沒有他們自己覺得特別好看的樹，很多村民就說有些樹在秋天長葉子，有些在冬天長葉子，有些會結一些紅色的果子很漂亮，然後他們就上山去找樹了。

那時候，有一個年輕人組成的建築研究小組，廣場所有的石頭都是這些年輕人去河邊一塊塊撿回來的。他們幾乎把村裏的三輪車借了個遍，因為車是要燒油的，但他們不會加油，就靠「厚臉皮」去借。

整個建設的過程男女老少都有參與，而且一個人的行動會影響到其他人。記得當時有一個村民，村裏很多人說他比較吝嗇，但在建廣場的時候需要用桶，他很主動，很願意把自己的桶借出來，基本上從開工到結束，一直都是用他家的桶。可能因為他覺得這是跟大家都有關係的事情，這種社區的氛圍讓他願意貢獻。

過程中郭老師還用到了功德碑的方式。當時有做一個登記表，哪戶人家，捐了什麼材料，投了多少天工，每天都會記錄，最後都會上榜。我們發現大家還是挺在乎這個的，最開始大家覺得投工投勞不可能，後來無論是收集材料還是整個建設過程，都是村民投工投勞完成的。

郭：我個人覺得建築是很有效的進入社區的方式，因為它很大，是個硬體，觸及的面很廣，而且很實在，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我們居住的空間。我們以建築作為一個目標，阿甘他們作為社工去開拓一些關係和交流，鞏固一些價值觀、一些很重要的關係，一起來營造一種夢想，或者理想生活的狀態。剛才說到的功德碑，背後也是在建立一種社區自信、社區歸屬感、社區的夢想。

甘：大家有了一個夢想之後，自己就會開始不斷攪動。通過共同建造，大家開始看到自己的一些能力，重新有了自信，也看到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的可能性。其次就是攪動了大家對社區更多美好的想像，這種美好的想像裏面有「個人生活」的美好想像，但也是包括其他人的，比如說我作為一個年輕人，不僅僅是關於我自己生活的美好想像，也包括村裏的其他人，村子的環境、空間。最後，其實還攪動了村民重新「看到」社區，舉例說，村民現在覺得的資源，過去可能是沒有意識到其用途而覺得是垃圾或廢棄物。

比如建社區廚房，是村裏的阿姨們提出來的，她們有一個小組在做飯，需要一個空間，於是請郭老師來做了一點設計和討論。阿姨們是自己投工去建的，有時間就來一起合作幹幾天，平時大家又幹自己的活去了。這麼一個小廚房，包工頭可能用一個星期就建好了，但她們用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時間才建起來——慢一點，但有更大的認同感和擁有感。阿姨們也沒有把這個空間完全變成自己小組的、私人的廚房，或者只是用來做生意賺錢的地方，而是把它變成一個大家聚會的地方，即使沒有工資或者很少的勞動報酬，也願意為老人家做飯的一個社區廚房。

廚房建好後，門口一開始什麼都沒有，但她們覺得門口應該有



點花花草草，阿姨們並沒有說要去外面買，而是從自己家裏搬了一些花草放在門口。那幾個花壇也是用廢棄輪胎做的，廣場建完之後，她們知道這些廢棄的材料可以重新發揮用途。

田：講社區廚房的時候，感覺當我們談「美好想像」不只考慮個人生活，也把別人考慮進去時，人與人會建立一個更穩固的關係，而且帶來更多安全感，好像也不需要很多錢去購買材料或社會服務，某種程度上構築了一種更有韌性的關係和生活方式。

甘：所以我覺得要跳出建築去看建築，它不單純是一種方法或者工具，更是一個媒介或者一個橋樑，帶動一些關於價值的討論，關於我們期待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的討論。而且，在這種互為主體的建造過程中，參與的每個人都是有成長的，也相信背後的一些價值。

誰是設計工作中的主體？

田：阿甘提到「互為主體」，平時也常聽到郭老師和阿甘提起。看到在仙娘溪的案例裏面，村民有很多參與，互為主體是指參與式嗎？具體的含義是什麼呢？



甘：我覺得進入鄉村很重要的一點是，是否願意帶著一種尊重進入鄉村。互為主體是說我不是很強的，你也不是很弱的，我們各有所長，這是一個基本的態度或者價值觀。比如在仙娘溪，感覺郭老師只是做一些邊邊角角的工作，大框架是大家一起來定的。郭老師畫了一個圖，做了個模型給村民看，然後村民根據想像自己去完成它。開始也只是說建廣場，村民提出要有舞台，才有了現在這個舞台，然後是社區廚房。你說這些建築到底是誰的想法？完全是郭老師的想法？不是。完全是村民的想法？好像也不是。大家的東西都融合在了裏面，最後也很難說到底是誰建的房子，誰建的廣場。

或者說，互為主體是雖然設計師帶著某方面很專業的技術，但是也願意放下自己，給村民空間。村民對一個空間也是有他們的想像的，在廣場鋪地的時候，村民會根據自己的經驗，提出我覺得這樣畫比較好，應該這樣鋪等等。在這個過程中，設計師沒有說大家一定按我的圖紙來，沒有很強烈地去引導某個東西就是好的，或者我設計的就是好的，一定按照我的設計來實施。

郭：參與至少是互為主體很重要的一個方面，而且這種參與不只是來參加，而是大家一起來表達自己的想法，甚至參與決策。我

們追尋的互為主體，其實是找到一種共同的聲音，而不是做事情之前有一個先入為主的目標。但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過程，它像生命一樣，每天都要嘗試做到互為主體，因為你總會做錯事，每天都做錯事，它就變成一個生命的過程，成長的過程。我們團隊也會吵架，可是我們要想辦法去解決，重點也不是建築設計，而是我們要一起找到共識，在村子裏工作也一樣。我覺得這是一個交友的過程，一個探索的過程，一個找到新可能性的過程。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我都不覺得能做成，每次做完我都覺得好奇妙。

田：你們講互為主體的時候，我經常會有一種共同創造的感覺，有的時候大家會說村民是主體，社區是主體，我不是主體，但是感覺談互為主體的時候，好像作為一個外來者，我也是這個事情或是社區的主體。作為一個外來者，我可能有建築的知識、社工的經驗，但進入到這個場域裏邊，我們是平等的，村民願意接納我，我們就一起來為社區做點什麼，至於能做到什麼，就像郭老師說的，有時候是一個奇妙的過程，也不能夠先設想一定要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標，其實是在信任關係裏面去完成一個共同的想像，可以這樣理解嗎？

甘：進進入村子的時候，外來者很難排除自己的想像，往往帶著自己的值觀、希望做的事情。但你要坦誠地跟村民說，村民也會有自己的盤算，有些村民願意接納，願意跟你們試一試，有些不願意。可能過一段時間，有的村民也會走，這些都要接受。

互為主體不能迴避自己的所求，但這種個人的私，是放在共同關係的尋求之中，這種關係是大家都嚮往的，它就有了一定的公共屬性。

郭：我們講參與式設計，不是說聽聽社區的聲音怎麼去設計，是推動社區共同建立一個目標，然後延續一種氛圍。記得有一位老師問星哥（仙娘溪的村民），這群社工、建築師走了，未來怎麼樣？星哥說精神會留下來。我也私下問星哥：為什麼你們會做這件事？他說：就是想試試我們村民會不會有這樣子的能耐，一起去幹一件大家的事。所以他們抱著一種嘗試的心態，也是一種對自己的挑戰和對自己社區的期望。

我們的社會失去了一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我們那麼用心地投入到社區，也是因為在社區工作中找到了溫暖，一種人性的溫暖。互為主體是相同的，不是說進村幫什麼忙，而是在尋找這種人性的

溫暖。為什麼我們參與社區工作？說到底是為了我們自己。我覺得我們在尋求一種理想的人性，一種可能性。

設計師追求什麼？

田：作為一個設計師，感覺郭老師很少談建築是什麼樣子的，設計理念是什麼，常常是在談人性的溫暖、人與人的關係，為什麼呢？

郭：可能跟我的教育背景有關，我跟 Peter 都來自英國的 AA 建築學院，我們的教育背景總是要求我們思考什麼是建築，老師總是在挑戰我們所做的建築和探索是不是真誠，問你這個人可以為這個社會帶來什麼影響，所以這整個過程是在學做人。可以說，這個教育背景引導我們意識到建築是一個探索的過程，跟人的價值觀有關。後來通過古學斌老師¹認識了像綠耕這樣的社工，參與他們的工作，也影響著我們的一些價值觀。

田：在這幾年農村工作的過程中，想法會有一些變化嗎？

郭：作為一個建築師，總想試一些東西，（將想法）實踐出來，是一個很基本的需要。起步時，還是蠻常規的，當初在仙娘溪蓋廣場，開始的時候畫了很多圖紙，對設計成什麼樣子有一定的追求。但對那種所謂的設計或樣式的表面追求，慢慢地越來越少了，這也是我的轉變過程。

田：你說的這個轉變過程，有來自村民的影響嗎？

郭：記得第一次到廟坪村，進一個大叔家，他邀請我坐下來吃飯，到處都是煙，廚房油膩膩的。然後我在那邊跟他聊天，才明白廚房黑黑的，是煙熏的，而煙熏對房子防蟲很有效，他還說這個筷子是他自己做的，牆上掛的一串串辣椒是他自己種的……環繞一個人的全部都是來自他身邊的大自然，怎麼可能？那是我第一次進入大陸農村工作，前幾天我完全被驚到了，因為我來自城市，我的所有東西都是買來的，沒有一個東西是自己做的，在廟坪看到那種來自自然的智慧是很強大的。

這是比較物質的方面，也有精神的。作為在臺灣長大的人，對

於鄉村我們有一種傳統的價值，這樣的價值在英國似乎沒有，在香港這樣的城市好像也找不到。當我們從千里之遙的臺灣過來，竟然在四川找到很真誠、好似回到老家的感覺。那種人與人的關係，尊敬你，邀請你來我家，請你吃飯……在大陸農村，我又找到這種很親切的感覺。

這幾年的工作，讓我漸漸覺得這群人總有一種很特別的氛圍和價值觀，是可以讓我們追溯自己的根的，所以我越來越不注重建築長什麼樣子，有時候做出來的建築沒有很漂亮，但我覺得更真誠。



- 甘傳 2013至2018年曾作為綠耕駐仙娘溪村工作員，把農村和行業當作自己的人生田野，從日常生活中找到感動和社區前行的資產與動力。
- 郭子怡 深圳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講師。畢業於倫敦建築聯盟學院，2015年開始參與鄉村社區發展工作，與 Peter Hasdell 聯合創辦「在地計劃 Insitu Project」的建築實踐研究平台，以社會性建築方式介入社區工作，探索在地性發展理念。
- 田蕾 社區伙伴北京代表處項目主任。

1. 古學斌，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副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研究與發展網路中心執行主任；中國社會工作碩士課程主任。長期參與並支持廣東綠耕社會工作發展中心的工作。

2015年「樹合苑」成立了。在合樸農學市集創辦人陳孟凱與合樸建築伙伴孫崇傑的帶領下，大家運用樸門（Permaculture）永續生活概念與協力造屋的模式，將原本的釣蝦場改建成樹合苑。樹合苑既是空間也是社群，是生活、共學、創業的基地。

樹合苑位於臺中市鬧區通往高速公路的要道上，面積約六百平方米，最早是一間木材工廠，四十年前因為市區發展人口密集，工廠搬遷至工業區，後來改建為八米高的商場空間出租。原來的承租戶是二十四小時經營的釣蝦與電子遊藝場，於2014年離開。此後，出租者希望將空間租給從事環境友善事業的商業組織，但是此地段租金高昂，找到合適的承租者並非易事。當時合樸農學市集已發展七年，累積了一定的友善食農商業經驗與互助社群，值得在市區持續發展，後來決定承租此地，以「友善大地、永續環境」為原則，將舊有空間重新規劃打造，把自然引進都市。

樹合苑的空間設計與生活

文
—
陳孟凱

把問題視為資源的舊屋綠改造

樹合苑原本的建築空間是有四十年歷史的鐵皮屋，為了改善室內陰暗且悶熱不通風、耗費大量能源提供照明與空調等問題，採用了樸門設計，效仿大自然迴圈的綠改造模式。將單層圓拱鐵皮屋頂從中間剪開，改成雙層屋頂的太子樓構造，原理是：透過上層暖空氣上升，牽引戶外冷空氣進入下層，形成自然對流。因為臺灣夏天吹西南風為主，所以設計上考量到冷空氣主要來自西南邊戶外大樹旁的景觀水池，如此的樸門建築設計，好處是「將室內熱與濕排出」，而太子樓空間的庭園宛如溫室設施，適合種植各種綠色植物。有了自然陽光、風的流動與綠意植栽，整個樹合苑變得更加寬敞而明亮！

樹合苑改造的挑戰很多，例如地面中央有一個深一米五、面積五十五平方米的釣蝦池，阻礙動線也增加施工難度。為了把貨櫃屋放到適切位置，必須拆開屋頂與支撐鐵架，使用吊車把貨櫃屋從空而降至預定位置。一般做法會把釣蝦池填平以減少工程的難度，不過具有樸門設計的「把問題視為正面的資源」（Turn problems into solutions）的精神後，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創意產生。後來釣蝦池變成綠樹包圍的下沉式多功能空間，沿著咖啡樹旁綠意盎然的「樹池書坡」，有一種錯落高低的空間感。環顧四周，不難發現塗著青綠



色油漆的貨櫃巧妙地疊置著，搭配序列有致的開窗是空間也是裝置藝術，亦是由高處觀賞樹合苑的好位置。

釣蝦場原來的廁所拆除後，下方的化糞池（Septic Tank）也搖身一變成為正面資源。樹合苑的屋頂雨水回收系統需要大雨時的溢流出口，化糞池成為雨水回收系統的滯洪池。臺灣是多雨的水資源豐沛地區，但如若妥善地截留收集雨水，遇到缺水危機時的可用性就會很高。雨水是天然蒸餾水，理論上很乾淨，雨水會髒是因為清洗空氣與屋頂集雨面（前段水）的關係，所以樹合苑的屋頂雨水回收設計，是先將前段水排除，透過屋頂排水系統順引到貯水桶，搜集「後段水」的蒸餾雨水作為植栽澆灌使用。雨水與陽光透過化糞池上方剪開的屋頂進來，敲除附近水泥地成為室內田園，種植半日照作物例如咖啡、香蕉等。樹合苑以實際成功案例，希望能廣泛地推廣樸門可持續設計原則。

樹合苑也打造了都市內不沖水的馬桶——生態廁所，兼具省水與製作有機肥功能，其機能與衛生運作原理很簡單：如廁後，手動轉盤攪拌，攪動大量的木屑、稻草稈等有機物與排泄物混合，吸收排泄物中的水份，減少與空氣接觸，這樣自然不容易產生臭味。排泄物與下方發酵槽中含有菌種的木屑、腐植土充分混合，利用微生物

物固態發酵原理，半年後就能變成適合植物所需的有機質與養料！

生態廁所以傳統「穿鬥式」木構建築設計施作，與合樸志工們群力建造，用傳統工具鑿榫孔、組裝，再合力把牆面立起。孫崇傑道明瞭協力造屋的精神：「早年鄉村沒有專業建築師，都是由在地家族或村子裏的居民一起動手，因應當地的氣候、習慣、取材興建房子，就會產生不同的地域風格。」臺灣的 9·21 大地震造成農村大量房屋損毀，許多農民沒有經費災後重建，雖然經濟力不足，但是可以運用當地自然取材、居民協力造屋、相互合作等方式解決問題，樹合苑借由生態廁所協力造屋來傳承這可貴的價值與精神。

帶著期許與使命，讓廢棄釣蝦場成為善念聚集的集會所。樹合苑像是在都市中實踐樸門永續生活的學校，學習善用陽光、空氣、水、土等基本元素，從屋頂太子樓到釣蝦池的空間安排，做自然有機的空間佈局，希望讓人有種可持續安身立命的感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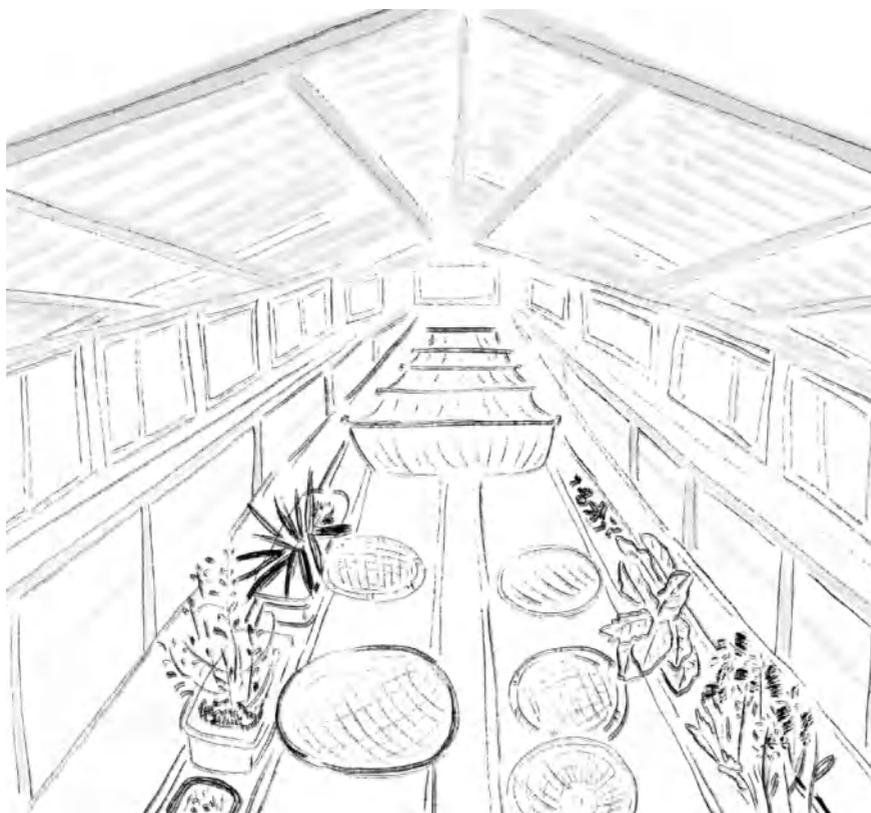
想想，一個舊屋綠改造的空間，一個生產者與消費者相遇的場域，一群有緣人共學共老的夢想基地，該怎麼取合適的名字？最後想到了「樹合苑」！

樹合苑三個字，分別表述了成立的理念：「樹」寓意著生態、自然環境；「合」有團結、合作、聚集能量的意涵；「苑」則是清新、自在、共好的園地。樹合苑的諧音像傳統民居「四合院」，亦是期許能成為喧囂都市中的桃花源。

大家一起參與友善食農「生活」

消費不代表「生活」，美好生活需要「參與」。樹合苑是個「參與生活」的地方，讓來到這裏的生活者放下手機，學習黃豆加工、手工皂、染布、煮咖啡、泡茶、養雞、種菜等等，我們一起透過手作與日常的食衣住行，在樹合苑重新找回人與土地、自然的關係。

樹合苑致力於建立社群共好，成為一個自利益他的友善食農基地。透過「參與」體現自我價值，關心彼此建立互相信任的人際關係，建立對他人有貢獻的「共同體」，進而借由共同體的歸屬感獲得人生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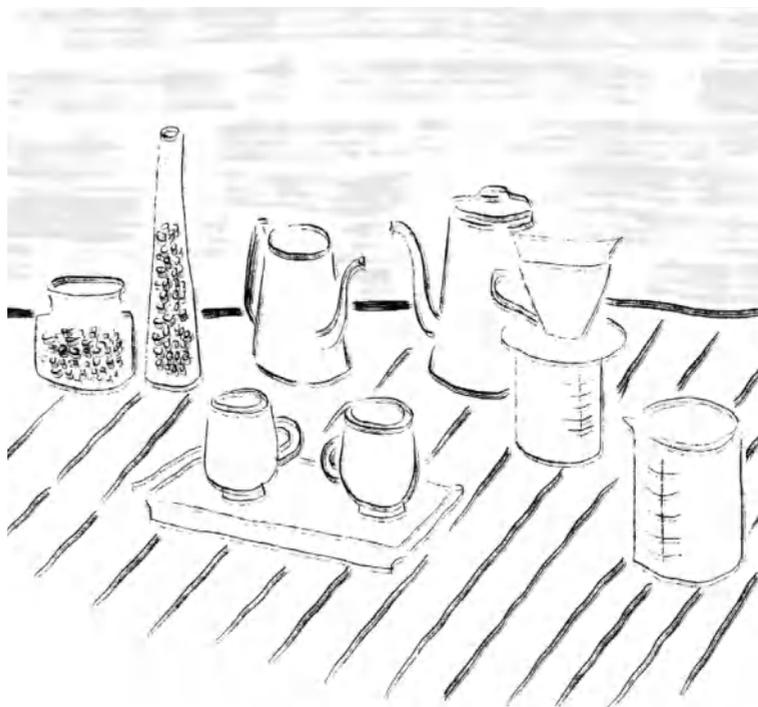


「第二人生」：實踐「創生」的幸福園地

樹合苑重視「做中學」，經常舉辦手作課程，邀請有機小農來教消費者製作友善加工的食品和料理，透過手作讓消費者更了解有機農業的意義與價值，培養「社群力」的同時，也帶動「經濟力」。當人們願意付錢購買安全有機的農產品，才能鼓勵更多小農投入有機栽培，生產對土地更友善、對消費者而言也更優質的食材。

經過六年多的摸索與累積，樹合苑定位逐漸清晰，即針對「第二人生」群體提供「創生」經濟與社會協力的平台。

學員退休後，可以選擇在樹合苑的第二人生「創生」平台，順著自己的興趣與熱情，創造幸福「生活」，賦予「生命」意義，夠



用「生計」收入的三生平衡。以協槓 (Slash) 方式投入友善食農產業，親自動手做農產加工，例如：釀造味噌、鹽麩、豆腐乳，或是學習做豆漿、豆花、豆腐，手沖（公平貿易）咖啡等。在樹合苑，第二人生學員不是以賺錢為第一考量，而是依著興趣與熱情，學習農產加工，創造可持續（有機）農業的附加價值，讓生命更精彩豐富。

「第二人生」優先順序為健康、心情、關係與財務，可持續農業和「第二人生」兩者的價值觀很類似。透過手作營養又安全的食物照顧個人「健康」；因循著友善環境、服務他人帶來好「心情」；過程中將消費者與小農串聯起來，形成互惠的「關係」。雖然第二人生不以賺錢為第一考量，販售專業手作農產也能得到零用金收入。這收入代表社會認可的價值，以及「老有所用，夠用就好」的尊嚴。

樹合苑提供多元的農產加工學程 (Programs)。以百釀千農為例，由無思農莊技術指導，培養一「百」位手「釀」師，支持一「千」位友善耕種「農」友。樹合苑提供符合食品加工安全法規的「加工廚房」與「釀造室」和畢業學員們共同使用，以「聯合釀販所」合作社經濟方式共同銷售與推廣。其他農產加工學程包含百咖萬磅、百染千藝、百牧萬蛋、百豆千菽與百食千蔬等。

合作社經濟：滿足生計、生活與生命的社群實踐

第二人生不只限於即將退休或退休人士，第二人生注重：

1. 多一點合作共好，少一點競爭比較；
2. 多一點「需要」，少一點「想要」；
3. 親自動手，以小而慢的方式取回生活的主導權，找回時間的掌控權；
4. 活在當下，追求自己的熱情與理想。

樹合苑協助團結第二人生學員，借眾人力量共同承擔風險，以合作社經濟方式創造規模分攤固定成本，建立長期穩定的供給端與需求端的經濟合作，讓第二人生伙伴們能創造更多機會與可能性，也讓生命更加精彩豐富。

合作社不是「資本」的組成，而是以「人」為主體，然而單靠理念無法形成道德約束力來讓大家合作，還需要按部就班的學習，建立合作組織成員的互信。樹合苑舉辦多年的合作學包含：賽局理論（Game Theory）合作學；羅伯特議事規則（Robert's Rule of Order）：由下而上集體決策的會議規則；社群貨幣：促進社群互助合作的通貨。

合作學不採用中央權威的老闆或主管管理來強制合作，亦不用道德勸說，而是透過賽局課程的體驗遊戲，讓社員體會互助合作與互動的關鍵，在利己主義的世界中創造雙贏。

合作的基礎是信任，信任的具體操作須先建立共識決策的議事規則，借由羅伯特議事規則的導入，營造社員彼此尊重的文化、積極的妥協精神、權利的意識與理性的思考。

樹合苑是在綠色生態環境裏，讓生產者與消費者相遇和對話的平台。在樹合苑這個大家庭裏，伙伴們不僅以合作社經濟模式協力創業、共食、共學、激蕩，而且有日常的生活互動，樹合苑是實踐可持續幸福生活的互助園地。在此期許每個人都能致力於個人成長，探索我們的使命，感受真正的自由，齊心協力讓生活更美好。祝福大家！

回家

我們在廣東酷熱的夏日午後出發，行駛在沒有一棵樹的高速路上，兩邊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廠房，然後是一片又一片的批發商城。駛進 K 鎮，感受到熟悉的珠三角城鎮那樸實中略顯逼仄的道路尺度。街上一排排的商鋪，幾乎同屬於一個行業，但不同的店名，再配上五顏六色令人眼花繚亂的看板和不停重複的促銷廣播，讓人愈感炙熱難耐。

下了車，進村，走過密密麻麻的出租屋，一條略顯渾濁的水渠貫穿了村子。我們站在水渠邊等彪哥，頂著明晃晃的太陽仰頭看眼前的這些房子。哪一棟是彪哥的房子呢？在這曾經的珠三角水鄉，現在的建築似乎都長得大同小異，他的家會有什麼特別？為什麼會讓我們來採訪呢？

瘦瘦的彪哥走來，還是印象中淡淡的微笑和謙遜的打招呼方式。跟隨著他從那昏暗的一樓爬上出租的二樓、三樓，我都還在疑惑此行的目的。直到看見眼前通往四層的木門——它的厚重感、手工感和天然中的一絲笨拙感，在靜默中散發著能量，讓我為之一震。

迫不及待穿過那扇木門，撲面而來的是光影斑駁的清涼，一種適度的陰翳，以及綠色植物所形成的呼吸感，我們好像突然穿過一扇任意門來到一片小森林一樣。這種體驗太特別了，起初茫然不知為何，後來發現彪哥的家是一個「回」字結構，外面的「口」建了一圈約 60 厘米寬的種植槽，槽中填土約 90 厘米深。在這「口」田裏，種滿了各種各樣的植物，主力有桂花和月季，南瓜和青菜，還有一叢叢甘蔗，間或點綴著他去不同地方帶回來的一些當地作物，例如罕見品種的檸檬、無花果、黃皮、金銀花……我們光了解植物就花了一個小時。種植槽的高度恰好方便人站著操作，而坐下來時候，植物的枝葉既屏障了四周的樓房，又展露了天空。

「(這個家)好像一個人在成長一樣，有一種隨著生活變化的感覺。比如第一年，其實也不是種，就是吃了南瓜，到處扔廚餘，然後南瓜就各處長起來，整個屋長了幾十棵，最後結了 36 個南瓜，都吃不完，第二年就不種南瓜，種了一些甘蔗，之後這裏就全都是甘蔗。」

在這「口」字型的環繞式農田之內，是一圈「口」字形的迴廊，迴廊與外界由推拉窗分隔，當這些窗打開，風便從四面八方灌進來。這個家的客廳、廚房、餐廳並沒有形成單獨的明確房間，而是融合在被拓寬的迴廊裏。迴廊的中間是樓梯間，左右是格局相似的兩組廂房：起居室、臥室和衛生間，當推拉門打開，風和視線可以直接從家的一邊穿透到另一邊。迴廊的上方是一排置物架，彪哥說這是從過去坐火



車得來的靈感：一整面的長窗邊擺一個小桌，窗戶之上是一排置物架。坐在桌邊，三人對飲，看著窗外植物搖曳，仿佛坐著綠皮火車慢慢搖晃，駛向談話中的一個遠方。

雖然知道彪哥的家設計得很通風，但曾在廣東頂層居住的我們，還是對此難以置信——烈日高照，卻沒有絲毫被炙烤之感。抬頭一看，原來屋頂鋪滿了木板，兩三層疊加，形成了一個30厘米左右高的空氣層以及隔熱層。不同於一般的「吊頂」方式，這些木板是直接像木地板那樣鋪上去的，如果拍張照反過來看，也許會產生一種上下顛倒的錯覺。同時木板肌理形成的呼吸感讓人覺得非常舒適，毫不壓抑，跟整個家的木質基調，形成了一個統一的整體。

走進樓梯間和廂房之間的巷子裏，又是一番綠意盎然，映入眼簾的是一排彪哥細心營造，將底部的樹枝修剪掉後長到近三米的米蘭。

「米蘭就像是一片樹林。下面這些魚缸是親戚不要了，我就把它們搬上來，養一些水草，然後放兩條野魚。你看，每一個缸裏都會有一條野魚，都很乾淨。它最大也就這麼大了，但生命力很強，它在裏面可以吃一些有機物。比如蚊子（的幼蟲）之類，它就幫人類處理掉了。我發現有很多東西都要首先有個想像，有一種幻想，然後你再用你的聰明才智去把它營造出來。」

彪哥講述著他對這個雨林的構想，我們站在樹蔭下，旁邊是一缸一缸的水生植物，野魚暢遊其中。陽光從樹葉的縫隙落下，在透明水缸中折射出一道道光束晃動，讓人彷彿覺得身在水底。

「很多事情你（開始）做的時候都有局限性和很多的不確定性，因為我們都（帶著自身的）局限去理解和去想像，而且當時的條件也有制約。但是過了一段時間，很多條件環境又有不一樣的動態，又有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變化，就又要重新去面對它。其實這個是常態，只不過我們好像老是想一勞永逸，這都是自己欺騙自己。」

從 2013 年回到村裏算起，彪哥像一只螞蟻般地營造他的家，建材、泥土、植物，大多是他一個人爬樓梯一步步扛上來的，有請師傅，但很多地方他都自己親力親為，一切最初並沒有清晰的設計，而是在生活和變化中緩慢調整，直到現在也還在變化。就像彪哥，住在這個房子裏，房子和他一起生長，成為了今天的模樣。

彪哥描述他的家時，用得最多的一句話是「這個是別人不要，我撿回來的」。家裏的很多木頭，包括一些牌匾、木門、傢俱都是在這十幾二十年，遇到別人拆老屋建新房，他一點點收回來的。

「好多以前的老房子拆了，那些木料就不要了，很大一部分就堆到那些柴火木料裏。只有一部分，被收舊貨的人看到，就把它收集起來，供人挑選。收集這些舊東西的那個人年紀也比較大了，沒有多少力氣了，現在也不願意去拖了，整個 K 鎮，只有他還有一台這樣的拖拉機。這些舊物沒有多少人買，也賣不到什麼錢，他的勞動強度又大，又要找地方存放，所以我覺得他也是出於興趣或者自我內心認同的價值。」

說起「撿破爛」，還不只是一種興趣愛好，這真的曾經是彪哥的

職業，也曾是K鎮的一條產業。那是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珠三角各地都遊蕩著一些回收舊物的人。他們從K鎮出發，騎著自行車去找可以回收再加工再利用的材料，通常都是金屬類的，也是在這個基礎上，K鎮後來發展出了小電器作坊，後來又繼續產業化，而這一切就是由收集邊角料開始的。那時彪哥騎著一輛28寸的五羊牌自行車遠行，車身經過改造，可以放三個大籬筐，載重量可以達到300斤。他收廢品不只是在K鎮附近，最遠還去到廣州和肇慶等地，全程騎車，過程長達幾天，但對當時的他來說，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不只是艱辛地討生活，還充滿了樂趣。他說，他會和伙伴比賽誰先到廣州，也會在收這些五金廢品之餘去收他喜歡的老物件。

如今那些老物件非常自然地分佈在他家的各個角落，例如一根掛在牆上的木棍，一頭有角，乍一看以為是衣叉，其實是以前村子裏幹農活的扁擔，如果遇到武鬥，又可以變成震懾對方的武器。這些扁擔用的是非常好的木頭，拿起掂量，沉甸甸的。又例如左右廂房門上分別掛著兩幅舊牌匾，通往他和妻子廂房的是「光天化日 大道同風」，而通向他兒子那邊的是「物理翻新 人文造化」，文字別具一格，書法古拙有力。



彪哥收的不僅是別人家不要的東西，也包括家族裏的不再被大多數人重視的物件。他家門廳牆中央掛著一根老床板的床楣，那是彪哥曾祖父的床，後來傳給他的祖父和奶奶作為婚床，他的父親和叔伯睡過，他們三兄弟也睡過，後來床搬來搬去，很多零件拆散了，只剩下這根床楣。「我覺得還是要保留一點，這是一個家族的傳家寶。」彪哥說。

環顧整個家裏的老木板、木傢俱、木質擺飾，我們問彪哥是否對木頭情有獨鍾，他說他尤其喜歡那些未上漆的木頭：「其實每個人都是自然的產物，你也知道你皮膚有微微的毛細管，當你接觸有油漆的木頭，你都會有一些悶，感覺沒有那麼透氣，所以我休息的話就在這三塊沒有油漆的木板上，因為它表面可以呼吸。」

我們問他，你從小就喜歡親近自然嗎？彪哥略顯沉思，開始說起他的小時候。

「那時候我母親因為結紮手術後身體不好，不能夠下地幹活（家裏就少了一個勞動力）。我父親就去申請，想開一個賣農副產品的店，但那時候副食店都是供銷社的，不能夠私人開，但他（19）79年就不斷地去申請，後來批准了，那是（19）80年，你也知道，（後來就）開啟整個中國的形勢。」

所以 K 鎮最早的小賣部可能就在彪哥家的後院。初中以後他沒有繼續升學，作為家裏的長子，為了給家裏改善生活，他很早就進入社會，嘗試過各種工商業的工作，也加入了當時 K 鎮收集五金廢品的大軍。K 鎮製造業興起後，他加入過工廠，當過銷售，經濟條件逐漸有了改善。與此同時，他也目睹著 K 鎮的環境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各種粗放型工廠的興建，讓附近再也沒有了田，空氣中充斥著刺鼻的味道，原來的溪水也漸漸被污染。加之父母的身體狀況也開始惡化，這一切促使彪哥開始深入思考關於環境、健康以及人與自然關係的命題。

「（19）86年我去一個造船廠工作，當時有機會出差到廣東肇慶的封開縣，那邊靠近廣西，有原始森林，我在那邊一個很偏遠的農村睡過一個晚上。那裏的夜晚很古老很厚重，有（大自然）呼吸的氣息，滿天看得很清楚的星光，走到森林裏面樹葉沙沙作響，隨便在哪裏躺下都能很安心地睡，隨便在哪裏喝水都很放心，所以回來（K 鎮）後就有比較大的感觸。」

這趟邂逅原始森林的經歷，讓彪哥開始反思家鄉的環境。他從電視新聞聽到過環保這個概念，他想要學習更多，卻不知道有什麼管道或資源。

2002年彪哥在一家工廠工作，他們所需的配件需要噴漆，噴漆廠會用一些廢舊報紙包起來運到廠裏。有一天，他在一張揉皺的報紙一角，看到豆腐塊那麼大的消息——自然之友創始人梁從誠在廣州辦一場沙龍。那時候網路還不普及，於是他找到工廠的文員幫忙上網查找自然之友的聯繫方式，真的搜到了自然之友北京辦公室的電話。他打長途過去介紹自己，對方很爽快地將廣州自然之友小組的聯絡方式給了他，從此彪哥找到了組織。

2005年彪哥下定決心一定要從K鎮出來學習。他去了廣州，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參與了很多跟社會和環境相關議題的學習和討論。他也經常去一些大學的圖書館、書店或舊書市場，如饑似渴地閱讀了很多醫學、歷史、人文等方面的書籍，對他來說那段經歷好像出國留學一樣，給自己帶來了很大的震撼。

去廣州的代價是，拋下了工作，也暫時和家人分居兩地。對於彪哥這幾年的「消失」，家人很難理解。他甚至帶岳父岳母去他廣州的住所，證明自己並非在外面有了另一個家。到了2009年，為了幫父母治病，他離開廣州回家。跑了很多地方，去過大醫院也找過民間偏方，但父母沉痾難癒，相繼離世。2013年，彪哥改造自宅定居。這段出走後的回歸，讓人想到義大利小說家卡爾維諾在《樹上的男爵》中，講述了一個男孩12歲起就棲息在樹上度過餘生，始終不願回到大地上的故事。關於書的簡介是這麼說的：一次倔強的反抗，讓科希莫從12歲起就決定永不下樹。從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樹上，卻將生命更緊密地與大地相連。是不是真的只有先與人疏離，才能最終與他們在一起？

「要成家，要養育後代，要完成家裏的一些任務，所以要賺錢，要蓋一個房子，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和物質條件，讓父母過比較好的生活。因為他們真的是非常辛苦地走過來，而且都是農民，也受了很多他們的父母那一代的苦難，所以我們的基因裏就不斷地刻上這樣的烙印，有這樣的內在動力去驅動你，去營造一個更好的生活環境，給他們也好，給自己也好……（而我想做的事情只能）應運時間空間的不斷流動，一點點地微調，按照自己有限的能力和條件。」

正如彪哥所說，每個人對生活的想像都脫離不開他們的局限性。

他總是保持謙卑，不斷地摸索和調整。坐在彪哥家裏聽他講述自己的故事，感受到他對於生活空間的營造是如何立足於具體的生活經歷：他跟土地的連結、森林裏的夜晚、「收破爛」的經歷、在廣州的「留學」，這些記憶最終都投射在這個充滿細節的家裏，它超出了審美和功能的範疇，總是處於未完成的狀態，一切都在生長變化，彷彿一個鮮活的生命體。

從一個建築師的眼光來看，彪哥的家是極為概念性的：在傳統的中國家居空間中，私密空間常常圍繞著公共空間佈置，古時候有合院，也就是房間圍合院子；當代的公寓也常常是房間圍繞著客廳佈置。在彪哥的家裏，這種關係被顛倒過來，迴廊作為公共空間環繞在外圍，而臥室位於中心。我們可以切身感受到，這樣的空間格局是如何回應主人的生活習慣和時間分配，臥室只是簡化到極致的睡覺場所，除此之外的生活——做飯、吃飯、灑掃、照料植物——都發生在這個連續的迴廊裏，同 60 厘米的植物森林、窗外的風景和陽光雨水保持了最大的接觸面積。我們問彪哥是如何考慮這個房子的設計的，他一如既往謙遜地表示也沒什麼設計。也許對於一個用自己的雙手為自己建造居所的人來說，生活經驗就是他的設計方法，而生活總是先於概念的。

那天下午在聊天的尾聲，彪哥說起記憶深處一個關於榕樹的故事：

「我母親小的時候身體很弱，我外婆就帶她去村裏河邊的一棵老榕樹祭拜，認榕樹叫娘娘，希望增強她的生命力。後來母親經常帶我們去外婆家，經過那棵榕樹時就會跟我們講她年輕時候的故事。所以我一直都對榕樹有一種感恩，有一種心靈的共鳴，經過 K 鎮無論在哪裏見到榕樹，我都把它當做母親祭拜的榕樹。讀小學的時候，看到鳥會吃榕樹的果，然後在不同的野地或者一些岩石的裂縫中就會長出榕樹苗，我挖過幾棵回來，種在我自己做的一個養金魚的水池旁，想營造一個小小的微觀生態。我有一種這樣的願力，希望以後有自己的地方，去種大一點的（榕樹）。」

在彪哥不疾不徐的講述中，我們似乎跟著那位少年回到了最初開始的地方，他的成長，珠三角城鎮化的變遷，一個家的從無到有……太陽從高照到西沉，時光的故事在夜色中漸漸落下帷幕。說故事的人，聽故事的人，以及故事裏的人似乎在生命長河的這一瞬間同處於這個家裏，呼吸著同一縷風。在靜默的片刻，微風吹動草葉，光影搖曳，倦意朦朧，恍惚中這個房子變成一棵大榕樹，和天地融為了一體。



■ 楊向若 舒米學苑內容共創官、旗溪村社區協作者。

■ 王慈航 建築師，現生活工作於中山旗溪村。

都市人與自然環境的距離

2018年9月，颱風山竹吹襲香港，為這個先進城市帶來不一樣的景象：海邊翻起四五層樓高的浪，好些大廈玻璃幕牆被吹爛，整個工程天枰從二十幾樓被吹倒下來……翌日，香港市民如常上班，但不少人發現自己屋苑的大堂堆滿從海裏沖來的垃圾，倒下的大樹樹幹有兩三人圍起來那麼粗，主要幹道嚴重癱瘓，鐵路不通。這次自然災害，是香港三十年以來最大的一次。切身的影響，誘發不少人反思人和自然之間的距離。

容讓其他生物光臨的建築

文一阿樂



自然建築在南涌出現的契機

朋友傳來照片告知，香港的郊區受災亦嚴重。在南涌，本來安置於魚塘旁的貨櫃宿舍掉進塘裏。另一處的貨櫃廚房被吹翻，導致形狀扭曲，不能再用。還有更多農場的基建被破壞，需要重修。朋

友問：「你可以幫手重建嗎？」我知道南涌這個位於香港偏郊的地方，有一群人為著生態保育聚在一起，成立了活耕建養地協會（下稱協會），及後朝著生態社區教育的方向努力營建。我提出：「你們會想用自然建築的方式重建嗎？」就這樣，我走進南涌。但在這之前不無一番掙扎。

為何選擇離開現代建築

我是阿樂。建築系畢業後到香港一家建築設計公司工作，開始了持續四年的規律：從市區的家出發，搭地鐵，步行五分鐘，到辦公室的冷氣房，開始八小時工作；下班以同樣的路徑回家。我最享受的或許是週末，因為可以到郊區行山。現在想來，為何我對每個週末都有如此強烈的渴望？不知會否有人跟我一樣，往山林裏跑，在大海中浮游，其實是在彌補生活中的某些匱乏。我想，如果是一條魚，我會在大海裏有怎樣的一天？

我發現生活在城市的我們，很容易忘記在金魚缸裏的魚，跟魚塘裏的魚和大海裏的魚，本質上都是一條魚。它們不是被觀賞的魚，不是被吃的魚，它們是地球上的一員。

在工作的四年裏，我尤其看到城市空間對這種共同性視覺的缺乏。市區的土地都插滿高樓大廈，公共空間不足。在追崇高效的社會，空間都先讓作功能性的使用。不說人要給車讓行，而是要求容許其他生物共用這個空間，聽起來像天方夜譚。

我選擇放下「以人為本」的視野，離開建築公司，先學做一條魚，摸索是否存在著一種容許各生命體共融地生活的人類建築方式。

在外地遇上另類建築的經驗

到哪裏尋找答案？離職後的一兩年間，我去了多個地方，並覺察到我在建築業所觀察到的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問題還有更深層次的根源。

在巴西，我以實習生的身份，進入了當地政府的房屋部門。我被派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亞的貧民窟，協助部門的公共空間設計工作。耗時三個星期在辦公室做的公園設計草圖拿到社區中心，迎來區內居民的回應竟是：「我們不需要公園，公共空間是犯罪活動的溫床。」我察覺到這種建築設計上的缺失。這種資本主導，從上而下的建築過程，無法回應社區持分者的需要。而重大的問題是，目前這種建築模式正主宰著很多地方的城市發展。

之後到印度的山區，我聯同一個慈善團體為一個兒童之家改造廚房設施。該處的山區沒有集中處理垃圾的系統，每個產生垃圾的單位都自行負責。如何負責？他們把垃圾拉到山邊、路邊、前院或後院露天燃燒。當中有大量不宜直接燃燒的物料，如包裝紙、塑膠等，一些對人體有害且讓環境受損的氣體就直接釋放到大氣中。大家都不以為意，現代的產品有太多是不可被迴圈或降解的。而鼓吹消費的發展模式，太容易使人忘記在過程中人應該承擔的責任。不知不覺這種片面的價值觀滲入世界各地文化。

接著在朋友的介紹下，我去了臺灣參與團體「野地森活」的活動，協助建造一家用泥土做的小房子。第一眼看見這個正在建造的土房子，感覺不是特別壯觀，又看不出有什麼創新技術。參與過建造過程後我卻被深深感動。土房子的建造不像現代建築的建造。現代建築建造地基的時候，不論建築物規模，都會先把原本的泥土挖走，當工程廢料送走，然後在土地上以混凝土封住，再在上面建一層又一層的樓房。土房子用的物料無毒無害，現代建築的物料則經常有不少副產品產生：對環境和人體有害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刺鼻的強酸強鹼等。土房子的建築工地裏，沒有慣常見到的大型機械，或到處可見的危險物料。這種環境不期然使人放下警惕，容讓來自更多不同背景和年齡的人參與。臺灣的朋友跟我說，這就是自然建築。

在香港如何做自然建築嗎

自然建築可以在香港發生嗎？

自然建築廣泛的定義是指使用自然材料作為建材的建築物。追求物料是在地的、低度加工、沒有化學添加且可以逆轉迴圈再生的。自然建築同樣關注人的維度，即重視在建造過程中，人與人（建

造者與使用者）、人與自然所建立的關係。自然建築運動由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北美的回歸土地運動（Back-to-the-Land Movement）所掀起，他們在沒有建築背景和資金的支持下，用在地的自然資源作為建築材料，建立自己的居所。

在工作之前，我親身去過南涌三四次。我對這地方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四小時往返市區的車程。直到一天，朋友傳來電郵，說是邀請我參加南涌的市集，並附上照片一張。照片裏是一片藍天和一片綠意。遠處的綠是山脊。山腳處點點白，似是一些小屋。前面的綠一時未認出來是什麼，看見幾個人在草堆裏幹活，應該就是一片還沒長出禾的田。山和田之間也長滿草，幾乎看不出草是從水裏長出來的。之後才知道那是蘆葦。照片應該是初夏拍的，一片綠中隱約泛著夏日刺眼的白光。在電腦螢幕前看到這景象，好美。

沒想到，自己由一位訪客開始，接下了工作，到如今在村裏生活。

工作開初，依然被南涌的自然環境和四時的景物所吸引。不時在勞累的工作過後，走到溪水裏降溫。南涌三面環山，水源充沛。涌口接連沙頭角內海，海浪不大，岸邊長滿紅樹林。春夏的水很多，不少人長途跋涉從市區來，行溪澗看瀑布，看活躍於海岸、陸地和天空的昆蟲等動物。秋冬留鳥和候鳥在溪邊、海岸邊覓食和停留，觀鳥和生態愛好者經常流連。在城市長大的我，開始發現人不是想像中的那麼大。鄉郊讓我發覺，身邊的環境有更多的物種存在，並以此為棲身之所。我要建築的空間也許不只有人會光臨。

人只是這片土地的其中一員。此刻承載著我們的土地，繼承著過去的痕跡，亦將會是未來的資源。南涌自三百年前有客家人聚居，村落建於山腳，盆地用來種田種地。現在打開地圖看，會發現魚塘的面積比耕地要大得多。這個地貌的改變，源於1950-1960年間，田地被變更為更有經濟價值的魚塘。之後到了2000年代，一反香港城市發展的大趨勢，村中陸續有新的人口進駐。現在的南涌，常住的Probably有五六十戶。舊村民大多是退休年紀。活躍於村裏的成員，有幾戶以不同生態友善模式種植的小農，還有做食物教育、身心靈活動的等等。

從2019年起，我以自然建築的概念為基礎，為這個新舊交融、背景多元的社區，嘗試提出另類建築的可能性。在過去兩年多，我協助協會用泥土和竹建造了一個社區廚房，以及一個土窯。



廚房是協會每天都會用到的空間，成員普遍傾向以比較快的方法做一個臨時廚房，並期望在未來的四五年間，協會的整體空間規劃更為完整時，再另建正式的廚房替代這個臨時廚房。南涌有什麼在地的資源可作建築用途？怎樣的施工技術更易為一般民眾所掌握？我記起香港有名的竹棚，不論是幾十層高的大樓的維修棚，或是每逢盂蘭節打醮的戲棚，都能在幾天內完成。在南涌，魚塘就在旁邊，泥土容易獲取，況且有朝一日廚房需要拆掉，泥土也可以直接回歸土地而不污染環境。南涌的另一個魚塘則被蘆葦覆蓋，可以善加利用，除了用作在地材料，也可以削弱蘆葦的蔓延和生長速度。考慮到時間、在地資源、使用習慣後，我提出了一個方案：用搭棚的方式做廚房的結構，草掛在竹架上面，塗上泥土造成牆身，蘆葦用作屋頂和簷篷。

廚房的方案只是個開端，之後的選材、施工和保養，是持續而反復的實驗、驗證和修正，有如各種生命必經的過程。自然建築追求的，不是把自然物料直接應用而不作任何人為添加或改動。如果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我們都以類似的模式工作、運作或回應，我們就更像是一部機器，更不自然，不像我在自然中所見到的到處爬的

蕃茄、會游會跳的野豬或會穿州過省的候鳥。對周遭環境及物種有更深入的理解，在建築時使用適切的物料配合技術，是我所理解的自然建築。竹的韌性可與鋼材相比。不過竹糖分高，使用前要花點功夫：經過火烤，可以將裏面的水分蒸發，養分變質，昆蟲不愛；泥土是很好的隔熱物，不過弊端是遇水會溶化變泥漿。石灰塗在泥土上則是天然的雨衣，石灰氧化後可以保護泥土減少雨水沖刷。

對從前的我來說，大自然是一幅美好的風景畫；鄉郊是個休閒、消遣或放下的後花園；而建築是製造滿足人類需求的空間。現在大自然的生物是我會去探望的對象，讓我時刻學習其強大的生命力；村裏的人是與我一起聚餐、工作、生活的人，是互相聆聽和支持的伙伴；建築是在建立容讓更多生命互相交流、共生的環境。

參與者的反思

兩年間，有超過一百人次協助建造。土窯復修則有 12 個人參與連續八天的工作坊。這些參與者來自不同的背景：有退休的建築師、學生、家庭主婦等，年齡則由 18 到 65 歲都有。

自然建築需要身體老實的投入，即使這種勞動使人汗流浹背或肌肉酸痛，但依然有人持續地做。過去一年有一群大學生每月最少來參與一次自然建築活動。什麼驅使他們持續到來？他們的回答很單純：「喜歡這裏能放空，休息，能放下一些負擔和壓力。」面對世界的崩塌和失序，不少人都有種盼望，希望回到如常。一位參與者分享說她在南涌的山水、農田與各位的分享之間，找到一份天地自然之律可以遵循，使人感到心安。

我相信參與者能從這種身體經歷中獲得一種回報：接收來自自然的療癒力量。不論是在處理竹枝或是調配泥土的時候，經常看見參與者對當下工作的沉醉。或許，過往太多的學習是在追求知性的收穫，現在通過自然建築能與自然接觸，促發的是心靈的觸動。這種觸動，也許是反思和改變的起點。

觸動使人意覺人不再是獨立的個體。人的關懷超越自我。曾經有一位土窯工作坊參加者回饋說，這種學習讓她思考自己作為「人類」的身份，特別是自己在這地球上的角色。土窯完成後，另一位

參與者反思：「那燒柴開窯烘麵包會用上很多柴枝又釋出很多氣體，會不會是很不環保的行為？」覺察人的行為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又意覺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正是改變的開始。帶著這覺察檢視現在的系統，那我們又是否知道電力所產生的污染都排放到哪裏去了？要建造如此龐大的電力基建，又夷平了多少村落，影響了多少家庭？

我下潛到大海裏，尋找我心中樂見的魚兒。我看見有一些魚的容身之所就在海草或珊瑚之間；魚成群地覓食；魚的食物來自其他的生物，而它產生的廢物和排泄物又成為其他生物的養分。魚的生命得以維持需要依靠互相貢獻、互相成就、合作和支持。這是我在一條魚身上學到的。人為生活所需而消耗和建造無可避免，但我們在獲取自己所需的同時，是否可以多一份對其他生物的貢獻？我希望人類的建築方式可以朝向更為低生態負擔的方向發展。參與自然建築的活動也許是讓自己保持著這一份生態觀念的覺醒：人與各種生物互相依存。當更多的人保持這份覺醒，積極地在各自的領域做出行動，我們的生活狀態和生活環境就有改變的可能。



■ 阿樂 自然建築實踐者與導師，定居於香港南涌附近的鄉村，除了建築，有時還會跳舞和做麵包。

Sleeping In The Forest

I thought the earth remembered me,
she took me back so tenderly,
arranging her dark skirts, her pockets
full of lichens and seeds.
I slept as never before, a stone on the river bed,
nothing between me and the white fire of the stars
but my thoughts, and they floated light as moths
among the branches of the perfect trees.
All night I heard the small kingdoms
breathing around me, the insects,
and the birds who do their work in the darkness.
All night I rose and fell, as if in water,
grappling with a luminous doom. By morning
I had vanished at least a dozen times
into something better.

- Mary Oliver

森之寐

我就知道大地記得我，
她柔情地擁我入懷，
款弄黑色裙擺，口袋
滿盛菌藻和種子。
我未嘗如此安枕，石臥河床，
與群星白焰無隔
只有思緒紛飛若蛾
於良樹枝丫之間。
徹夜我靜聽各細小國度
呼吸起落，蟲子、
小鳥在漆黑裏勞作。
徹夜我醒來又睡，如於水中
與明亮的終局纏扭。熹微前
我已幻化好幾十回
更美好的種種

—— 瑪麗·奧利弗
(翻譯：顧曉峰)

第三部分

行動者

「共學起動」源自幾位勇敢的媽媽，希望在主流教育以外，實踐一套更適合孩子心理發展的教育方式。在共學中，孩子不用一歲起就為上幼稚園作準備，爸媽也不用為考學校而備感壓力。在親密照顧者的陪伴下，他們可以自由地以五感和身體探索，以遊戲來認識自己、社區、大自然和世界，並以家庭及鄰里作為學習建立關係的起點，從生活的互動中觀察及體驗社交、感受互相尊重的關係，而非只有規範和約束。這股自發的微小力量，卻不經意也為其他家庭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為孩子找朋友，原來不太容易」

我家小兒自1歲半開始，在街上遇到同齡孩子便很是雀躍，偏偏親友中沒有近齡孩子，我的朋友尚未生育，連和鄰居的生活作息也對不上，總是沒有可相約的孩子。

那便到公園吧！幸運的話，他會遇到主動領著他四處走的哥哥姐姐，但大家到達時間不同，往往在最投入時，其中一方需要離開，而照顧者常是家傭姨姨或長輩，不方便交換電話。即便對方是媽媽，初見時交換聯絡也困難，日後能否相遇也是隨緣。更常碰到的是公園的小朋友都有本來的玩伴，沒人願意和小兒玩，他在公園轉一轉便欲離開。

「才兩歲的人兒，如要有好朋友，是否就一定要上學或遊戲班？」香港的教育制度不斷改革，但仍走不出「精英制」的框架。主流教育的老師和學生間，教與授角色分明，規範化的課程未能配合所有孩子的需要和父母的期望。孩子需要群體，但學校或遊戲小組的集體性和訓練，對還在探索自我的小孩來說，未免過於約束。而礙於班中人數眾多，老師難以有足夠空間仔細了解或回應孩子的需要。



讓孩子在愛中成長的共養村

對於孩子成長，我堅信父母陪伴的重要性，也深信我們細心觀察也能好好引領子女成長。

同時，作為長時間顧孩子的媽媽，日積月累的身心疲勞，有話無處說的憋悶，也讓我察覺到除了孩子需要朋友以外，父母其實也需要伙伴。

「共學起動」的成立

有一天，我在朋友的社交媒體上看到徵集「共學伙伴」活動，共學中，孩子和媽媽會定期聚會，輪流準備活動，一起共養小孩。這同時解決了孩子和媽媽社交的需要。在參考了朋友的共學簡介後，我也開始了我和孩子的共學旅程，並在社交媒體中分享了我的經歷。原本只是個人的小小分享，怎料卻引來上百名的家長詢問其他區域的共學組，原來有這種想法的並不是只有我和朋友兩個人，於是，我們開始和幾位熱心媽媽走在一起，邊做邊學，一起開始構想如何推動共學，讓更多家庭勇於並能夠實踐不一樣的教養路。

雖然近年香港越來越多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嘗試推行非主流教育，但選擇仍是稀缺又昂貴。我們接觸共學之初，便留意到共學是經濟而具彈性的另類選擇，參與的家庭只要有決心，父母願意花時間去尋找合適的伙伴，付出心思陪伴孩子成長，共學似乎也是不錯的出路。有鑒於此，在2018年下半年，我們幾位成員在有限的資源和人力下，用了短短一個月時間籌備「共學起動」網路平台，又舉辦了香港首個「共學分享會」。一個幾近沒有宣傳、在平日下午舉行的分享會，竟在短時間內吸引了近百位父母參加，讓我們意識到很多家庭對於另類教育的渴求，亦強化我們推動「共學」的決心。

我們心目中的「共學」

共學並不同於在家自學，我們除了沒有特定的老師，沒有預設的課程內容外，也不受形式、地點和年齡限制。我們鼓勵參與「共學」

的家庭連結在一起，按著團中孩子成長的需要和興趣，由父母提供合適的環境和素材，讓孩子可按個人興趣自由探索，安於自己的步伐成長。

有兩年共學年資的伙伴 Phoebe 曾分享她的經歷和體驗，「小兒參與共學時只有 10 個多月大，是團中最小的一位，哥哥姐姐們都見證了他由爬行到跑步、牙牙學語變成妙語連珠。在共學中，孩子從來不會有被迫參與或坐下的壓力，活動也很多元化，我們 12 個家庭一起到大自然玩水、玩風、享受靜心、參觀博物館、遠足野餐、在中秋新年探訪護老院的老朋友，孩子在滿滿的愛中成長。最難忘孩子還小時，我要背著他跟大家行山，其他家庭都輪流幫我拿其他行裝，而因為哥哥姐姐們都在地上跑，我家小孩也由此願意走了一大段路，讓我輕鬆不少。即使現在大家的孩子都在上學了，在有空時也會相約共聚。」

實踐探索過程中，我們逐漸就「共學、共玩、共養」的內涵達成共識，包括：

「共學」：家長與孩子間、家長與家長間、孩子與孩子間，互相學習。共學是集體參與，互相貢獻、影響和成長。

「共玩」：孩子是玩的專家，玩樂是他們的權利。遊戲沒有目的，卻能啟發孩子。成人跟隨孩子的方式去玩，與孩子連結，建立更親密的關係，自己也享受其中。

「共養」：尊重孩子發展需要，鼓勵父母彼此分享教養方式和心得，共同學習，讓彼此的孩子也能身心健康地成長。父母以身教而非言教、連結而非高高在上、設限而非管束為教養原則。儘量做到多聆聽、少說理；多觀察、少責備；多引導、少懲罰；多鼓勵、少競爭比較；多欣賞肯定、少挑剔。

「共學起動」初期探索

起初，我們運用網路平台協助有興趣參與共學的幼兒父母互相認識，組成共學小組。我們的成員會以義務顧問形式為小組開展和運作提供意見，並從中探究以共學為起點，發展出一套非主流教育模式的可能性。在短短三個月裏，我們已在全港組成了 15 個共學小組。由於

我們大部分成員的子女仍在幼兒階段，所以我們主力推動 0 至 3 歲幼兒家庭參與共學，一方面我們可以身體力行去嘗試這種學習模式，另一方面 0 至 3 歲孩子父母亦較願意嘗試以共學作為教育孩子的起點。

參與一年多的伙伴 Fion 曾分享，「組成了自己區域的共學組，有一年多的時間，六個家庭經歷了由小朋友們互搶玩具到會期待見面玩耍，媽媽們由分享育兒瑣事到分享育兒心事，爸爸們也有機會參與在孩子的活動中。我們還找到好旅伴一起共學到外地，所有美好時光都是由共學開始。現在小女兒一歲，我也毫不猶疑地正策劃下一個共學旅程。」

經過一些傳媒訪問和報導，短短半年間越來越多父母想認識「共學」。有些家長會同時參加共學和坊間的遊戲小組課程，借此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個性。參加共學的家長亦發現共學能為孩子提供更貼近需要和豐富的生活體驗，讓我們更肯定共學的價值。

當然，「共學起動」平台成立至今也非一帆風順，一直以來，我們面對著很多不同的挑戰，例如資源和人力的不足，成員間不同的觀點等。參與的父母對於持續以共學作為孩子長遠教育模式的準備和認識不足，社會上也不容易找到支援小組活動的穩定場地，再加上過去兩年，香港受社會事件、疫情衝擊等，都讓「共學起動」的發展變得十分困難。雖然環境因素為「共學起動」發展添了不少挑戰，但同樣也給予我們空間放慢腳步，集中建立核心團隊成員的信任和共識，讓我們更認真地思考發展策略和方向。在這段未能舉辦共學的日子，我們一起思考、沉澱和重塑共學理念和推動方式，亦令我們更體會到共學珍貴之處——它具有適應環境和人性的流動力，能讓我們共同建設無限可能，各人投入不同理念、才能和能量，令共學發展更多面向。



以「共學」為起點，建立「共養」文化

受疫情的影響，在過去一年半時光，大部分家庭都無法再參與共學，也因此不容易再找到伙伴同行。在家中，孩子的精力依舊無限，爸媽在家工作同時照顧孩子，一方面可說是多了共聚的時光，卻同時也難免出現更多磨擦。在面對孩子哭鬧時，爸媽們倍感疲累，耐性被磨滅，待孩子睡著後，又會後悔及責怪自己。

「共學就此要停下來嗎？難道沒有其他方式可持續支援父母嗎？」在一次會議中，我們回歸到共學的初心。推動共學的根本，除了是連結家庭和鄰舍去教養孩子外，「相信孩子」、「連結自己」也是我們根本的信念。外在環境我們控制不了，而「人」是我們所能夠影響的。經過沉澱及反思，我們決定從根本著手，讓家長學習先好好照顧自己、滋養身心，容讓內在有更廣闊的空間、更堅定的力量攜手走下去，去照顧孩子和面對不同的挑戰。同時也借此吸引更多相同理念的同路人，待時機再次成熟，可讓家長更易覓到共學伙伴。

因此「共學起動」開始善用網上資源，推出一連串以共養為主題的單向線上分享會，讓家長們能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尋找教養孩子的同溫層。我們更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出以季度推行的 Mom's Club，這是一個全新的線上雙向活動，參加者會定期線上聚會，除了認識不同的育兒方式，更重要是透過互相同理聆聽，讓大家能在無批判的壓力下，分享育兒挑戰或心得，學習與自己的內在情緒連結，多一點了解自己的需要，從而好好照顧自己。線下，參加的媽媽也會進行實體聚會，一起參與專屬的藝術療癒活動，不僅讓身心得以放鬆，也善用這個網路得到身心靈的支援。

共學伙伴 Ailey 曾分享：「我參與實體共學團時，共學日是我每週很期待的聚會，甚至比孩子更期待。因為媽媽們能在當中一起分享教養上的點滴，互相聆聽及支持，為自己充電。疫情後，我先後參與了線上的『非暴力溝通讀書會』及『同理聆聽共修小組』，這些小組的特質包含同理聆聽、不批判、包容及接納對方等，在小組裏大家都能很安心分享育兒或生活上的大小事，有時大家不是為了尋求解決辦法，而只是想要一雙聆聽的耳朵和耐心的陪伴。」

共學共養的未來

近月，我們看見更多有心人用不同方式嘗試共學，他們對共學的理解和想法未必與我們一致，但我們相信共學已成為一顆種在父母心田上的小種子，等待有心人以自己喜歡的方式繼續培育。

我們相信，孩子都有面對挑戰的能力。在共學中，我們只需按孩子身心發展給予適當的引導和空間，就能讓孩子找到伙伴，共同學習，一起成長。在共養中，我們相信孩子的行為背後，都隱藏著美好的需求，只要父母身心安穩，得到同行者的支持，便能擁有陪伴孩子面對情緒的能力，成為孩子的避風港，讓孩子得以健康全面地成長。願我們能繼續攜手，一步一步為更多家庭成立屬於他們的教養村落。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網路時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開始有了另一種可能性，同時農村也有了復興的機會。在網路普及、交通便捷的時代裏，半農半 X 的生活方式——一邊務農、一邊做著自己有興趣或擅長的事——已經成為可能。而半農半 X 的生活者，也會為農村社會帶來新的可能性。

半農半 X 生活者的農耕經濟模式，由一群分散在各地的消費者所支持。這些消費者透過購買農產（加工）品，產地拜訪以及參與各種農村體驗活動，不僅支持了半農半 X 生活者的生計，而且能夠為農村注入新的經濟動能。這是網路時代下農村的社群經濟模式。

然而，這種新的社群經濟模式要在傳統的農村發生，需要一個仲介的支持環境。因為新的社群經濟模式需要運用傳統農村的各種生產資源，但是，又會遭遇農村既有經濟體制的排斥。因此，這個仲介環境，必須有效銜接兩者，讓資源互通，又能緩和或化解兩者之間的衝突。



這個由半農半 X 生活者復興農村的理論概念，並非單純的抽象推論，而是源自筆者嘗試解釋過去二十年發生在臺灣宜蘭縣員山鄉深溝村的實際案例。這個真實案例在十多年前就開始受到關心農村發展的臺灣社會各界的關注：一個名為「穀東俱樂部」的消費者組織，支持當時年僅三十歲的賴青松與其妻子朱美虹，在此種植不使用化學農藥的水稻，開創了年青人以新形態的產銷模式入鄉務農的先例。

事實上，在 2000 年到 2002 年，青松與美虹一家已經因為想要尋找更適合生活的環境，而從臺北移居到宜蘭。多虧當年電子郵件已經普及，青松可以在對外交通尚不便利的宜蘭，為臺灣西部都市提供日文翻譯的服務，借此滿足家庭經濟的需求。與此同時，青松為了排解長時間坐在電腦前的工作壓力，開始去深溝村，在丈人的兩分半地上從事農耕。不料，其中一分半¹地的水稻收成後，青松

半農興村：深溝村的故事

面臨如何去化這些稻米的困擾。在傳統有機通路無法支持的情況下，青松把這些稻米分送給親朋好友，剩下送不完的稻米，好友何金富大哥就協助將其銷售給自己的朋友們。意料之外的是，青松這兩年的生活，為未來紮根在深溝村，藉由親朋好友的社群網路支持的半農半 X 生活，邁出了第一步。

2004 年青松從日本留學取得碩士學位回來，決心正式投入稻米生產，在農村生活。有鑒於前一次稻米銷售不易的經驗，這回青松可是在種植水稻之前，就在何大哥的協助下，先把購買者找齊，並為這個消費社群成立了「穀東俱樂部」。穀東俱樂部最重要的產銷模式就是預約訂購。預約訂購讓農夫可以在投入生產之前，就確認所需要的生產面積。在足夠的稻米預約訂購數量支持下，青松可以安心地進行稻米生產，同時也確保了家庭經濟的收入來源。有意思的是，青松不再是一位傳統的農夫，他的主要工作不僅是從事稻米的生產，還需要花很大力氣經營穀東俱樂部這個支持他的消費者社群，強化這個社群的認同感，以確保每年的稻米預購數量。

青松在經營穀東俱樂部的努力方向，主要著重農村生活資訊的分享，以及對農村認同感的強化。在前者，青松努力經營自己的部落格，將農村生活的點滴都記錄下來，同時也經常會透過電子郵件直接分享給俱樂部的成員，稱為「穀東」。至於每個月的田間生活記錄，則以手寫的「米報」隨米寄送給穀東。至於後者，青松除了設計精美、富涵意義的稻米認購憑證「穀票」送給穀東，同時，每年都會依該年的總合心得，設計次年的年曆分送穀東們。最特別的是，在每年的插秧、收割與冬至，他都會邀請穀東們回家，一起過節。

然而，青松進入農村務農的企圖並不只是追求自給自足的生活，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進入農村，帶動農村的復興。在務農過程中，青松不斷地創造各種機會，帶領有興趣務農的都市人，進入深溝村參與農事。為了鼓勵穀東們來到農村幫農，青松還特地租下了房舍成立「穀東之家」，以提供穀東幫農時休息住宿之需。青松也曾辦過一分地農夫計劃，企圖直接培育新農夫，或將自己在深溝村租下的田地，再小量地嘗試轉租給其他已進場的新農夫，來測試深溝村民對於外來農夫的接受度。

雖然這些努力並沒有促成新農夫留在深溝村務農，卻讓傳統的深溝村逐漸開始習慣，外來的都市人在此從事不使用農藥的新形態農業生產。簡單地說，青松十年的努力，不僅為自己在深溝村找到立足之地，同時也為外來的新農夫打開了深溝村的大門。

1. 臺灣計算農地面積的單位，一甲約等於 14.55 畝，一甲有十分，一分半約等於 2.2 畝。

2013年，在穀東俱樂部的基礎上，以及政府水稻田休耕政策的改變，許多長年休耕的田地都必須開始耕種的歷史機緣中，我所創辦的「倆佰甲」新農育成平台，開始大量地協助想要務農的都市人進入深溝村生活。這個育成平台並非事先計劃，而是我在人生半百之際，決定追隨青松的腳步投入農村生活後意外的發展。

那一年，青松將遠超過我自己所能耕作的兩甲半水田交到我手上。許多深溝村的老農迫於政策改變，將長年休耕的水田拜託青松耕種，青松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將這些田地再轉租給周遭可信任的小農耕作。在這些小農都無法再接收水田之後，青松把交不出去的水田都交给了我。這當然是基於我們倆已有十來年的互動信任關係，但我只是第一年進場的新農夫，其實沒有能力獨立照顧這麼多的田地。而我明知無法獨立耕作還是接下這麼大面積的水田，也僅是基於情誼，必須力挺青松到底。

為了去化這麼大面積的水田，我開始詢問周遭的朋友是否有興趣耕作水田。就這樣，消息在宜蘭的一個與小農連結的社會網路中傳開來。此時，其實已經有不少人來到宜蘭，想要務農卻找不到田地可耕。因此，當他們從這個網路打聽到我手上有田地可以分租時，很快就找到了我。就像打開水閘門一般，都市人務農的浪潮湧進了深溝村。第一年春耕，我們有六位伙伴共同耕作這兩甲半²田地，到了第二年底，已經有五十位伙伴共同耕作四十甲田地了。我們的伙伴基本上都是來自都市，想要過農村生活。這些伙伴中九成以上的年齡分佈在二十五歲到四十五歲之間。

倆佰甲這個平台能夠順利地協助新農夫進入深溝村務農，有兩個關鍵要件。第一，土地代租的管理平台。基本上，深溝村的地主會將田地租給他們可以信任的青松，然後，青松再把土地交給我管理，由我轉租給新來的農夫。在這個平台中，青松對地主負責，而我則負責陪伴新農夫。第二，促成專屬的水稻代耕系統。由於我們是新的外來者，又是採用不使用化學藥劑的耕作方式，不適合直接運用現有的機械代耕，因此，我們必須建立自己的水稻機械代耕系統。在足夠的水田面積支持下，目前由新農夫自己投入的水稻機械耕作設備，已經至少有兩組以上的專業機械在營運。有了這兩個要件，解決土地取得與機械代耕的問題，新農夫的社群才可能與深溝村的舊社群接軌，在此開啟自己夢想中的農村生活。

令人驚豔的是，大量進入深溝村務農的新農夫，不僅為村子帶來了活力，同時，他們自己原來在都市建立的各種專長或興趣，也

為傳統農村社會帶來了新的面貌。有人在村子裏開辦農村廣播電台，有人運用便宜的技術為村子建立簡易的氣象站；有人在做農村報導；有人在田裏進行科學研究；還有一些新農夫在村子裏開始經營自己的小店鋪、餐廳、背包客棧等等，快速地為聚落中心帶來嶄新的風貌。在這個風景裏，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了，半農半 X 生活者如何為傳統農村帶來新生命。



2019 年中，我們成立了慢島生活公司，希望透過結合新農夫們的多元專長，共同經營一個屬於深溝村的消費社群。慢島生活公司主要由我們幾位合得來的外來小農，與幾位宜蘭在地——生活在小城鎮或漁村的年輕人共同組成。這個公司的初始目標並不清楚，大家僅僅基於過去單打獨鬥的經驗，知道必須相互合作才可能突破個人的格局，共同經營一個屬於深溝村的社群，但是公司明確要做些什麼，並不那麼篤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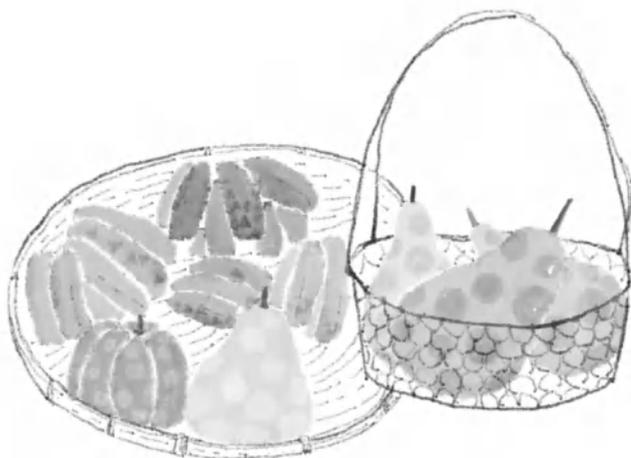
由於青松在深溝村的長期累積，結合眾多新農夫的力量，慢島生活公司第一年的經營，已經開始為來自各地的朋友們來深溝村拜

2. 兩甲半約等於 36.38 畝。

訪，提供各種客制化服務。這些服務通常是一到三天的農村生活體驗，包含實際下田操作、餐飲、講課、手作等等。同時，慢島公司也透過「慢島選物」，選擇我們覺得合適的小農或農村產品，對外販售，或是結合理念相近的店家銷售。我們也嘗試與其他的農場經營者合作，結合兩方的農產，共同開發產品。

經過一年多的經營經驗，我們越來越看清楚，我們其實正在經營的，是一個農村生活愛好者社群所需要的服務平台。農村生活的愛好者們可以透過這個平台接近農村生活，甚至由此真正地進入農村生活。而我們在地生活的小農與在地耕耘生活的伙伴，也可以透過這個平台為更大的社群提供服務。在明白了我們這個階段的努力目標後，我們接下來的挑戰就是，如何為這個平台建立專業化、標準化的商業服務經營模式。

我們認為，進入網路時代，新農業的驅動力來自服務業化，而來自都市的半農半X生活者正是這個農業服務業化最適當的推手。在深溝村的案例中，我們看到，在新的時代裏，農村發展已經有了多元、豐富的可能性。事實上，在深溝村之外，臺灣甚至是世界各地農村，早已有許多新的農村發展模式百花齊放。我們相信，原來依附都市的農村因為人們的努力，正在翻轉它與現代都市的關係。新時代的農村樣貌，其實是在告訴我們，人類的聚落生活方式，可以有另一種選擇。



第四部分

解讀

從食物出發反思現代生活，魚鹽村在這條路上才剛剛開始，當我們越向深處探尋，越發現看似眾多合理的背後，有許多十分值得深思的地方。在我們不斷鑽研食物背後的深意時，如獲至寶地發現了《消失的城鄉邊界線——日本〈食通信〉的奇蹟》¹，開啟了透過食物理解城鄉關係的新維度。作者高橋博之先生有著非常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對城鄉關係的思考及深刻的洞察。

作為讀者的我，經歷了中國快速城市化的過程，也目睹了城鄉的變遷對人們生活的塑造和影響。我藉由食物梳理自己的成長，也期待能和大家找到背後的啟發和共鳴。

上世紀90年代初，我生於東北的一個小城市。1997年開始，隨著中國城鎮化的發展，我家從平房搬到了樓房。記得小時候，每年入冬之前，為漫長的冬季儲存食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東北深秋的季節，家家戶戶門口都堆滿了一片片的大白菜，遠遠望去，綠色的菜葉，白色的菜幫整齊地排列在一起，有種彼此交錯的美感。找個好天氣，把酸菜缸刷淨晾乾，一層白菜一層鹽，直到把缸完全填滿，然後壓上一塊用了很多年的青石頭，接下來的事情，就可以交給時間了。

冬天的食物儲存是全家的一件大事兒，甚至整個家族都要一起——男性搬白菜，女性刷酸菜缸，孩子們也會被抱起來，放在酸菜缸上踩，因為據說小孩子踩過的酸菜會很好吃。隨著我們從平房遷進樓房，從大家族變成小家庭，空間的變化導致沒有足夠的製作場地，而新的小家庭，也難以消耗一大缸酸菜。於是，做酸菜的人越來越少，去超市購買的人越來越多。

我發現，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越來越依賴消費來獲取的模式中，從自己積酸菜到超市購買，從自家做大醬到買袋裝的醬，從紅白喜事一起勞作的流水席到去飯店吃席……換句話說，通過購買的消費變成了主流。這樣最大的好處，就是十分方便，快捷，無需複雜的過程和漫長的等待，只要想吃，隨時都能買到酸菜、大醬等。食物的獲取從未如此便捷，這樣的變化之快，也僅僅是十幾年的光景。

我是個特別喜歡觀察生活的人，我問媽媽：「你覺得自己做的酸菜和買的有何不一樣呢？」她說：「好像少了些感覺。」追問之下，發現媽媽說的「感覺」，其一指的是味道，超市的袋裝酸菜和自己做的，確實味道上有些許差別，但是差別是很細微的。其二是一起製作的那種感覺，這或許就是「方便後遺症」？



方便是有後遺症的，最大的體現就是「消滅過程，只要結果」。我們都知道著名的分工產生效能，當我們進入一個龐大的分工體系中，每個人只需要做到自己的一小部分，就能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食物的獲取變得越來越方便，其代價就是我們都成為了整個大分工中極其細小的部分，而難以看到整體，甚至要憑想像把自己和最終的結果聯繫在一起。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喪失了作為整體的自己去感知整體世界的途徑。為什麼一些伙伴從零開始做手工會非常有「感覺」？這種「感覺」其實是對整體事物的知感，而非流水線的某個部分。這其實是作為一個整全的人，尤為彌足珍貴的部分。

很多傳統的食物製作，都是我們作為一個自然人在和自然不斷互動的結果，東北的酸菜，四川的泡菜，山東的饅頭，陝西的漿水，內蒙的乳酪，浙江的火腿，山西的老陳醋，雲南的臘肉和乾巴，青海的優酪乳，湖南的腐乳……都是數不盡的人間美味。回想一下，這些美味絕大多數是在自然環境中，為了更多地儲存和延長食物儲存時間所產生的。那個時候，我們的食物生產和儲存是受到極大限制的，很有意思的是，在種種限制條件下人們反而創造了豐富的美味。

當我們談到食物感覺的時候，首先跳出來的往往是味道，對味道過於注重往往容易忽略食物的其他維度，物質的食物也承載著生產者和消費者的關係，承載著家庭 / 社群共同製作的情感，也承載

1. 《消失的城鄉邊界線——日本〈食通信〉的奇蹟》，高橋博之著，肖俏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 年 8 月出版。

著聯結自然世界和人類社會的紐帶。《消失的城鄉邊界線》一書中，有個非常刁鑽的角度，即從未談及味道，讓人們有意識地超越食物的味道，去看到之前很少關注的部分。

當我們從原有的食物生產和製作，進入到通過消費獲取食物的生活中，食物越來越被「物化」，物的屬性在不斷增強，而聯結和關係的屬性在不斷減弱。

快速便捷地獲取食物背後的代價是我們和食物的接觸面變窄了，原來吃上一口酸菜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等待，現在只需要輕輕一點支付，就能吃上了。既不用辛苦的勞動，也無需漫長的等待，似乎就這麼嗖的一下，食物就做好了。當我們越來越習慣快速、快遞、快節奏的時候，確實很難慢下來。

所以當我們談起現在吃的食物少了些「感覺」的時候，我相信這些感覺裏面必然包含著食物所承載的非物質層面，它們和物質的食物同樣重要。

這並非是在懷古傷今，對現在的批判和想要回到過去。我想起小時候在東北，漫長的冬季只能吃到蘿蔔、白菜、土豆，對日復一日單調食物的恐懼還記憶猶新。當上世紀 90 年代種植大棚蓋起來之後，也能在冬天吃到一些新鮮的葉類菜，是非常令人欣喜的。

從共同製作到超市購買，從平房到樓房，從大家族到小家庭到個人，從一起操辦流水席到去飯店吃，從昨天和今天的視角看，變化是極其細微的，但從 30 年的角度看，生活的變化是天翻地覆。個人從集體中被解放出來，從集體化發展到個體化，從社群互助的食物製作走向了市場化，這個過程中最顯著的，是我們作為消費者的身份越來越凸顯。除了滿足日常生活的超市，最能代表消費的大型商場，也已經成為我們彼此聯結的場域。而當生活依賴消費時，想過得更舒適，只有不斷地賺錢。好像我們陷入了一個到處都需要消費，所以要拼命賺錢的迴圈怪圈裏，這也是高橋在本書中提到的城市人的「牢籠」之一。

城市關注每個個體，開放包容，農村重視共同體，多有互助的傳統。

隨著滾滾洪流的現代化席捲而來，從上世紀 70 年代到現在，幾乎所有人都被中國快速城鎮化所裹挾著發展。我們需要去理解當

下的生活，看見其背後都是被怎樣的力量所推動，看見傳統中抱殘守缺的部分，也看見現代化中講究快節奏、效率至上的價值。而如何找到一條社群彼此互助支持，對自然友好，關懷生產者和消費者，更可持續的生活路徑，需要慢下來，從我們每個人開始去探索和發現。

高橋先生在本書中提到城市人的第二個「牢籠」，說到日本進入了一個「腦力」社會。何止是日本，我的直觀感受告訴自己，我們也正在不自覺地擁抱「腦力」社會。如果把一個人簡單地分，每



個人身上都有自然人、社會人和經濟人的不同屬性。

自然人意味著我們都需要吃飯、睡覺、上廁所、打哈欠等等，是作為生物體的自然屬性。社會人指我們是某個公司職員、部門經理，同時也有不同的家庭角色，是兒子、媽媽、愛人等。自從更關注生活之後，我發現很有意思的是，我們因為加班而沒有吃晚飯，或者趕專案熬夜許久，向別人分享時，常會收到努力工作的讚許，卻很少有人關心吃飯和睡覺。這其實是非常典型的，為了實現和承擔我們作為社會人的成就與責任，極度壓縮自己自然人的屬性。不斷壓縮和犧牲自己的睡覺、吃飯時間，連吃飯都變成了和汽車加油一樣，人們甚至會認為這是合理且正當的。

我坐網約車常和司機聊天，了解到他們早上 7 點就開車，中午休息一個半小時，一直開到晚上 10 點。他們在壓縮自然人的屬性，甚至也壓縮自己作為父親陪伴孩子的時間（壓縮社會人的屬性），只是為了盡可能地賺錢，把自己完全變成了一個賺錢的經濟人。諸如此類，網約車司機、外賣員、快遞員每天都經歷類似的生活。這背後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有資本，有集體性的價值觀，是非常多因素綜合的結果，這群人只是一種表象罷了。

換句話說，馬克思所談到人的異化其實從未離開我們，我們離開了卓別林在《摩登時代》中所揭示的流水線工人的異化，卻進入了新的異化。自然人 - 社會人 - 經濟人，是大圈套著小圈的，只有回到自然人，回到好好吃飯，好好生活，才能成為完整的人。我相信這是改變的方向。

有很多組織致力於讓都市人跟自然建立更多連結，比如各種自然教育機構組織的活動，但我現在更喜歡的，是把自然嵌入日常的生活。我有一塊自己的半畝地，每天收集廚餘做堆肥，收集尿液做尿肥，集滿後運到我的地裏。堆肥可以改善土壤，尿肥是很好的肥料，它們幫助我收穫各種食物。我能完整地感覺到，我的食物來自土地，我的廚餘和尿液也回饋回土地，這是一個食物的迴圈，我也只是這個迴圈中的一部分，萬物來自自然，回歸自然。踩在土地上的生活，從未如此安心與踏實。

重新回顧此書，除了作者本身做的事情，也看到了作者作為一個生活者，自身的轉變：從西裝革履的議員到赤足走在東京的街頭，從對政治無比嚮往到在城市中也總想找到一絲自然的感覺，高橋先生在城市和鄉村之間往返，找到了自己。閱讀他的文字，能感受到一種關於他自己的幸福。



■ 楊金 魚鹽村聯合創始人、主理人，致力於通過食物反思工業化和城市化對人的模塑與影響，重建人與土地、自然和社會的聯結。

在現代知識體系下，人類對經濟的想像是「獨立」的，表面上看它與生態毫不相干。但究根問底，經濟活動的基礎是大自然，是大自然給予我們賴以為生的空氣、能源、食物……試著重新想像在關照自然的前提下，我們與其他物種共同而又別樣的經濟會是什麼樣？我們如何能讓經濟為人類也為地球服務？《經濟，不是市場說了算：邁向幸福經濟共同體的倫理行動指南》¹ 提供了世界各地對經濟的不同想像、思考與案例，展現了世界各地的社區如何通過小規模的改變來創建更有道德的經濟，同時政府和企業又如何支持社區的行動。本文作者陳怡樺和陳郁玲與我們分享了她們對本書的思考、感悟，以及目睹合作經濟的一段生動經歷。

勞動合作社：做自己的主人

文一
陳怡樺
陳郁玲

奪回經濟

「人們奪回經濟，讓它為社會與環境服務，在探索人們奪回經濟的方式時，發現人們深入地思考一些共同的關懷，包括我們如何生存得好？我們如何分配剩餘？我們尋求好好存活之時，如何應對他人？我們消耗了什麼？我們如何照料我們共有的資源？我們如何投資未來？」作者在導論裏開宗明義地提問。

奪回工作：我們是為了工作而生活，還是為了生活而工作？何謂幸福？

奪回商業：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員工付出大量時間與心力，自然環境也付出代價，絕大多數的利潤卻都進入老闆的私人口袋，這樣的剩餘分配方式合理嗎？是否有其他選項？

奪回市場：在市場上，除了價格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值得考慮的事情？我們的消費習慣如何影響他人與環境？

奪回財產：我們消耗了什麼資源？我們如何維護地球棲息地與其他共有資源？

奪回金融：金融部門掌握了大量社會財富，然而今日其運作更像是個巨型賭場，而非我們財富的守護者，我們該如何改造金融，使其投資於我們共同的未來？



為什麼要奪回經濟

隨著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高度發展，許多人的生活因此改變了，強調競爭、利益最大化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帶來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尤其是財富的分配不均。回望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時期的景況，至今依然沒有太多的改變，甚至演變或許更劇。「平等」是當時所有朝城市奔去成為工人的人們最深的企盼，豈料，階級、貧富差距愈發劇烈；工業革命帶來的財富沒有公平合理地分配，絕大部分直接進了有產階級的口袋，廣大的工人苦不堪言，生活更窘迫不堪。

1. 《經濟，不是市場說了算：邁向幸福經濟共同體的倫理行動指南》(Take Back the Economy: An Ethical Guide for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ies)，英文版由吉勃森·葛拉罕 (J. K. Gibson-Graham) ——澳洲西悉尼大學的經濟地理學家凱瑟琳·吉勃森 (Katherine Gibson) 和美國馬薩諸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已故教授茱莉·葛拉罕 (Julie Graham) 的共同筆名、澳洲紐卡索大學地理學和環境研究副教授珍妮·卡麥隆 (Jenny Cameron) 與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州立大學地理學系助理教授史蒂芬·希利 (Stephen Healy) 共同完成。中文版由周睦怡譯，2021年3月游擊文化出版。

也許正如同書中的描述，「商業機構是生產與交換商品和服務的組織。對某些人而言，商業機構是豐厚個人報酬的來源，但對其他人而言，這是個受苦和受壓迫的場域——一個充滿剝削的地方。對另外一些人來說，商業機構只是一個工作和謀生的地方，一個索要他們清醒時最美好時光的環境。」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合作運動在英國成形。在英格蘭北方的羅奇代爾（Rochdale）小鎮，28位紡織工人前後花了三年時間，於1884年12月成立了「羅奇代爾公平先驅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自此合作運動在英國紮根，並開枝散葉至今。

回到「奪回經濟」這個主題，誠如導言的標題，為什麼是現在？本書中提到其中一個說法：現代人普遍正在經歷漫長的工時和工作天數損害生活品質和健康的狀況 就算收入增加，幸福感並不會提升，反而下降。工作佔去了多數人的生活中很大的比例，如何有意義且愉快地勞動，是一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作為一個信奉合作經濟的人，一頁翻過一頁試圖尋找答案的同時，心裏浮出曾經採訪過的故事，以回應第三章「分配剩餘」的主題。



「我們都不想當老闆」

1995年，國際合作聯盟（又稱國際合作社聯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在英國曼徹斯特舉行的第31屆會員大會中，確立了現今通行全球的《合作七大原則》；同時也確認：「合作社為人們自願結合的自治團體，運用共同所有與民主掌控的『事業』，以實現共同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的需求與期望」。

2016年的一趟採訪，其中一站到了北愛爾蘭首府貝爾法斯特。這個故事要從當時由五位女性組成的 Belfast Cleaning Society（簡寫為「BCS」）開始說起。2012年5月，BCS是北愛爾蘭第一個立案的勞動合作社。時至今日，讓我印象最深的片段是，在場的四位社員聊起那次賺了錢的「分配」和「沒有老闆」。

「合作社的穩定大於個人的分紅獎金。」社員 Alice 談起 2015 年耶誕節前的例會。「我們一共有多少錢？」大家問負責財務的 Alice。「付完這個月的薪水，繳完稅，買完清潔耗材和待添購的辦公設備，還有 2000 英鎊的淨盈利！」Alice 一邊查帳一邊向大家報告。「我們太厲害了！來辦個 Party，分獎金吧！」大家在現場一陣歡呼中七嘴八舌。最後的決議是，保留 1400 英鎊放回公共基金作為未來的備用金，每個人獲得 100 英鎊的獎金。對 BCS 的社員而言，社員既是擁所有者（Owner），也是勞動者（Worker），也是理事（Director）。理事主席每年改選，Teresa 是現任的理事主席（Chairman）。Alice 連忙說：「是 Chairwo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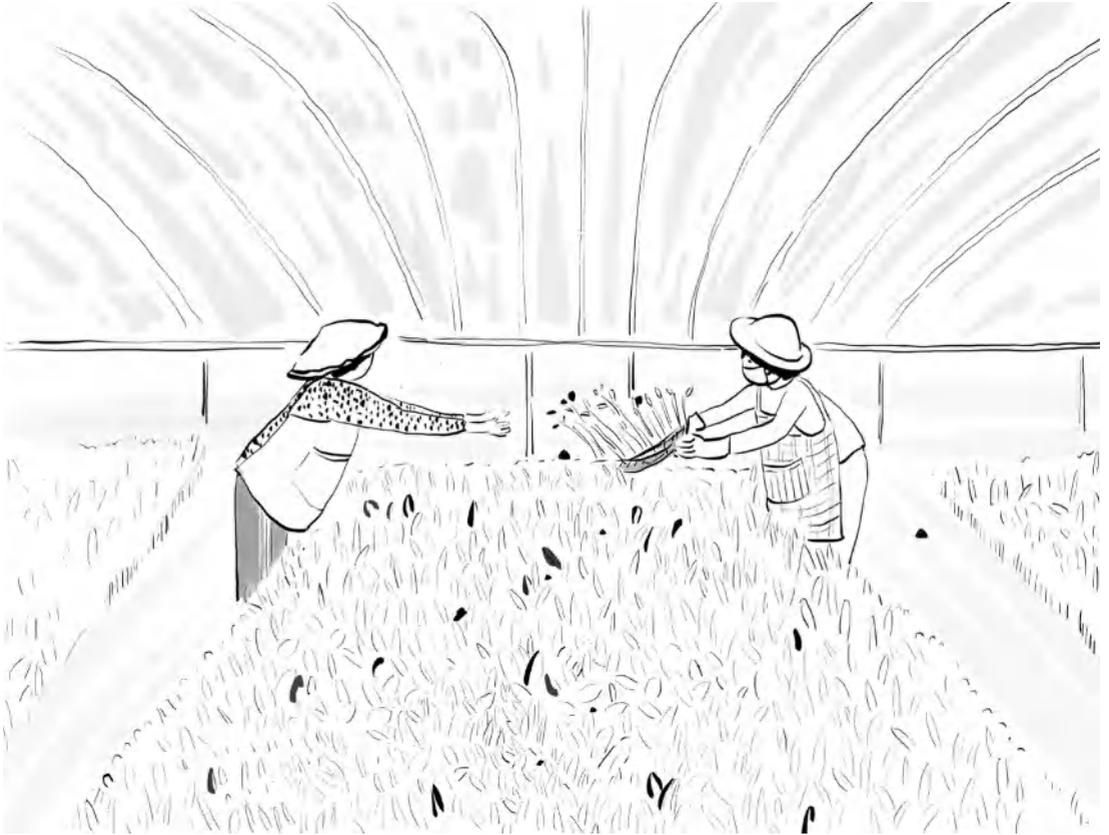
工作有潛力成為快樂和意義的來源，但工作也可能是乏味的苦差事，可以是重複的、耗費體力的，而且低薪到幾乎不足以糊口，甚至可以接管人們的生活。

BCS 一直是 Living Wage（生活工資）的倡議者與實踐者。2016 年 4 月，英國政府將基本薪資調整為每小時 7.2 英鎊，但早在 2 月之前，BCS 經討論後決議時薪為 7.85 英鎊。「合理的薪資，讓社員更有自信。」7.85 英鎊的時薪水準，高於當時的國家規定。曾在清潔公司任職的 Teresa 談到，以前的工作很多，薪水卻很差，而今和家人或親友談到自己的工作時，更有信心。此外，BCS 的每週保證工時為 16 小時，但根據業務量，通常是 25 至 30 小時。

BCS 的試用期為六個月，成為正式社員前的身份是僱員，薪水與社員相同。社員必須參與例行會議，協助宣傳工作如上街發傳單等。「我們希望每個人都是平等的，一起分擔所有工作，權益和義務都是保障。」採訪過程中，Alice 重複了許多次。對 BCS 而言，「一人一票、人人均權」是合作社的根本精神，而每個人的聲音都有同樣的價值。「我們都不想當老闆，也不想管人。我們也不想將成員分類，我們希望每個人都擁有一樣的權利。每個人都是社員，沒有僱員。」年紀最小的 Josephine 說得很堅定。2016 年起，BCS 決議，六個月的試用期後，不願意成為社員則無法續聘，且只有社員能分配結餘獎金。Alice 又說：「我們希望真正做到共同決策，沒有分別。」「有些伙伴只想工作拿到該賺的錢就好，不想參與社務。他們都是很好的僱員，但我們更需要的是能一起投入事業體營運的社員。」Josephine 有點惋惜。

2014 年加入 BCS 的 Teresa 是一位撫養七個孩子的職業婦女。「我很享受成為社員，很享受和大家一起工作，我們是一個團隊，是一個會為彼此著想的團隊。」對 Teresa 而言，在合作社裏的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共同分擔責任和風險，合作社賺錢也是自己賺錢。

總覺得「快樂天堂」這首歌屬於勞動合作社！歌詞裏有這麼一句：「有哭有笑當然也會有悲傷，我們擁有同樣的陽光」。分工合作互助扶持，是勞動合作社的必然。勞動合作社的存在，是嘗試用更平等、與每個人更靠近的方式面對及解決組織運作時最惱人的人與事；讓每個人都要賺到該賺的錢，平等分配一切。這亦是回應本書中好好生存、合理分配剩餘，更能善待他人的一些可能；也如本書所文，「奪回經濟不是單一個人的任務。這項任務請求許多人共同協力行動」，歡迎成團結伙的平等組織，一起邁出奪回經濟的一小步！



一些眼中有光的人——紀錄片《信仰之島》觀後感

文一 汪斌



我出生於鄂西的一個小山村，記憶中，村寨的大人們從田間生產到民俗生活都流行換工互助，小朋友們常常三五成群，結伴玩耍於山谷田野間，童年記憶一片熱鬧明朗充滿希望。此後進城求學十來年，鄉村生活離自己越來越遠。

工作後的我得以繼續穿梭在中國西南的諸多村寨。但在經濟與市場浪潮裹挾下人員大流動的鄉村，早已不是記憶中的模樣：田地半耕作半荒蕪、只有老少隔輩與帶著幼兒的少婦們在家、大部分時間都很安靜、公共衛生基本無人問津……加之當時我負責的專案找不到著力點，這些都讓我逐漸陷入深深的困惑中。

那兩年，我一度很不喜歡拍照和照鏡子，因為害怕直視自己那空洞又疲倦的眼神。轉捩點發生在一次偶然跟隨申頂芳¹老師走訪他工作了十幾年的西雙版納布朗社區。

一進章朗寨門，申老師就忍不住開始介紹他與寨子的淵源，能感受到他的那種興奮與思慮摻雜，如同對故鄉的牽掛的情感……過緬寺，上一小段坡，就到了申老師在章朗的骨幹伙伴岩章往大哥家的院子裏。往哥的妻子在一樓，只是很平常地說「回來了噯」，就去忙自己的了。我們在申老師的帶領下自己上二樓，往哥擺手招呼我們進去坐下。一切都像迎接白天出門幹活晚上回家的自家人一樣，這樣日常的、淡淡的接待讓我生出不少好感。

岩章往大哥與申老師交集很早，兩人早期以拓展布朗文化中「賤」的內涵與外延為探索方向，開創了布朗專案的新局面。這次走訪的幾天裏，兩人不斷熱烈地討論各種問題，包括義務教育政策下維持緬寺教育的困難，以及把老傣文佛經漢譯以方便學生理解的做法之得失等。他們討論時我在一旁總是聽得津津有味。往哥說話時眼睛習慣盯著前方地面，偶爾抬眼與我目光對視時，眼神中透出的那股不緊不慢、堅定又祥和的力量足以穿透我的內心。我看見他的眼中有光！

這次走訪對我的啟發很大，讓我打破對於鄉村要麼過於浪漫要麼過於悲觀的迷思，開始將注意力轉移到一個個具體生活在鄉村的人身上，尤其是那些從眉眼神態傳達出智慧與力量的人。從這些人的思考、選擇與行動中，我似乎窺見了鄉村持續不斷的生命力。在隨後的鄉村社區發展工作中，挖掘和陪伴村寨骨幹成為我非常重要的思路，並且通過關注自己和村寨伙伴在不同時間透過眉眼神態傳達出的身心狀態來預估專案成效。鼓舞人心的是，我的工作有了新面貌，我得以再次真正地走進鄉村，認識諸多令我欽佩、眼神明亮的鄉村朋友。

同樣令我深受觸動的，還有來自遠在印尼的眼神。在觀看紀錄片《信仰之島》²後，片中那略帶沉思卻無比明亮的眼神和神態多日一直留存在我的腦海，觸動了我的記憶，與我過往生活經驗中接觸過的類似眼神相交匯。

全球氣候變暖、海平面上升以及由此帶來的一系列極為複雜的環境氣候變化，越來越成為人類生存所需直面的挑戰，這些挑戰與近一個世紀的工業化膨脹發展、人類生活不斷物化息息相關，問題的解決之道考驗著人類的智慧與心性。紀錄片《信仰之島》將鏡頭聚焦於群島國家印尼，從島嶼、沿海、山區到城市，從印度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到原住民萬物有靈信仰，綜合考慮印尼的環境和文化多樣性特徵，並且結合全球氣候變化的量化數據輔助說明，講述了印尼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群體如何利用各自的智慧以保護環境為前提從事可持續生產生活的七個故事。

1. 申頂芳，農村社區工作者，昆明市呈貢區夢南舍可持續發展服務中心主任。

2. 《信仰之島》(Semesta)，印尼紀錄片，導演 Chairun Nissa，2020 年上映，透過紀錄印尼七個省份的信仰和文化，呈現致力應對氣候變遷的多位人物故事。

七位「主角」的講述中都有對各自文化信仰中關於人與自然關係的內涵做出當下的闡釋，以此為基礎，我們可以看到七個案例故事雖然存在文化、信仰與地域的差異，實現人與自然的聯結與平衡卻成為了彼此共通的行動目標。

片中有幾位「主角」各自紮根一片鄉土，擔起一個村寨 / 社區行動帶頭人的角色，令我欽佩不已。要擔起帶頭人的角色，不僅個人能力要突出，還需要極強的責任心、公益心和協調人事的智慧。

上世紀，婆羅洲的森林因砍伐活動消失了一半，在全球範圍內，此過程的排碳量引起氣候變化總量的百分之十五。在這樣的背景下，居住在西加裏曼丹省尤緹克河流域的一個原住民團體，選擇與森林平衡相處對於全球氣候調節有著重要意義。團體的首領宣導保護環境，堅持自我管理自己的森林領地，與周邊不保護森林從而一無所有的村莊相比，他們的森林依然像「超市」一樣為他們提供各種生產生活物資，他們可以狩獵，可以種植，泉水乾淨……對他們而言，擁有並不意味著為所欲為，而是長遠的責任：「森林裏的一切都屬於我們，因此我們要保護它……從森林裏採集必需品是有規矩的。」

類似的責任感也閃耀在傳教士 Romo Marselus Hasan 的眼中。位於東努沙登加拉縣比莫林的村寨交通閉塞，與無法進入印尼電網的 160 萬戶家庭一樣，多年來通過發電機和油燈解決照明問題，這樣的能源利用方式，不穩定也不環保。六年前，傳教士 Romo Marselus Hasan 帶領村民們開發了微型水電站，利用自然的水流發電，是一種零排放能源。不料該村遇到罕見洪水，水電站破壞嚴重，如何解決困境？從災情勘察，教委會協商，到召開群眾大會討論修復方案。最後，在一些骨幹的引導下，村民們決定用自己的力量來修復受損的水電站，而非消極等待外來的幫助和救援。當全村之力聚集，為維修水電站而搬動一塊大石頭，或排成長龍運送石塊時，傳教士 Romo Marselus Hasan 堅定的聲音響起：「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因此我們要彼此照應……」

但只有責任感有時候並無法解決困境。在亞齊省帕梅，失去自然棲息地的大象進入人類的村莊，村民的花園被毀，農作物全無。當地的宗教領袖 M.Yusuf 帶著村民一起祈禱大象不要繼續破壞村裏的莊稼。M.Yusuf 洞見了現象背後的本質，「大象走進我們的村莊，吃掉我們的穀物，是因為我們奪走了它們的食物，我們把河岸變成花園。」祈禱開始前，有村民提出只有兩種辦法——毒殺或者獵殺大象才能阻止事情再度發生，M.Yusuf 表示反對。雖然祈禱活動繼續，可是，人



象衝突已經存在，要實現現實利益與精神信仰之間的平衡著實不易，M.Yusuf 只能憑藉人類要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信仰，盡己所能地向村民們傳遞一個資訊，讓他們不要製作陷阱傷害大象，不要毒殺大象。這個案例以 M.Yusuf 為村裏的小朋友講解人如何換位思考，與大象、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場景結束，循循善誘中，M.Yusuf 的眉眼之間露出笑意。

即使隔著螢幕，我也能感受到這些人對社區的關懷，對自然的敬意，對家鄉的熱愛，讓我也從某種意義上更貼近自己的家鄉，更理解家鄉的人。比如，我的父親近幾年結束外出務工生活回到家鄉，並且逐漸承擔起村寨「執事人」（紅白喜事的總管，需懂民俗禮儀懂人事調配，願意義務為鄉鄰服務）的角色，每每與他聊到家鄉人情世故、民俗發展時，我亦從他眼中讀出類似的光亮。

作家三毛曾說：「大家都在種麥子，那麼我就來種玫瑰吧……」是的，相對於隨波逐流種「麥子」的大多數，種「玫瑰」者多少顯得有些異類，但當你真心選擇了種「玫瑰」，當你打破資本經濟單一逐利的藩籬，紮根一片土地抑或一群人，做出的選擇中有更多的利他性和自然性時，久而久之，內心充滿力量的你，眼中又怎會不散發出光亮呢！

■ 汪斌 雲南大學民族學在讀博士，長期在中國西南山地行走，2015 年加入雲南鄉村之眼團隊，有五年半的少數民族村寨可持續發展專案協調經驗。

